

導讀序:是誰在投降?

徐斯儉/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 中心主任

簡錫增先生是台灣介紹與推動非暴力抗爭的關鍵人士,他在廢除《刑法》一○○條、紅衫軍,以及近年許多社會運動中,都扮演了推廣非暴力抗爭的重要角色。他在這個議題的影響,已經不侷限於台灣,香港占中的許多朋友,也請他去進行非暴力抗爭的培訓。他的這些事蹟其實也已不是什麼新聞了,但他有另一件成就大家或許已忘記,或許根本就不知道。台灣是東亞第一個實施替代役制度的國家,簡先生其實就是真正的推動者,是他在擔任立委期間促成此制度的通過與實現。所以,當簡先生結合了非暴力抗爭與非武裝國防的觀點,著手寫一本有關台灣如何以不合作、不服從來反中國併吞的書,不僅是其經驗與智慧的結晶,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他是在為台灣的和平運動書寫另一個重要的起點。

然而,簡先生在台灣推動和平抗爭與非武裝國防的理念與實踐,經常遇到兩種挑戰:一種挑戰認為,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崛起中的霸權大國,非武裝國防是軟弱與投降的代名詞;另一種挑戰觀點則是,無論以武裝或非武裝的方式與中國對抗,都是無法得到和平的,唯有與中共政權達成「某些共識」,兩岸才有「和平」。我相信簡先生有他自己的回答方式,但既然他請我替這本書導讀,我就藉這個機會提出我的回答,那就是和平抗爭與非武裝國防既非軟弱,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種真正勇於面對威脅的態度與準備,是真正堅定意志的展現,也是真正有效國防的基礎與後盾。相反的,不去面對中共侵入台灣的

可能,或者不願承認與處理中共併吞台灣、摧毀民主的企圖和可能,那是逃避可能出現的併吞。這種逃避的心理,不願面對更醜惡、更危險的場景,是不可能換取到真正的和平的。非武裝國防的主張,是要堅定捍衛台灣政治共同體的民主價值,貫徹即使遭占領也要以非武裝方式抵抗到底的決心。相對而言,那種「有xx共識就有和平」的論點,其實是一種逃避與自我欺騙,那才是真正的投降!

非武裝國防是需要在平時演練的,且其演練必須在有組織、有計畫、有步驟的條件下不斷反覆進行。當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真正開始進行這種操作時,就得將平時鬆散的社會組織起來,要讓鄰里之間共同面對那個最壞的場景。當我們真正有此操作時,我們就不會再害怕中共的侵略,真正珍惜民主體制的重要性,這其實就是一種培育公民社會的過程,也是鞏固台灣這個民主共同體的過程。只有當我們清晰地認識到我們身為這個民主共同體的一員,有著不可逃避捍衛這個共同體根本價值的責任與義務時,非武裝國防才會有真正的動力;而為了非武裝國防的實際可操作性,社會必須被組織起來,不認識的鄰里街坊必須合作,而且這種合作必須建立在共同的價值上,如此一來,公民社會就有了更堅實的基礎。所以,非武裝國防、公民社會的培育,及台灣民主共同體的鞏固,其實是三位一體的。

更進一步而言,這本書提到,非武裝國防並不是要代替武裝國防。簡錫增先生認為非武裝國防是武裝國防的補充,我並不反對此一看法,但覺得這麼樣還不夠徹底。按照我上述的說法,非武裝國防和武裝國防其實是連續的,當非武裝國防真正被建立起來,不斷演練,且在社會中扎根時,國防的社會基礎才是真正堅實的。所以,我認為這不是補充,非武裝國防是為了整個國防奠立更為堅實的基礎。

從「逃避」走向「面對」威脅的態度,與堅定捍衛共同體政治價值的信念,是非武裝國防的精髓。這種態度與信念,是對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政治文明,及一種理想社會的選擇。這樣的選擇有著多重的意涵。如前所述,這也是一種公民社會培育的過程。當大家為了共同的理念,真正有組織地在社區內頻繁合作操作起來時,這樣的社會互動同樣可以產生其他的功能,譬如社區型的合作經濟、社會照護、守望相助,甚至是疫情防制,都可以在這樣的社會網絡上運作起來,如果政府能看到這一點,就會知道把預算花在這種社會網絡與平台上是非常有價值的。

其次,有人會質疑,在台灣這樣一個藍綠分裂、統獨對抗的社會中,要怎麼團結起來?其實,當人們這麼說的時候,多少就是有著一種逃避的心態。因為客觀的威脅是存在的,這跟藍綠無關,用藍綠做藉口,來說我們沒辦法,不是逃避是什麼?至於統獨問題,把話說到底,就算是想跟中國統一,我們也要問那是在什麼政治文明、什麼政治價值、什麼生活方式下統一?如果讓一個對內任意逮捕公民、打壓言論、剝削土地的政府,對外擴充武力、用民族主義升高與鄰國緊張關係、為其威權獨裁正當化的政權,以武力侵吞台灣,這樣的統一是可欲的嗎?這樣的統一能換取真正的和平嗎?這不是一種在根本價值上的投降與逃避責任嗎?所以如果要求在長遠的未來,有一種更健康、更文明、更能實現可長可久的真正和平的兩岸關係,我們就不能放任中共不負責任地武力侵吞台灣。這不僅是為了捍衛台灣這個民主政治共同體,更是為了實現一個真正和平健康的兩岸關係。

最後,建立台灣堅實的非武裝國防,還有著國際關係的意義。最 近西方(主要是美國)興起了一種對中國「綏靖」的言論,包括各種 版本的「棄台論」。這些論點的基礎立論,其實都是一種唯實力是從的現實主義國際觀。他們認為中國國力上升,為了像台灣這樣的議題與中國對抗,划不來,所以乾脆與之妥協。我認為這是另一種逃避,或者說是另一種真正的投降。在這本書中,有非常多的案例故事已經說明,執行鎮壓的士兵和警察也是人,他們心中也有正義是非,更何況現今這種媒體與網際網路異常發達的國際社會,更不可能隨意讓無理的侵略發生而不受譴責。當一個社會失去捍衛自己的決心、不珍惜尊重自己的政治價值時,才會給國際那些綏靖主張者藉口(且僅僅是個藉口);只有自己抱持著逃避或投降心態時,才會引來另一種說詞更為堂皇的逃避與投降。當我們清楚且堅定地捍衛我們自己的政治價值與生活文明時,我相信那些國際綏靖主義者是不敢正視我們的眼睛的,國際社會的輿論也不可能坐視不管的。我們自我逃避的心理只會助長另一種充滿逃避心理的國際關係產生,而那種因逃避而綏靖的國際關係,則會反過來助長獨裁者窮兵黷武的氣焰!

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占中雨傘運動,都是公民覺醒的表現。促使公民覺醒的,是一種捍衛自己生活方式與政治文明價值的決心。這都是一種從逃避轉向面對的變化,是一種真正願意勇敢負責的表現。就是因為有這種願意面對、勇敢承擔的精神,我們才會在這兩場運動中清楚地看到非暴力抗爭的實踐,所以這絕不是偶然。在這樣一個覺醒、承擔、面對的時代,簡錫堦先生的這本書,問世得正是時候!

推薦序(依姓氏筆畫排序)

吳忠泰/全國教師會前理事長

陽光多麼和煦,但戰爭從不遙遠。

和平從來都不會從天而降。如果不是熱愛台灣的生活方式,我們不會有維護它的勇氣;如果不是對於專權控制的反對,我們沒有必要如此遲疑融入崛起中的中國。

由於利益不均和認同差異等等理由,造成國人對中國有「奉如父母」和「拒於千里」的兩種極端反應,簡錫堦先生的《弱者的力量》對於未來十年的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則啟發了一條不一樣的路。感佩錫堦兄在這本書中具體設計了操作和行動,正是為了孕育溫柔堅韌的能量,帶領國人面對兩岸困局。

林永頌/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

二十多年前,我協助職災勞工向日本公司爭取權益,認識了簡錫 增先生,經由他頗具創意的非暴力抗爭,迫使該公司重回談判桌,勞 工權益終於獲得確保。

簡先生是勞工運動前輩,帶領台灣各項非暴力的社會改革運動, 在從事司改或法扶的社會運動時,我常請教他。這段期間推動卡債運動,在他的指導下,更以非暴力方式成功促成消債條例修改。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並沒有帶來民主,其一再增加軍備,對經濟及軍力日益懸殊的台灣,造成極大威脅。如何防止中國以武力或經濟等方式併吞台灣,簡先生在這本書提倡以「不合作」、「不服從」的「非暴力公民防衛」,來對抗中國的侵略。

書中提到「非暴力」的精神、原則、方法等,二〇一四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及香港的兩傘革命都有高度的呼應。對於台灣人民該如何發揮力量,來確保自己的國家,本書提供了極佳的理論與實戰方法。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崩世代》作者

自古以來,暴力與財富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其中兩個主要原因; 在現代社會,霸權或強權國家所發動的戰爭,及國家鎮壓弱勢族群所 釀成的各種大屠殺,是人類死傷最嚴重的人道慘劇。諷刺的是,弱國 或弱小的反叛者對抗這種強權國家暴力的主要手段是「以牙還牙」, 也就是加強投資於軍火。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強權國家的核武能力 更是達到了足以毀滅全球好幾次的地步。

如何減輕現代國家之間或其他類型武裝集團之間,以暴力相互毀滅的威脅?從啟蒙時代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哲學家與政治家。然而,對我們而言,這不只是個有趣的哲學問題:台灣民眾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如何以最小化與最合乎效益的方式配置國防資源,又能夠滿足自我防衛的需要?「非武裝國防」可能是其中一種主要策略。

對我個人亦師亦友的簡錫堦先生,擔任立委期間是國防替代役的 主要推手,長期關注兩岸和平與非武裝國防相關政策,本書是其多年 來推動和平思想與經驗累積的精華。對國家暴力、兩岸與國防議題有 興趣的讀者,本書將會深入淺出地引導我們了解非武裝國防的理念與 實踐。

林佳和/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董事

義大利的思想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宰制與榮光》一書中說道:「政治之謎,不在主權,而在政府;不在上帝,而在天使;不在君主,而在部長;不在法律,而在警察」。面對作為國家統治核心的暴力,除了以暴制暴,奪取其壟斷暴力,好似別無他途。

但錫堦告訴我們並非如此。從描繪台灣的末日開始,人、事、物、地雖處處虛設,卻又真實得如生栩栩,宿命般帶往台灣人的終極困局。面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宰制台灣,如不願束手,除卻暴力解放革命,根據準確歷史解讀,錫堦告訴了我們一條不一樣的、或許比所有想像得到的暴力更為有效的方法一非暴力的不合作與不服從。德國哲學家班傑明(Walter Benjamin)在《批判暴力》一書中提到:「批判暴力,毋寧在於描繪暴力與正義的關係。」錫堦的這本書,不但批判暴力,更指引了台灣人通往和平、建立正義秩序之路。

林敏聰/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會長

本書是台灣民主運動前輩簡錫堦老師對於如何捍衛台灣民主最深切的思考,以一個具有強烈戲劇性、驚悚萬分的台灣動盪局勢作為起頭,迫使讀者認真思考台灣應如何面對絕對優勢的政治暴力與國際棄守壓力。他提出「全民非暴力和平抗爭」,對於台灣人不僅是政治現實的策略思考,更是全民以「愛與意志力」,對於台灣共同願景的凝結。

本書不僅介紹國際和平非暴力抗爭的理論與經驗,也記錄了作者 本人對於台灣民主與公民運動最真切的實踐與反思。而這些付出,就 如同書中所提的,是在追求台灣「創造希望、平凡幸福的和平國 度」,一個社會民主的核心價值。

茉莉(本名莫莉花)/流亡瑞典的中國作家

此書的開頭很像一部令人震撼的災難電影。以資深漫畫家和戲劇愛好者的豐富想像力,簡錫堦先生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台灣末日的圖景一路透社國際頭條新聞:「統一公投爭議演變成政治風暴,台獨民眾占領總統府,未上任新總統連正文流亡北京。」然後是一連串令人目不暇接的驚悚消息:台灣軍事政變流產,民眾燒毀親中媒體大樓,街頭喋血社會失控;台灣流亡總統請求中國出兵;中國登陸進行接管,宣布戒嚴,重建秩序;解放軍全面控制台灣,台灣慘遭滅國的命運。

在好萊塢的災難電影中,關鍵時刻總會出現一位本領高強、具有獻身精神的英雄,衝出來拯救陷入絕境的人們。但在這本新書中,簡錫增先生告訴我們:大難降臨時能夠拯救台灣的,只有全體台灣人民。面對專制大國的吞併威脅,台灣人民可以用「非暴力公民防衛」嚴陣以待,捍衛台灣的人民自決權,以及來之不易的民主與自由。

有些人不願聆聽簡錫堦所言,是因為他們覺得非暴力抗爭軟弱無力。這些人應該認真讀讀簡先生的這本新書,理解他所闡述的「柔弱勝剛強」的深刻道理。還有一些人很天真,不相信中共會動用武力吞併台灣,也不關注當今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經濟崛起並具有封建大一統思維的大國,一個制度性侵犯人權並日趨法西斯化的政權,他們連溫和、愛國的自由知識分子也要加以殘酷監禁,會長久地容忍台灣人享受目前這份自在與安寧?

雖然簡錫增先生的新書強調「非暴力公民防衛」的力量,強調「不合作」是弱勢者打倒強權的唯一利器,但他並不排斥其他捍衛台灣獨立自主的努力。事實上,台灣應該做多方面的努力,例如在外交

上,加強和美國、歐盟和日本的關係;在經濟上,跟中國維持獨立而互惠的往來;在軍事上,發展精銳的防衛武力;在政治上,促使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這些工作都很有難度,可以說如履薄冰,但為了和平、安全與自由,台灣別無選擇。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

近幾年來,和平非暴力蔚為全球反抗運動的風潮。從占領華爾街 捲起了全球反銅臭貪婪的資本主義的運動、北非茉莉花革命後的阿拉 伯之春,一直到二〇一四年台灣三一八公民占領國會運動,以及爭取 真普選的香港占領中環、兩傘革命等,人民有組織或無組織地透過不 合作、不服從等非暴力行動,有的成功地敲響獨裁者的喪鐘,也有的 開枝散葉轉化成更全面的新公民運動。

錫堦的這本新書,透過更多「非暴力公民防衛」的說明與介紹, 讓無時無刻面對中國霸權威脅的台灣,在建立有效和平防衛的行動 上,有了更豐富的想像。

徐世榮/政大地政學系教授、台灣農村陣線理事長

錫堦兄長期與社會弱勢者站在一起,努力為他們發聲,言行皆讓人敬佩,此書是其長期社會實踐後的深刻體悟與智慧結晶。研究權力者當知,權力優勢者不僅擁有強勢的軍警特力量,也會透過意識型態、價值觀念及法令制度的建構,共築一套統領的霸權體系,以此來壓制並排除社會弱勢及反對者。該如何來抵抗並進而破除此一霸權體系的宰制?

錫堦兄所主張的「不合作、不服從」相當重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而這也隱約地與近年來我所參與的反徵收、反迫遷抗爭運動不謀而合。透過一次又一次和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我們在凱道、行政院、內政部……前,展現出反抗的強韌意志力,也透過許多的論述,戳破權力擁有者的迷思與謊言,這使得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變,而這也同時觸發龐大公民社會力量的展現,挑戰及改變此一霸權體系,讓台灣社會更為民主及公義。基於這個理由,樂於為大家推薦。

徐銘謙/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 教授

不用說在台灣,即使是放眼世界,也少見始終保持赤子之心與社會運動熱情的政治人物。或說他從來都不是政治人物,才能一直對社會改革抱持「雖千萬人吾往矣」,堅持左派、公平正義、愛與非暴力的理想到底的初衷。

他也不只是不忘初衷如此簡單而已,不論是在勞工運動、國會議員、和平運動的階段,他利用空檔大量閱讀,憑藉其對時代趨勢的敏銳度與即將引爆的矛盾議題的判斷力,總能在風潮來臨前夕先提出前瞻的運動方向與策略,從落選運動、推動週休二日、社會役、租稅改革、籌組泛紫聯盟、族群和解,乃至培訓國內外抗爭行動者的非暴力訓練。

本書就是這樣的先驅之作,在兩岸關係進入先經後政的「深水區」,藍與綠都受到內部政局的牽制,陷入對中政策進退維谷的困局,台灣與香港的青年學生紛紛起而抵抗「中國因素」侵蝕生活中猶

如空氣與水的民主、人權與自由……在此之前,他已經著手起草以全民「非武裝國防」抵擋侵吞、建構包容和解多元的「理想國家」的新一波運動策略,期盼能從台灣民間社會的觀點,對當前局勢有所突破。

書的開頭仿如宋澤萊《廢墟台灣》的小說布局,時間設定在習近平任期屆滿前、「戰略機遇」即將過去的二〇二〇年,運用國際新聞標題作為鋪陳,簡潔而又逼近真實地營造出兩岸關係的未來預言。從關心兩岸關係發展的研究者來看,包括具有台籍身分、中國學歷的國台辦主任所做的爭取民心的惠台措施,乃至「統一公投」的舉辦等,皆有其合理的時序推演,因而當讀者置身未來困局,或許能更加理解本書於此刻所嘗試提出的解決方案,一條具有跳脫時局的創意與前瞻洞見的可能之途。

陳方隅/青年要好野創辦成員、反貧困聯盟成員、美國密西根州 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一直以來我個人對於兩岸關係的走向都是極為悲觀的,主要原因是兩岸的政、經、軍各方面的差距實在太大,縱使二〇〇八年以來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但我國主政者對中國似乎戒心不足,也常常出現過度樂觀與期待對方善意的狀況,對比習近平上台後的強硬作風,很難不讓人憂心台灣未來的命運。再加上目前所有的主流國際關係學術理論(尤其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之下,身為一個「小國」,更是幾乎沒有樂觀的理由。

從我國三到大三,都是由民進黨執政。在這段時間,只要談到統獨、認同、兩岸關係,在選舉的操作下,好像都變成了髒字。因此,

長久以來人們並不習慣去談論相關的議題,更不用提要如何去「面對」統獨了。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以及永遠如影隨形的「統一」軟硬論述,人們似乎只能任由國際局勢來宰制自己的命運,也只好繼續支持所謂「維持現狀」的暫時想像。

幸好,近年來,公民意識崛起,伴隨著社群網站的興起,我們有更多管道與機會去面對、去討論與中國相關的話題。至少從我這一代人們看來,大家已經可以用開放的心胸去談統獨。近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更改變了原本普遍政治冷感的氛圍。

簡錫堦先生長久以來總是站在社會運動的最前線,而且集結了論述者、組織者、實踐者等身分。這本書告訴我們:「處於危機才是台灣的轉機」,書中不只告訴我們如何認識中國、想像中國、面對中國(政府)的侵略意圖,更告訴我們什麼是非暴力抗爭,詳細討論其可行性、運動方針、組織方式、成功案例(包括印度、波羅的海三國、歐洲各國等等),並提出對公民的行動建議,及對我國政府的實際政策建議。這絕對是迄今對非暴力抗爭最完整全面的討論,更是最積極且具體的倡議。

本書告訴大家,身為台灣的公民,我們應該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去 掌握自己的未來,尤其是面對「被統一」的陰影。讀完本書後,相信 會有更多人了解:公民運動不只是用來向自己的政府爭取人民的權 利,更是用來捍衛主權、面對外來侵略的重要手段。

陳昭如/台大法律學院教授、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

身為主張台灣獨立的女性主義者,我堅決反對中國統治台灣,也不贊成武裝暴力。戰爭中常見的大規模強暴、強迫懷孕與性奴隸現象,說明了武力侵略不只透過槍砲彈藥進行攻略,也經由男人控制並侵犯女人的性與生育,來製造臣服。「你們強暴我們的女人,我們也要強暴你們的女人」,這種以暴制暴的想法與做法,是把女人的身體當成男人的戰場,一點也不女性主義。然而,如果不從事武裝抗爭,我們要如何面對中國的武力侵略?

簡錫堦長年以來倡議的非暴力抗爭、和平不服從運動,提供了一個可能:在對抗暴力的時候,仍可以保有人格與思想的整全性,而不是變得跟敵人沒啥兩樣。這本書所承載的,是他具有感染力的堅定意志與思考,他教導非暴力抗爭的身影,就在字裡行間。請閱讀它,讓我們共同相信並實踐這樣的信念一只要你我一起,沒有武力的對抗,將比武力更有力量。

陳瑤華/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董事長

「非武裝國防」看起來像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哪有可能有國防卻是「非武裝」?

不過,會那樣想是因為「武裝」和「國防」早已被不知不覺畫上等號,好像裝備越多武器,就越能保障國家的安全,而沒有仔細思考:武裝是不是國防的充分必要條件?九一一事件讓我們清楚看到武裝超強的美國,她的人民不但沒有感覺到自己更安全,反而更為恐懼隨時可能出現的武力攻擊。

在簡錫增先生這本充滿前瞻性想像的書中,除了顛覆了窄化的「國防」概念外,更擴大了我們有關「國防安全」的眼界,探討非暴力抗爭作為更積極、機動、基進的國防概念。

翻開台灣對抗外來殖民的歷史,武裝抗爭只會增加難以計數的死傷,反倒是非武裝的反抗讓統治者寢食難安,日治時期的治警事件(一九二三年)和國民政府來台後的《自由中國》案件(一九六〇年)就是最好的案例。納粹占領時期的歐洲,也以丹麥的統治最為棘手,而原因竟是丹麥人民跟隨著盛裝的國王、被解職的公僕定時繞行市集廣場,各種工作崗位的消極不合作,逼得被派到丹麥的官員不斷遭到替換,甚至其忠誠度也被納粹質疑。

簡錫增先生的這本書要我們不要盲目相信武力即國力的迷思,並且重新思考「國防」的真實面貌。

張清溪/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台灣法輪大法學會理事長

我跟簡錫堦是老朋友了,多老呢?五十五年了!說從穿開襠褲就在一起,沒這麼早,但也差不了多少。他是我在八七水災(一九五九年)過後,踏著彰化市泥濘街道去學校報到、彰商初一的同班同學。那時候,我們都是漫畫迷,迷諸葛四郎、真平、哭鐵面、笑鐵面的世代。錫堦是個名人,因為他會畫漫畫。那時的他,意氣風發,很有群眾魅力。

一別多少年,我再次見到他時,錫堦已是立法委員、工運領袖, 也是非暴力抗爭的專家。當年,他用非暴力抗爭主導台灣工運;現 在,他要以非暴力抗爭嚇阻中共併吞台灣。我跟錫堦雖然是同班同 學,但有很多方面像是兩條平行線。錫堦外向,不同於我的內向性格;錫堦領導工運,追求福利社會,要政府多為勞工做點什麼,而我所學的經濟學則強調市場機能,要求政府守本分、不踰矩。但我們有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增進勞工的生活水準,我們同樣都反對中共併吞台灣,他要用「非暴力公民防衛」來對抗中共,我則是在修煉法輪功後有了同樣的看法與做法。但基於以下兩個理由,我大力推薦錫堦這本大作。

第一,非暴力抗爭是表達不同意見的正確方式,暴力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中國要統一台灣,如果用〈禮運大同篇〉的「講信修睦」、孔夫子的「近者悅,遠者來」,把中國建設成像美國那樣具法治、正義與繁榮的國家,統一就算不是水到渠成,也應該是難以抗拒的。但它現在用黨文化、假惡鬥,把中國治理得陰霾不散(環境已經崩潰);無官不貪,無物不假,無食不毒(社會道德淪喪),經濟不能永續(事實上是瀕臨崩潰,這點很多人並不相信,但請拭目以待),還用幾千顆飛彈威脅要「解放」台灣。以這樣的暴力妄想統一台灣,沒門!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第二,台灣人要更關心中國,因為關心中國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捷徑。台灣的國防、外交、政治、經濟問題,甚至社會問題,根源都在中國(應該說是中共)。若中國還是中共那個政權,「台灣問題」會是個問題,一直都會是問題。面對強權威脅,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對,要知彼!錫堦用一則預言式的故事,描述中共侵略台灣的企圖與不利台灣的國際環境等等,我希望這能引起更多台灣人關心中國,其實,也就是關心台灣。

黃之鋒/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

兩年前,在香港的「非暴力抗爭訓練營」認識簡錫堦老師,他跟 我們分享不合作運動和非暴力抗爭的實戰經驗,甚至進行了不少模擬 演練。老師活生生地呈現了這些本來只在歷史傳記或學術討論才會出 現的概念,為香港不少社會運動組織者打下基礎,這與去年那場震撼 全球的香港「雨傘運動」,實在有著匪淺的關係。

聽說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台灣人常喊著一句:「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而本書講述的,正是港、台兩地的人民,在共同面對中國因素的壓迫,以及共產黨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進行統戰工作時,應該如何自處;我深信每位關心自己國家前途的台灣人,看了此書必能得益。

黄長玲/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多年來,台灣有無數參與公民抗爭的人曾經接受過簡錫堦先生關於非暴力抗爭的訓練,或是聽過他關於非暴力抗爭的演講。然而,在這本深具啟發性的書中,錫堦讓我們了解非暴力抗爭不僅是公民運動的一部分,也應成為國防體系的一部分。

對於台灣而言,極端不對等的兩岸軍事力量,始終是台灣國防的重要挑戰。這本書所談的不是技術層面的軍備問題,而是從理念到行動的嶄新全民防禦體系。這是一本台灣需要的書,也是台灣人應該看的書。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媒體改造學社理事長

本書一開始就以不可能、也不會發生的想像場景,警示國人,這多少讓人憶起陳冠中的《盛世》。但也因為荒誕不經,反倒可能產生當頭棒喝的效果,讓人確信和平不能僅止於想像,而且必須是落實兩岸關係的原點。國人必須杜絕妄念,避免浮現那種聯手美、日對抗中國的想像與作為;與此同時,還得在一國兩制、特殊國與國、一中各表、大一中、一中屋頂、邦聯等等名詞與概念當中,進行思辨與充實,乃至於突破實名的束縛,以蔣渭水當年的氣魄,做一當代見證:「世界平和是……人類的最大願望……我台灣人有招徠世界平和的全人類之最大幸福的使命」。

詹順貴/大埔農運律師、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

本書作者先天下之憂而憂,一反台灣社會普遍瀰漫遲早將被中國併吞的氛圍,撰寫有別於社運非暴力抗爭的反併吞公民集體防衛行動策略。書中特別舉例印度、波羅的海三小國,如何透過「不合作、不服從的非暴力抗爭運動」,迫使英國與蘇聯不得不放棄武力鎮壓,同意獨立,諄諄提醒台灣人民,只要充分準備與團結,即足以讓非暴力的公民防衛力量發揮如核彈般的威力,嚇阻中國併吞。

筆者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熟悉對抗自己政府的不服從抗爭運動。 但本書是以相同原理,演繹發展為公民集體防衛權,並推演到極可能 即將必須面對的反中國併吞實際行動策略之上,內容精彩豐富而且實 用,令人激賞。鄭重推薦給熱愛台灣民主自由的讀者。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台灣和中國未來應如何發展?雖然台灣內部有許多分歧,但充分 理解中國的多樣面貌,恐怕是採取任何主張前,都無法忽視的重要關 鍵。而即使如此,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統一」台灣的想法並未改 變,該如何面對?是我們必要面對的課題。

本書透過「預言」,假設了中國利用「統一公投」併吞台灣。這個溫和手段,正當、合法的程序,讓台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怎麼辦?或許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問題。

長期主張、參與非暴力抗爭的簡錫增提出了「『非暴力公民防衛』是人民力量的核子彈,能『嚇阻』中國併吞」的策略,這不僅是作為「壕溝戰」的應對方式,也是國際戰略的另類參考。這本書回顧了台灣非暴力抗爭的經驗,整理了非暴力對抗的策略,也為兩岸關係提供了新的想像。

顏厥安/台大特聘教授、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長

三十幾年前當我還是中學生時,就閱讀過哲學家羅素的「相對政治和平主義」主張,亦即原則上國家(所以是政治的,不涉及個人絕對拒絕運用暴力之信念)應放棄使用武力,僅在極少數情況下,例如面對希特勒的侵略,才能使用武力。我並沒有完全被說服,但羅素的論述使我長期以來一直對和平主義、義戰、非暴力抗爭、公民不服從等理論有著高度的興趣。錫堦的「非暴力公民防衛」,開啟了我另一個巨大的視野與理論想像,讓我重新思考面對專制中國的軍事威脅下,「非暴力抵抗行動」的精神、哲學與政治意義。推薦此書,值得認真閱讀思考。

魏揚/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

近幾年,台灣街頭以非暴力抗爭進行「全民抗暴」的運動層出不 窮,不斷挑戰我們對「抗爭」的想像邊界。不同運動者紛紛以身體為 武器,探問「面對國家暴力時,人民應如何行動」?在諸多運動路徑 中,非暴力抗爭、公民不服從等型式日益獲得重視,值得我們進一步 了解。

長期致力發展非暴力抗爭理念的簡錫增先生之著作更進一步提出 詰問:走出社會運動領域,非暴力抗爭又能如何協助台灣人抵禦中國 的武力侵略?當國內保守勢力不斷以「台灣武力無法抵禦中國」為 論,遙遙應和北京並打壓台灣主體論述時,我們若輕易卻步、放棄對 獨立主權的堅持,無非承認「人民無力抗暴」,進而放棄抵抗權。因 此,無論面對政府、外國強權或資本及財團,人民的「不合作、不服 從」即是一種基進抵抗,也是「全民抗暴」精神的真正體現。

作者序:期待台灣建立全民的非武裝國防

市面上不乏「非暴力抗爭」理論和方法的出版品,卻鮮少論及台灣經驗及本土需求,這觸發我提筆的動機。這本書希望能讓讀者很快地了解非暴力抗爭原理、甘地「Satyagraha」的哲學,提供給社會運動工作者非暴力訓練和指揮要領一如何防止挑釁、煽動、起鬨等失控情事,而遭主張暴力者破壞;更希望進一步探討怎樣從社運層次的非暴力抗爭提升到「非武裝國防」,增進國人捍衛民主、反併吞的信心。而這樣的理念倡議與對話,或許是台灣當前亟需的社會工程。

相對於中國,台灣在政治、經濟及外交處於絕對的劣勢,社會瀰漫著遲早會被統一的悲觀意識。近幾年來,執政者以建構「兩岸和平」為政績,實則為一種屈服於中國的投降式「乞和」,但中國的武力威脅從未緩解。

和平不是投降,「公義的實現」才有真正的和平。高唱「一中原則」,被解讀為放棄主權。當前的和平假象,反促使國際社會誤解「兩岸正趨向統一」,美國民意及國會因而興起「棄台論」。國際上,在「一個中國」共識下,一旦台灣被併吞,將屬於中國內政,歐美各國只會「聲討」,絕不可能為台灣出兵、與中國為敵,犧牲其在中國這個超級大市場的經濟利益。

中國以經貿利益操控台灣政治和媒體,「中國因素」在各個層面發揮了淋漓盡致的影響力,台灣一如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手掌心,「終極統一」的思維油然而生。由於兩岸關係日趨弛緩,許多人都認為不可能打仗,或聲稱中國以經貿手段就足以逼使台灣就範,卻忽視「台灣認同」與「捍衛自由民主」潛在的民間爆發力。中國政府不讓港人真普選,履行充分自治承諾,強行打壓民意,「一國兩制」統戰伎倆,在台灣近乎破產。台灣人深怕統一之後,言論自由被剝奪,民主生活方式被犧牲,一如香港淪為殖民地。

即使在中國威脅下,兩岸領導人無論是簽訂「統一協議」,或操作「統一公投」,想藉以完成統一,都會引起台灣民眾大規模反抗,激發台獨聲浪高漲。中國運用武力占領並接收台灣,將是不得不為的手段,也是台灣必須面對的最壞打算。試問軍力已無法保衛台灣,美國又不可能為台灣而戰,我們還有何力量保國衛民?大多數人都提不

出答案。談到不妨採取「非暴力公民防衛」時,則會立即回應:那是 沒用的,對付不了極權的中共。

印度獨立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以非暴力抗爭獲取成果,普遍卻認為甘地和金恩所對抗的是民主國家,對手有道德感,非暴力抗爭才會有用。事實上,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的獨裁殘暴,以及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白人政府,對於國際經貿制裁完全不予理會,持續殘害黑人,兩者比起當今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塞爾維亞和南非民眾卻能秉持人道、公理,以非暴力抗爭奪回政權。諸多不可能與問號,就等讀者來一探究竟,了解非暴力公民防衛的方法及其致勝要領。

期盼在本書出版後,能有更多的民眾理解及支持,共同催生非暴力公民防衛的建制,透過遊說朝野人士,最終能在國防部建立「併行」的防衛體系。所謂「併行」,是指在中國武力來犯時,以精銳軍力防衛反擊,制敵機先。「戰爭爆發」將鼓舞國人士氣,並引起全球關注、譴責中國侵略。一旦敵軍登陸,改採非暴力公民防衛,以「不合作、不服從」方式來徹底抵抗,使其統治無效且無動武正當性,並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援,直到擊退侵略者,恢復自由民主的生活。或也可因此促使中國加速民主改革,建立兩岸良善久安的兄弟關係。

請推介此書給你的朋友,在臉書、網路討論此一想法,產生更多 具創意的做法,以補強個人的不足。積極者請來參加非武裝國防的建 制行動,增進國人信心,團結民力,嚇阻中國併吞企圖,讓台灣有機 會成為人道、和平、均富的理想國度。 很榮幸獲得這麼多位經驗豐富的社會運動者和學者為文推薦本書;「讀書共和國」社長郭重興和「我們出版社」總編輯賴佩茹的支持,資深編輯李光欣的協力,潘小俠、黃子明、邱萬興等朋友提供動人的照片,讓這本書得以更親和的面貌呈現,在此一併致謝。

簡錫堦

第一章 台灣末日預言

二〇二〇年二月,中國成功併吞台灣

路透社二月十九日國際新聞頭條:「統一公投爭議演變成政治風暴,台獨民眾占領總統府,未上任新總統連正文流亡北京。」國際主要媒體爭相報導相關新聞。

美聯社二月二十五日新聞:「台灣軍事政變流產,將領分裂;民眾燒毀親中媒體大樓,街頭喋血,社會失控,中國解放軍蓄勢待發。」BBC頭條:「台灣流亡總統請求中國出兵,登陸台灣平亂。」

BBC三月十三日新聞標題:「中國稱順應台灣統一公投民意,進行接管,宣布戒嚴,重建秩序。解放軍全面控制台灣,中國任命連正文為台灣勘亂臨時特首。」日本《讀賣新聞》:「美國總統強生嚴厲譴責中國非法占領台灣;中國動用武力併吞台灣,引起日本極度不安,擔心中國揮軍再度占領釣魚台,挑釁日本。」BBC以大篇幅新聞評論,分析中國併吞台灣事件。

美國「棄台」政策定調

自從二〇一〇年起,美國官員和智庫興起「棄台論」,認為中國的經濟和軍力快速成長,國力強大,美國已無餘力保護台灣安全,與中國修好則可為美國帶來最大利益,因而主張修改《台灣關係法》,表明尊重兩岸皆承認「同屬一個中國」,美國不宜干預中國內政,願協助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

二〇一八年,美國截獲情報,中國利用《中國古巴軍事安全協定》,在古巴祕密部署具核子彈頭的中程導彈,嚴重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甚至還提供威力強大的武器給伊斯蘭恐怖組織,以換取石油開採權。美國向聯合國要求成立委員會進行調查,遭到中、俄、中南美、中東及非洲親中國家群起反對、杯葛提案,讓美國深感焦慮。

同年十月,中國以優勢軍力占領釣魚台,驅逐駐防當地的日本自衛隊。中日戰爭危機乍現,美國介入調停。「台灣問題」竟成為附帶談判議題,使得討論多時的「棄台論」正式成為美國兩岸問題的新政策。中國於是撤出釣魚台,恢復日本暫管現狀。中國「圍魏救趙」的戰略成功,併吞台灣指日可待!

國台辦主任王兆基在台遇刺身亡

王兆基,出身外省第二代台灣人,北大國際關係研究所畢業後, 歸入中國籍,任職外交部,是中國「拔台青」政策重點栽培的台灣青年。其以中國公費留學,取得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回中國 後沒多久就被任命為國台辦主任。

上任五年來,王兆基在黨中央為台灣人利益多所進言,替台商爭取特別融資、市場通路優惠;推動「共築中國夢計畫」,優先開放在大陸打拼的近一百萬台灣人及親屬申請中國護照,方便考任公職及專業證照,在「內地」執行業務;若台商將企業總部移到「內地」,登記為中國籍,就享有國營企業合作、承攬的特權;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個城市設「國台辦服務處」,服務台灣民眾;多次救援遭菲律賓、印尼挾持的台灣漁民;擊退海盜,搶救台灣商船;擺平台商國際

紛爭……因而深獲不少台灣民眾肯定。自二〇一九年起,又開放居住 在台灣的民眾申請中國籍護照,以便受中國的庇護。

後續更擴大「拔台青」就學、就業服務,規定各公營事業招募人員,需有一定比率雇用台灣青年;私營企業雇用台青,每雇用一人,每月補助企業三千元人民幣,增加台青就業機會;協助在中國創業的台灣青年取得融資。台灣青年赴中國就學,優先核發學費及生活補助。「瘋中國」成為台灣年輕人討論的話題,赴中國留學人數已高於留學歐美的總數。

台灣早已是個超高齡社會,老人占總人口逾十五%,扶養負擔沉重,尤其軍公教及公營事業勞工所得高,領取的退休年金太過優厚,使得各類年金瀕臨破產。青年世代扛不起扶養重擔,發起「棄養運動」,迫使政府進行年金改革,折半發給,導致退休老人生活艱困,自殺事件頻傳。王兆基鼓吹台灣保險業投資,協調中國地方政府撥地,專案建設「台灣安養村」,村民獲得的醫療及生活照顧比在台灣舒適,花費卻不及台灣的一半,吸引中產退休族瘋狂搶進。王兆基造福台胞又添一項政績。

王兆基宣稱,雖然黨中央定調「台灣前途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 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但他認為不用怕台灣人片面辦公投,其 結果可供中央「參考」,如果「統一公投」過關,可謂美事一樁。所 以積極催生統一公投,並取得中央默許。

二〇一九年十月,立法院泛藍立委為了兩岸和平,長治久安,不顧民進黨反對,強行通過「統一公投」提案,並決議配合二〇二〇年總統及立委選舉時一併實施。統獨對立再度撕裂台灣社會。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距離公投僅一個禮拜,王兆基在記者會中宣達中國政府指示:警告台獨分子切莫趁機「搞亂子」,影響民意,致使公投不公正,否則「中央」絕對不會坐視,「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共同寫下歷史偉大的一頁,分享大國成就與榮耀。」……熟料記者會尾聲,突然有人朝王兆基開冷槍,頓時場面大亂。王兆基被飛快送往台大醫院,但已回天乏術。此一事件震驚中國當局,台灣社會瀰漫著「風雨欲來」的集體焦慮。

警方逮捕到凶手李文勵,他假冒《中時》記者,混入會場行凶,但並非激進台獨人士,無人了解他的身分。民進黨懷疑這是中國自導自演的苦肉計,中國則駁斥為台獨分子暗殺又栽贓,真相不明,形成羅生門。民進黨接著指控中國大批解放軍已準備登島,恫嚇台灣民眾,圖謀影響公投結果。同時,台商大老闆們聯合呼籲「為了和平及台灣利益,要讓統一公投過關」。台灣在解放軍陰影及工商業界力挺下如期進行「統一公投」。

連正文總統流亡北京

開票結果,國民黨籍候選人連正文當選第十五任總統;統一公投 同意票略輸三%,但加計在中國的「不在籍投票」數,同意票逆轉小 勝一%。中國舉國歡慶台灣即將回歸。民進黨則質疑中國暗中作票, 同時在解放軍威脅下的投票亦違反民意,因此宣稱此次公投無效。

憤怒的民眾組成綠衫軍與青年黑衫軍,聯合上街頭抗議,並占領立法院、行政院和總統府,高呼「反統一,要獨立,中國買辦連正文滾出來,賣台集團滾出去!」,傾中媒體集團所屬的報社和電視台被砸爛燒毀。

連正文匆忙逃離台灣,暫避北京,泛藍立委人人自危,公投提案 人及黨團三長潛逃出國避風頭,看守內閣完全癱瘓,台灣進入無政府 狀態。

中國策動傾中將領陸軍總司令楊大慶,挾持國防部長派兵鎮壓。 坦克開上凱達格蘭大道,以機關槍驅離占領總統府和行政院的「暴 民」,造成數十人傷亡。第三天,台派將領串聯反包圍楊家軍迫其繳 械,撤回鎮暴部隊。

社會動盪,人心惶惶。股市狂洩,被迫停止交易;有錢人紛紛辦 理移民,房價折半出售仍無人問津。盜匪任意搗毀商店、洗劫財物, 台灣猶如戰亂中的伊拉克。

中國策動鎮壓不成,於是安排連正文在北京召開國際記者會,除了譴責台獨暴民,並請求解放軍登島平亂,恢復社會秩序,保護台灣人民生命財產。



圖說:台灣一旦遭中國併吞,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必將重演。上圖 為1986年因許信良要闖關突破黑名單而爆發的「桃園機場事件」,除 了有警方對接機群眾投擲催淚彈,軍方也出動直升機、裝甲運兵車及 大批特勤隊等兵力(邱萬興攝)。



圖說:戒嚴時期由憲兵組成的鎮暴部隊,不同於解嚴後的鎮暴警察。(邱萬興攝)

中國國務院發言人黎小紅表示,統一公投已表達台灣同胞回歸祖國的心願,中央政府將盡「有效接管」之責任,解放軍準備登陸台灣,保護在台灣的中國子民,並平定台獨作亂,使得台灣盡快恢復平靜,共享中國人福祉。

解放軍登台全面接管

解放軍以優勢軍力迅速鎮壓民眾,被點名的台獨分子及街頭領導 人紛紛被打入黑牢,欽命要犯立即槍決,紛亂平息。台灣既然已納入 中國特區,毋需軍備,中華民國國軍立即遭解散,僅少數軍人在通過 思想考核後轉任解放軍。 中國任命連正文為「台灣勘亂時期臨時特首」,並宣布戒嚴,停止各級政府首長、民代選舉,宣稱等十年後台灣穩定了,才會給台灣同胞選舉權。但選舉制度必須比照香港模式,中央擁有對台灣特別行政區的全面治理權和監督權,包括掌握特首候選人提名權。候選人必須「愛國愛台」,不得選出反對中央政府的特首。

中國領導人完成統一大業的歷史使命。傀儡政府登基唱戲,逢迎拍馬,仗勢揚威。台灣在「被統一」之後,連同香港一般,民主嚴重倒退。「一國兩制」只剩「一國」,已不需要再用「兩制」來攏絡人心,以免內地各大城市要求比照辦理,危及中共專制統治。

以上的劇情是台灣最糟的推估情況,情節並非絕無可能發生。下 一章起將以現狀和處境來做分析,試著找到台灣不失去主導權的兩岸 關係模式—如何用人民的力量來嚇阻中國併吞,捍衛我們民主價值與 生活方式的新戰略。在最後一章,我再來講這個故事的後續發展。

第二章 反併吞的唯一出路

併吞是宿命?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突飛猛進,總產值超過日本,直 逼美國。而且每年軍備預算以兩位數字成長,國力迅速增強,讓周邊 國家深感不安,尤其跟中國有島嶼領土紛爭的日本、菲律賓、印尼和 越南,就連美國也視其為最具威脅性的軍事假想敵。

在香港「回歸」之後,中國視台灣為唯一尚未統一的領土,也一向認為統一大業是中國歷任領導人的歷史使命,同時也是中國人民民族情感的企盼。對台工作是全方位的統戰,除了國台辦,連經貿、外交、情治、學術、文教和國防單位都負有統戰任務。

而經貿更是最直接套住台灣的緊箍咒,二〇一二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的關鍵時刻,多位知名台商大老闆公開喊話,力挺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批判若支持台獨政黨的候選人蔡英文當選,必將造成兩岸關係惡化,重挫台灣經濟,選舉結果因而出現逆轉,馬英九大贏民調原本領先的蔡英文,獲得連任。中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政策,展現出非凡的成效。

中國是台灣企業賴以賺錢最具規模的市場。自二〇〇〇年起,短短十年間,台灣對中國出口占總出口比率從二•五%躍升至二十六%,足足成長了十倍之多!進口也成長了三倍。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過高,顯見台灣經濟已經被中國牢牢拴住,陷入難以自拔的險境,絕大多數的台灣企業都得看中國的臉色。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夏摩(John Mearsheimer)即主張,美國的對台安全承諾,雖然關乎美國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信譽,但美國沒有義務在台灣遭受攻擊時保衛台灣。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有地緣政治的優勢,而且其軍事實力迅速增強,在此情況下,美國已漸失去保護台灣的能力。從二〇一〇年起,美國政府和智庫考慮棄守對台承諾的「棄台論」,逐漸引起討論。

歐洲兩岸事務專家學者更是不諱言,為了和平及經濟利益,歐美國家會不計條件地跟中國妥協,台灣可能因此被犧牲掉。尤其中國正利用台灣的經濟傾斜,向台灣伸出政治黑手,恐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併吞台灣。台灣慘遭亡國的命運,幾乎已成為宿命。

矛盾的台灣人

根據TVBS於二〇一三年所做的民調,七十五%的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僅有二·三%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政治大學選研中心於同一年所做的民意調查也顯示,支持台獨的比率創下歷史新高,六成以上的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由此可知,兩岸「統一」的社會基礎相當薄弱,但台灣人的矛盾心態,卻讓中國併吞台灣有機可乘。台灣民眾的矛盾心理在於,一方面為了經濟利益而緊抱中國,另一方面卻又妄想抵抗併吞,維持現狀。在這樣的矛盾心態影響下,促使民進黨在檢討總統敗選原因時,認為台獨主張是一大主因,而有凍結台獨黨綱之議,並開始談「憲法一中」,使得兩黨的中國政策都棲身於「一中」屋頂下,連不屬於國、民兩黨的施明德等人也高倡「大一中架構」。想要解決兩岸問

題,台灣似乎就只剩下「一中」選項,而落入中國一貫主張的「終極統一」陷阱,未來恐將成為「香港模式」的翻版。

中國對台動武的三種可能

参考二〇〇〇年中國國務院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及其他相關文件,中國對台動武的可能性包括:台灣宣布獨立、台灣發生內部紛爭、外國干預台灣事務、台灣式民主威脅中共統治、台灣長期拒絕談判統一條件、台灣拒絕「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尤其強調「台獨沒有出路,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

馬丁·賴沙德(Martin L.Lasater)在《後鄧小平時期的台灣安全》研究報告中,整理出兩岸發生戰爭的可能情況:美國軍力削弱,無力維護台海安全;美國政治不穩定,發生重大經濟危機,行政立法癱瘓;日美同盟讓中國感受到迫切危機;美國改變政策,積極支持台獨或統一;受「棄台論」影響,美國國會或人民對台支持度降低;美國拱手讓出西太平洋霸權;中國領導階層出現不穩定現象;中國試圖教訓台灣;中國企圖成為區域霸權;中國採取反美策略;中國改革後繼無力,藉由攘外以安內;台灣政局不穩定,出現權力鬥爭,落敗的一方要求中國干預;台灣故意製造台海危機,以獲得美國支持其「獨立」;海上意外事件,導致雙方開火交戰;中國相信台灣已漸脫離其掌握,恐怕統一無望;台灣舉行公投,表示要獨立,或宣布獨立;中國加大促統壓力,致使台灣藉故暴衝;台灣軍力積弱不振,解放軍企圖武力試探;台灣司法判決傾中將領洩漏重要國家機密。

另外,國防部發布的《二〇一四年中共軍力報告》及國軍《五年 兵力整建及施政計畫報告》,判斷未來共軍若有足夠的兩棲戰力,或 者是情勢緊迫需要,即有可能侵台。而所謂的「情勢緊迫需要」有三種可能狀況:一、台灣改變現狀、宣布獨立;二、台灣內部發生政治動亂;三、中共領導階層出現重大變故。國防部的分析,印證了賴沙德的預測。

國防部指出,近年來,共軍的兩棲戰力明顯提升,例如烏克蘭出售給中國的「野牛」級大型氣墊船,可以搭載將近一個營的兵力,只需兩個小時就能迅速抵達台灣西部灘頭,而且能在魚塭、潟湖等難以搶灘的地區登陸。目前中國有四艘「野牛」級大型氣墊船,未來如增購或仿製,將對台灣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中國的首要戰略目標,希望不出一兵一卒 就拿下台灣。中國認為,只要在國際上持續封鎖台灣,在經貿上套住 台灣,並且施加足夠的壓力及軍事恫嚇,就能讓台灣乖乖就範,完成 其統一大業。

但現實上,台灣人對中共的專制統治極為反感,眼見香港市民連「普選特首」的要求都不可得,「一國兩制」在香港只剩「一國」,並逐漸「西藏化」,台灣人反對統一的聲浪因而與日俱增,贊成立即統一的僅剩區區二·三%。中國企圖以經濟圈套套住台灣,對台讓利,以經促統,並不如預期的樂觀,武力促統恐將是中國的終極手段。

台灣只能抵擋共軍三天

一九九九年,我在立法院質詢國防部長唐飛,一旦共軍犯台,國 軍能抵擋幾天?可能是幕僚並沒有為部長準備這題的回答範本,唐飛 先是愣了一下,接著才回答說:「最少可以抵擋三天。」這場答詢於 是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新聞。之後,幕僚向部長建議,若再有立委問 到這問題時,要改口說:至少可以抵擋七天,撐到美國前來救援。

二〇一四年,國防部長嚴明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國軍最少可以 守一個月。同一年,其前任部長李傑才剛說過可以抵擋兩週,不過短 短幾個月,國軍的戰力就足足增強了一倍以上,哪來的神助?

近十五年來,中國的軍備預算以每年十二%到十七%的速度增加,反觀台灣的國防預算卻不增反減,軍力懸殊應該日趨嚴重才是。 嚴部長的說詞,恐怕只是用來安慰國人及爭取預算而已。

我們的軍隊究竟能抵擋共軍多久?原本就難以估算,只能就人員和裝備數據做比較。至於官兵的士氣和無形戰力就無法評量了,不幸的是,我國對軍人的國家認同教育,是以「反台獨」、「要統一」作為中心思想,兩岸領導人也都以「一中」作為共識,這也難怪會有退役將領這麼說:「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目前至少有一百二十幾位退役將領穿梭在兩岸之間經商,辯稱是從事兩岸和平交流。國家認同充滿矛盾,致使軍人不知為何而戰,才是台灣直正的危機!



圖說:因主張台獨而被扣上叛亂罪的鄭南榕,於1989年4月7日自 焚而死。圖為5月19日出殯當天,有上萬民眾隨著隊伍途經總統府,不 久即發生詹益樺自焚的不幸。(邱萬興攝)



圖說:1995年4月16日,台灣教授協會等團體發起「馬關條約一百年·告別中國大遊行」,訴求「廢除國統會、制訂新憲法、加入聯合國、保衛咱台灣」。(潘小俠提供)

非暴力的力量

印度遭英國殖民統治四百多年,印度人民不曾擁有軍備,甘地以非暴力抗爭方式,帶領民眾到海邊「違法」製鹽,抵制鹽稅,從生活中的剝削體認殖民統治的暴政。甘地以身作則,親自動手紡紗、織布、縫製衣服,帶動風潮;發起拒買英國布匹和進口商品,抵制英國的專賣利益;發動罷工、拒絕繳稅、占領鹽場,以對抗政府;鼓吹印度人辭掉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地方政府官職;甘地還進一步採取絕食抗議行動,迫使政府釋放政治犯,並且促成印度人民團結一致。

甘地採取「不合作、不服從」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儘管英國殖民 政府動用軍警鎮壓及司法迫害,卻始終徒勞無功。非暴力抗爭讓統治 者沒有動武殺戮的藉口,而且動搖了其統治正當性,導致大英帝國無 法再有效統治印度。一九四七年,甘地終於以非暴力抗爭打敗了當時 仍為軍事強權的英國,完成印度和平獨立,立下了不朽的典範。

一九八九年,波羅的海三小國一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也仿效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來對抗蘇聯,爭取獨立。這三個國家都成立 「非暴力公民防衛中心」,負責研究、訓練並擬定全面抗爭計畫,指 揮民眾以非暴力方式來抵抗蘇聯統治者及其軍隊。

不靠槍砲防禦,人民以堆積石塊、廢家具、廢棄車、木材、大型 卡車、推土機來構築障礙物,挖掘防戰車壕溝,阻擋坦克和軍隊入 侵。民眾用身體當人牆,擋住部隊進入村莊,及保護電台和議會…… 使得敵軍難以發揮戰力,只發生了少數殺害事件,軍人即承受沉重的 道德壓力,拒絕再執行殺戮。

民眾對蘇聯所發布的命令及法律,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或公開抵制,或暗地破壞、干擾、阻止,妨礙其施行,蘇聯的控制手段頓時失靈。「非暴力公民防衛中心」甚至發動大規模罷工、杯葛、公然違法、離開工作崗位等全面抵抗,癱瘓蘇聯的統治。

一九九一年,波羅的海三小國終於獲得獨立。犧牲最少的人命, 國家設施幾乎沒有遭到破壞,這是非暴力爭取國家獨立的傲人成就。 在抗爭過程中,不但在國際上得到普遍的同情,甚至促使蘇聯發生分 裂,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表態,批判中央政府荒謬動武。 在拉脫維亞,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占了將近一半的 人口;立陶宛也有四成人口並非立陶宛裔,但這兩國投票支持獨立的 人,都超過總人口數的六成,甚至達到八成。顯見以非暴力爭取和平 獨立,比較容易獲得不同族裔的信任與支持。

獨立之後,立陶宛在其國防部設置了「公民安全署」,目的是「為有組織行動的非暴力抗爭做準備」,將它納為與武裝部隊平行的單位。此外,波羅的海三國還共同簽署了《公民防衛合作協議》,建構波海三國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除了技術訓練與資訊共享,當其中任何一國家遭到外敵入侵時,其他兩國有義務提供公民防衛所需的援助。

民眾對非暴力公民防衛了解得越多,信心就會越增強。瑞典、奧地利、瑞士、荷蘭、芬蘭、丹麥、挪威及南斯拉夫等國均將非暴力公民防衛納入國防政策中。一九八五年,奧地利的國防計畫將「公民抵抗」列為國防力量必要的一部分,而且應該逐步增加其比重。一九八六年,瑞典國會通過法案,把非暴力公民防衛正式納入「總體國防」政策,成立常設委員會,分階段擬定發展計畫。一九八九年,挪威也將它納入總體國防政策中。一如上述,北歐國家的軍事機構早已不排斥非暴力公民防衛,並積極投入非武裝國防的研究。這些國家因為加重非暴力公民防衛的比重,國防預算也因而逐漸減少,其中瑞典的國防預算占GDP的比率已不到一。四%。

曾有人向甘地提出質疑:「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會屈服於你的非暴力威脅嗎?」

甘地回答:「這絕對不是威脅,而是在教育人民。一個國家如果 想要自立,就應該知道所有爭取自由的方法和手段,但大家通常只知 道訴諸暴力。非暴力完全不涉及暴力和武器,我有責任跟民眾說明清 楚它的做法和守則。我從不懷疑英國政府是一個強大的政府,我相信 非暴力抗爭是達到自治的唯一方法。」「一個不靠武器力量爭取到自 由的國家,就不需以武力來保護其自由」。

非暴力公民防衛是人民手中的核子彈

由於台灣對非暴力公民防衛一直欠缺討論,民眾必然有許多疑慮,不相信它可以補充或取代軍事防衛。當務之急,應加速觀念啟蒙,學習國外已實踐的經驗,讓民眾了解其力量的形成,認知到強敵運用武力也有許多弱點,進而找到化解的方法。當民眾充分了解後,就會自主參與討論、創新發展,並逐漸建立信心,最終才會相信非暴力公民防衛可以捍衛台灣。

我們有必要遊說國會和各政黨,促使朝野達成共識,盡早建立併 行的公民防衛系統,成立「非暴力公民防衛中心」,將它納入國防體 系,編列預算積極研究,透過教育、訓練、組織、宣傳,有步驟地擴 展。

只要台灣準備好非暴力公民防衛,就等於是在警告中國,一旦貿 然武力犯台,將會遭遇到如大英帝國在印度、蘇聯在波羅的海三小國 一樣的挫敗,反促使台灣達成「法理獨立」。因此,非暴力公民防衛 不只能在中國入侵時展現巨大的威力,也能達到事先防範的功效,讓 中國知道它將面臨長期的群眾反抗,付出巨大的成本,並且會讓它的 占領無效。就像擁有和平的「人民核子彈」一樣,台灣的非暴力公民防衛將具有嚇阻中國併吞的效果。

嚇阻中國以非民主方式併吞台灣,讓它意識到應避免戰爭的損傷 及遭遇無止境的非暴力抗爭,甚至可能引爆全中國的民眾反戰,危及 中共的統治。中國若能珍惜台灣的民主,加快民主改革,基於「民主 與和平」的基本價值,來增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才是兩岸雙贏的最 佳選擇。

台灣「群眾性防衛」的先河

一九八二年,林哲夫教授於加拿大創辦「城鄉宣道會」(Urban Ruran Mission,簡稱為URM),在海外培訓台灣的社會運動工作者,解嚴後才移回台灣廣招學員。我是在台灣的第一屆學員,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艾德·費爾博士(Rev.Dr.Ed File)是主要的講師,課程以社會議題分析、策略選擇、行動計畫等社會運動工具為主。後續包括政黨、環保、勞工、人權、性別、農運、原住民運動、文化工作、學生運動等主要幹部,大多數都參與過URM的訓練,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深受其影響。



圖說:艾德·費爾教授(中)、林哲夫(左)與我在加拿大合影。

後來,我和基督教長老教會林宗正牧師,兩人受證為URM在台講師,接手本土社運的訓練工作,也將台灣特色融入課程中。

一九九〇年,我受邀赴加拿大參與「非暴力抗爭講師」培訓。隔年,陳師孟、李鎮源和林山田發起「一〇〇行動聯盟」,訴求廢除《刑法》第一〇〇條「意圖叛亂罪」。我受命企劃、訓練和指揮非暴力抗爭。將加拿大受訓所學到的知識和技巧,融合社運實戰經驗,首次完美演出台灣版非暴力抗爭,也使非暴力抗爭訓練得以順利推展。

一九九三年及隔年,林哲夫兩度邀請哈佛大學非暴力抗爭權威學者金·夏普(Gene Sharp)來台講解群眾性防衛。這是我首次接觸到這

門新知識,十分興奮。為了啟蒙觀念,林哲夫還出版了金·夏普的著作《群眾性防衛:一種超軍事的武器系統》(Civilian-based defense:a post-military weapons system)一書。



圖說:有「非暴力抗爭教父」之稱的金·夏普教授(中)非常關心台灣。

一九九七年,我和林哲夫訪問波羅的海三國,當時我們倆都在擔任立法委員,所以也邀請各黨立委同行。行程中有機會正式拜會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國會,除了國會外交,也請益當年非暴力公民防衛獨立建國的經驗。隔兩年,林哲夫邀請到曾實際企劃推動非暴力公民防衛的立陶宛前國防部長安德魯斯·布特克維修(Dr.Audrius Butkevicius)

來台演講,分享如何以非暴力策略和行動擊退蘇聯、爭取獨立,並出版介紹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兩國非武裝國防的小冊子。

一九九九年,我受林哲夫邀請,參與創立「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以研究、教育、推動非武裝國防為宗旨。專任研究員黃世毅選譯了許多篇金·夏普的相關文章,努力推展理念。原以為民進黨執政後可以順利在國防部引入此一觀念,成立「非武裝國防研究推展中心」;當時擔任副部長的蔡明憲博士,也是參與URM創立及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的成員,曾試圖影響國防部,但由於陳水扁總統無心推動,加上國防系統抵制,以致於全然無功。國防部雖然提出「全民國防」,但仍是基於武力對抗的思維,完全沒有融入非暴力公民防衛的概念,純粹應付了事。

林哲夫於是退而求其次,希望教育部能把非暴力公民防衛納入軍訓教育課程中,從教育著手推行理念,意外獲得軍訓教官團體熱烈支持。之後,才了解到是因為軍訓教官受到「軍人退出校園」的壓力,正面臨解編、失業的命運,他們一聽到林老師的計畫,等於是找到了留任校園的理由,並非真正了解及支持此一理念,當然也無法達成效果。

林哲夫後來與其夫人回到加拿大,過著退休生活,對於沒能在台灣建立非武裝國防體系仍然耿耿於懷。

近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著實令人憂心,中國無論是經濟或國防,都已強大到足以抗衡美國。在美國,「棄台論」因而甚囂塵上。 加上中國對台「以經促統」的政策成效顯著,台灣藍綠政黨在經濟利 益考量下,若不是傾中,要不就放棄抗中。台灣遭中國併吞的危機與 日俱增,社會充滿焦慮,擔心成為第二個香港。

或許這時才是推動非暴力公民防衛的好時機。波羅的海三國也是在蘇聯即將出兵前,大敵臨門之時,在短短三個月內建立起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不過,他們有長期對抗蘇聯統治的經驗,「非武裝防衛」的研究推展小組也很早就進行準備了。

對於台灣未來建立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我樂觀其成,因為這是 嚇阻、擊退中國侵略的唯一選擇。加速推行理念,建立起台灣反併吞的信心,做好準備就會水到渠成。

全民、全面的「不合作」運動

非暴力公民防衛不同於一般社會運動的非暴力抗爭。它需要更多的思考及擬定策略;必須獲得更廣大的支持,而非為維護特定團體利益、單一議題的社會抗爭;也必須超越黨派、意識形態、階級、宗教及利益團體,讓不同立場的人都能攜手合作,而不互相排斥;也不可強迫人民參與,而必須基於全民的理解與認同。最重要的是,要先讓非暴力公民防衛的觀念被接受,改變單憑武裝防衛的傳統思維,這是最艱鉅的挑戰。

由於社會運動非暴力抗爭和非暴力公民防衛,所採取的「不合作」抵抗的原理相同,所以社會運動非暴力抗爭的經驗越豐富,越有助於非暴力公民防衛的能力。

台灣社運有足夠的非暴力抗爭經驗,甚至已成為台灣民主文化的一部分,只要理解「公民不合作」也同樣適用於國家防衛,將社運非暴力抗爭提升至非暴力公民防衛,就能用來抵擋中共以不民主方式併吞台灣。

台灣非暴力公民防衛的目標,在於嚇阻和擊退中國軍事侵略和政治併吞的企圖。它可以輔助軍事防衛,甚至完全取代軍事手段。全民抵抗,讓中國的占領與統治遭遇困難,讓它所扶植的傀儡政府或藉由軍事政變取得的政權無法鞏固。

統治者的權力得憑藉被統治者的順服,中共若要有效統治台灣, 也必須得到台灣人民的服從與合作。因此,侵略者必定會採取強制手 段,威脅反抗者,來維護其統治權威。而當人民全面「不合作」抵 制,使其喪失權威性,它的權力就會開始解體,統治體制將迅速崩 潰。

金·夏普說道:非暴力抗爭是基於對人類的愛,它遲早會觸動每個人的道德情感。相信沒有人可以在違背良心下,長久擁有支配的權力。因為侵略者同樣知道是非,所以可以採用道德壓力來定他的罪。愛與意志力一定能勝過違背良心的侵略者。

甘地相信愛與自願性受難,最終將融化鐵石心腸的侵略者,能改變領導者及重要官員的意志,並使其支持者背棄他,迫使侵略者屈服。

防衛的真正目的,不在於攻擊並摧毀敵人,而是以保護生命和自由為目標,讓敵人無法征服。非暴力公民防衛不是要成為勝利者,因

此在對抗結束後,就不再存有任何仇恨和報復的心理,讓入侵者不會 產生恐懼、怨恨,或再次發動戰爭,進而願意和被侵略國建立信任的 合作關係。非暴力戰爭能使破壞和傷亡減到最小,戰爭結束即可迅速 締造和平,可謂「和平之戰」。

第三章 非暴力抗爭的操作

適用於獨裁政權

一九九〇年,我受邀到加拿大學習非暴力抗爭。當時曾經跟講師 艾德·費爾博士爭論過,我認為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Jr.)對抗的是英、美這樣的民主國家,所以非暴力抗爭才 有用。而台灣是全世界戒嚴時期最長的國家,國民黨政府殘暴的統治 手段,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代,殺人無數,至今仍然真相不 明。更何況按照台灣《刑法》第一〇〇條的規定,統治者只需羅織 「意圖叛亂」的罪名,就可以把人民判處「顛覆政府」的叛亂罪。鎮 暴警察視人民如寇仇,對付起抗爭民眾,其殘暴行徑遠非英、美國家 所能比擬,如果採非暴力抗爭,等於是帶領民眾去討挨打,以後就沒 有人願意再參與抗爭了,所以非暴力抗爭對「不民主國家」是沒用 的。

聽完我的看法後,老師這麼問我:「台灣從黨外運動抗爭至今, 有沒有遭遇過政府開槍射殺?」

我苦思良久之後回答:「目前還不敢開槍,但是……」

老師沒等我講完就插話說:「你知道英國殖民政府曾經在印度阿姆利則(Amritsar)的扎連瓦拉,連警告都沒有,就直接用機槍對和平集會的民眾開火,造成一千五百多人傷亡,國民黨有這樣殘暴嗎?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者,有許多人被政府縱容的3K黨殺害,民權運動領袖的住家被炸,家人生命遭到威脅;還有警察動用私刑,殘酷殺害黑人,也都沒有受到司法的追究。國民黨政府有這麼糟糕嗎?」日後我

擔任非暴力抗爭講師時,也常和學員分享這段跟老師爭辯的經驗,來 解答他們同樣的疑問。香港和中國的運動者最常提出的質疑,也是 「非暴力抗爭無法適用於對抗北京當局,因為他們是沒人性的統治 者。」



圖說:1988年5月20日,農民團體抗議政府決定擴大開放農產品進口,介於警民之間和平靜坐的學生卻首當其衝,遭憲警強力踩踏、毆打、逮捕,是台灣戰後最嚴重的街頭衝突事件。(黃子明提供)

我舉殺人魔頭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為例,他比當今的中國領導人殘忍好幾倍,一九九五年入侵波士尼亞時,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進行種族清洗式大屠殺,戰後從萬人塚中挖掘出為數眾多的穆斯林屍體,震驚國際!米洛塞維奇在國內採獨裁恐怖統治,命

令軍人殺害異議分子,綁架政敵,選舉作票,但人民卻推翻不了這天 怒人怨的獨裁者。

後來有一群大學生組成「Otpor青年組織」,由其中的十一個核心成員共同研究非暴力抗爭,他們參考金·夏普教授撰寫的《一九八種非暴力抗爭方法》(198 Methods of Nonviolent Action),領導民眾進行非暴力抗爭,最終於二〇〇〇年推翻了米洛塞維奇政權。

另一個例子是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當年的南非白人政府, 其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也毫不理會國際人權組織和各國政府的交 相指責,但卻屈服於黑人群起抵制消費、不遵守政府法令、癱瘓行政 等非暴力抗爭,最後被迫釋放曼德拉,並交出政權。

在我講完例子後,接著播放這兩部非暴力抗爭的紀錄片,在放映 後的討論中,發覺學員對於以非暴力爭取中國民主改革,增加了不少 信心。

使施暴者失去正當性

我在演講非暴力抗爭時,常會先問學員,聽到「非暴力抗爭」,你會聯想到什麼?學員通常會直接回答:「懦弱」、「屈服」、「消極抵抗」、「弱者的哀兵策略」、「用來欺騙對方,伺機用暴力攻其不備」、「最沒用的運動,對統治者無壓力」、「忍受挨打博取同情」。

我很少直接回答這些誤解,而是以兩項「體驗式演練」來解說非 暴力抗爭的原理。首先,將學員每六人分為一組,要五個人合力抬起 另外一名學員,五個人分別抬兩隻腳、兩隻手和驅體,盡量舉高。問被抬舉者的感覺,通常他們會說覺得很舒服,像勝利者被舉起歡呼一樣,感覺很爽!然後,請抬左腳的學員離開,再請抬右手的離開,隨後抬左手的離開,抬右腳的也跟著離開了,最後抬身體的離開,被抬的學員就跌落地上。

分享討論時,請各組被抬的學員先說說他們的感覺,他們無一例外,都表示當抬舉的人一一離開時,很害怕摔下來,不再覺得舒服了,搖搖欲墜讓他們很不安,危機感也越來越重。然後,由每個學員來分享他們對這體驗的心得,接著我再來講解非暴力抗爭的原理。

此一演練的目的在於讓學員了解,統治者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予,經由人民的同意、支持與合作,他才有了正當的統治權。一旦人民切斷對他的支持,不合作,不服從,共同抵制其權力行使,否定其統治的正當性,統治者就會從高高在上的地位跌落下來。也就是說,「不合作、不服從」是非暴力抗爭致勝的關鍵武器。

第二項體驗式演練,我則要求大部分學員扮演抗爭群眾,另外幾位學員扮演警察,用捲起的報紙充當警棍,進行驅散民眾的任務。為求逼真,我要求下手務必要用力。先設定狀況一:民眾可以用各種方式抵抗,包括搶警棍、推警察都可以。演練完後,再進行狀況二:抗爭民眾靜坐不反抗,用眼睛溫和地盯住警察的眼睛,以身體承受警棍,不辱罵,不喊叫。

演練完後,先請幾位扮演警察的學員分享對這兩種狀況的感受, 他們都認為狀況一因為民眾以暴力相向,所以覺得施暴有正當性,越 打越爽、越用力;至於第二個狀況,因為民眾並沒有採用暴力對抗, 而是以身體挺木棍,驅散時,警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打了兩三個人後就打不下去了,只用木棍輕點在民眾身上,應付一下上級要求就算了。

這讓學員體會到,統治者即使擁有強大的軍警和裝備,但面對非暴力抗爭者,幾乎無用武之地,等同被迫繳械。當然也有人會懷疑,面對殘暴的獨裁者,若他照樣動武殘殺毫無反抗的民眾,非暴力抗爭者豈不是死得更慘?

非暴力抗爭者和暴力抗爭者一樣,同樣都會面臨危險。但暴力抗 爭者卻正好給獨裁者動武的正當性和藉口,更會激起軍警報復的仇恨 情緒,死傷會更為慘烈。而面對沒有武器、不使用暴力的非暴力抗爭 者,由於欠缺動武的正當性,相對也會減輕傷害。統治者更必須承受 國際譴責及國內民眾同情抗爭者的壓力,有時還會造成軍警抗命,及 政黨分裂,甚至演變成奪權政爭的危機。

甘地被捕後,奈都夫人(Sarojini Naidu)繼續率領兩千五百位非暴力抗爭者,企圖占領達拉沙納製鹽廠,結果遭到警察暴力鎮壓,以棍棒猛擊民眾頭部,抗爭者沒人舉手擋開或反擊,只是井然有序地逼進鹽場,直到被擊倒。這場抗爭造成三百二十人受傷,兩人死亡,警察雖然守住了鹽廠,但其暴力行為遭到世界各國嚴厲譴責,反而鼓舞了印度人的士氣,進一步壯大非暴力抗爭的力量。

一九九一年,蘇聯坦克開進立陶宛首都維爾尼斯,士兵朝手無寸 鐵保護電視台的民眾開槍,共射殺十四名,另外還有七百零二人受 傷,這事件是立陶宛獨立運動中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因而廣受國際關 注,蘇聯政府也受到了莫大的壓力,執行命令的士兵更是深感罪惡與 內疚,而形成蘇聯繼續動武的障礙。七個月後,蘇聯發生軍事政變, 許多軍人拒絕再朝民眾開槍,因而導致政變失敗,這些軍人正是當年 在立陶宛殺害非暴力示威者的同一批軍人。

只要「不合作」就能撼動一切

武力是統治者的優勢,他們擁有強大的軍警和武器;反之,武力卻是弱勢者的絕對劣勢,以自己的弱點去對抗強者的優勢,無異於以卵擊石。武力對抗,形同以暴制暴,讓社會大眾難以分辨誰是誰非,他們甚至會支持統治者的說詞,認為「平亂」有理。

主張暴力者都不相信非暴力能打倒統治者,認為歷史上從來都是用暴力來推翻暴君的,只有武力才是真正的力量;至於完全以非暴力打倒不公義的統治者,始自甘地,至今才六十多年,雖然是近代史中立下典範的和平革命,但仍然無以抗衡數千年來的歷史經驗。

事實上,自一九五〇年以來,以非暴力抗爭贏得改變的,比用暴力多了三倍以上。人們開始相信以非暴力「不合作」抗爭,足以改變制度、政策,甚至是政權。由於已累積了許多成功的例子,也逐漸獲得各類運動者的採行。非暴力抗爭的研究和訓練,在全球都吸引了越來越多運動者投入。

訓練時,要讓學員認知「不合作」是非暴力抗爭的精髓和利器, 我常舉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例子,學員最容易體會。

當年美國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搭乘公車必須從後門上車,並 坐在後面的座位,如果人多,還要讓位給白人。有位羅莎·帕克斯 (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或譯為派克)女士在某個下大雨的午後為了趕公車,她不但從前門上車,上車後還就近坐在前幾排座位,司機要趕她下車,要她再從後門上來,並且坐在後排。她抗議自己已付了車資,為何還要再下車?司機一手抓住她,把她推出車外,還故意弄壞她的兩傘,讓她只能淋雨步行回家。結果這件事引發社區黑人拒搭公車運動,並串聯其他社區加入抵制,或互助共乘,或步行上下班。由於這路線經過的都是黑人社區,抵制運動長達三百八十一天,公車公司因為載不到乘客,面臨破產,迫使其解除種族隔離的陋規。

詹姆斯·勞森(James Lawson)牧師在印度學習非暴力抗爭,回到 美國後,加進基督教精神,形成了一套具美國特色的非暴力抗爭模 式。他接受馬丁·路德·金恩的委託,在其駐牧的教堂成立「非暴力 抗爭訓練基地」,招募許多黑人學生參與訓練。「誓忍者」是訓練的 主要課程,學習的是面對羞辱和暴力而不反擊、不回嘴。他們演練靜 坐於白人餐廳遭人以語言辱罵,在頭上淋牛奶、番茄醬、麵粉,被吐 口水,甚至被施加暴力,都能忍受,不被激怒,也絕不離開座位,直 到被警察带走。禁止黑人進入白人餐廳的禁令,就因他們以這樣的 「不合作」不斷地抗爭,也不怕坐牢,終於被推翻。勞森和學生們接 著又發起「拒買」,兩大百貨公司差點因此關門大吉,逼使政府取消 種族隔離措施。

這些案例除了有《美國黑人非暴力抗爭》紀錄片,也有劇情片 《人權鬥士羅莎·派克》及《捍衛自由》,劇情分別描述這兩則故 事,都是很棒的教材。 「不合作」是非暴力抗爭的手段,除了用來表達訴求的靜坐、和 平遊行,積極的非暴力抗爭還可採取絕食、占領、癱瘓交通、癱瘓金 融、拒絕繳稅、罷工、罷市、罷課、拒買、拒絕服兵役等極具威力的 行動,迫使統治者改變,比暴力更有效果。

台灣沒有暴力的發展環境,暴力者經常採取的恐怖攻擊或打游擊戰,在台灣並不可行。台灣的群眾運動,只有兩次在抗爭中出現過汽油彈,更別說是土製炸彈、爆破電力設備、炸橋梁、暗殺高官、組織游擊隊對抗政府。

楊儒門以白米炸彈引起社會矚目,放置炸彈處,有明顯的小海報警告,並控訴政府欺壓農民。炸彈不具有殺傷力,不致於傷害無辜,只是藉此引起媒體注意,為農民發聲。他的抗爭得到了社會的同情,應歸類為「非暴力行動劇」的類型,不屬於暴力分子的恐怖攻擊。台灣三十年來,不論民主運動或社會運動,沒有任何一次是以暴力抗爭成功的。不論是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黨禁及報禁、廢除《刑法》第一〇〇條的民主改革,或者是勞動人權、性別平等、原住民權益、環境保護等社會運動,都是以非暴力抗爭獲得成果。

三一八學運,新生代占領國會,反對《兩岸服貿協議》,長期抗 爭仍能維持良好的秩序,以身體挺警棍和水柱,突顯警察暴力的荒 謬,成功阻擋黑箱服貿。三一八學運把非暴力抗爭展現得淋漓盡致, 獲得國內外媒體與民眾的高度肯定,「非暴力」世代傳承、創新,儼 然成為台灣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圖說:1990年5月20日「反軍人干政大遊行」(反對郝柏村組閣)中,群眾於現今的喜來登飯店前,以汽油彈攻擊鎮暴警察。(潘小俠攝)

堅持真理

甘地以印度古吉拉特語Satyagraha來命名「非暴力抗爭」,將Satya(真理)與Agraha(堅持)連在一起,創造出了這個新詞。雖然世間尚未有「絕對的真理」,甘地窮其一生追求真理,也未能得到,但至少人類已有共同認知的「相對真理」。只要是發自人性的愛心、是非觀與正義感,就能接近「相對真理」。非暴力者相信「真理就是力量」,即使是擁有武力的統治者,也必須服膺於符合真理的行為準則,以服人心,才能維繫其統治。

相信「真理的力量」,讓非暴力抗爭者在面臨暴力時能夠不畏懼,以堅定的意志力,來改變不公義的體制和制度。一如甘地所言:「必須去關愛、寬恕,不要心存仇恨。使用非暴力比使用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氣。」一心想要報復的人,他的內心是脆弱的。

「愛」是真理力量的核心,愛使得人類社會往正向發展,而恨只會讓社會在黑暗中輪迴。非暴力抗爭者認為,世上有許多的不公平、不公義,有賴我們去糾正它、改變它,而為了不淪為對人的仇恨,所以強調「非暴力抗爭不能針對人」,而是針對制度或體制。當年施明德發起紅衫軍「倒扁運動」,我曾經建議使用「反貪腐運動」為宜。但因為「倒扁」較具煽動力,也較能吸引民眾,「倒扁」最後還是成為運動主軸,而演講者也經常以言論來羞辱阿扁及其家人,以獲取掌聲。此一運動的目的,原本是希望不分藍綠共同攜手建立起反貪腐的制度,結果反而因仇恨語言造成挺扁人士團結反撲,模糊了焦點和是非,非常可惜!

甘地說過:「人與行為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善行應給予讚許, 惡行應加以譴責,但做出善或惡之人,無論好壞都應該受到尊敬或憐 憫。『憎惡罪惡,不要憎恨犯罪之人』,這句箴言淺顯易懂,但能付 諸實行的人少之又少,而這也是仇恨遍布世間的原因。」

甘地還說道:「雖然我經常跟官員槓上,措辭強烈,他們還是跟 我保持友善關係。那時還不太清楚這是我的本性,後來才明白這正是 非暴力抗爭運動的精神。」

甘地曾在南非領導印度移工反抗《亞僑強制登記法案》,這是一項種族歧視法案。在抗爭中,甘地經常與行政長官史莫茲(Jan

Christiaan Smuts)交手,還曾經在四天內被逮捕三次。對於所達成的談判決議,史莫茲卻在事後來個翻臉不認帳,但甘地仍然寬容地相信他,從無怨言。甘地的人格讓史莫茲深受感動,於是主動將法案改成《改善印度僑民待遇法》。甘地表示,大家爭的並不在於法律本身的內容,而在於印證種族平等的原則,要去除種族的恥辱。

甘地在獄中以一雙手編的涼鞋,贈與史莫茲將軍。史莫茲每年夏天度假時都穿著它,甘地七十壽辰時,他將這雙涼鞋回贈給甘地,以示友誼。甘地的抗爭純潔無疵,讓史莫茲不易對付他,使得他無心鬥爭。

非暴力抗爭能不守法嗎?

香港是法治社會較完善的城市,參加非暴力訓練的政黨領袖問 我:非暴力抗爭是不是應該守法?在台灣,也有許多人有這樣的疑 問。

非暴力抗爭對統治者採取「不合作」,常常是在藐視法律,尤其 是要求廢除或修改的惡法,甚至故意以身試法,但也必須坦然接受司 法起訴,或者在法庭內進行抗爭。像是台灣荒謬的《戒嚴法》、侵害 人權的《集會遊行法》等法律,若處處遵守其規範,台灣就難以解除 戒嚴,政策和制度也不會因為群眾抗議而加速改變。三一八學運期 間,學生以「路過」,不依集遊法申請遊行,使得該法形同虛設,這 就是對惡法的抗爭。

當然也不能搞成無政府狀態,例如占領交通要道、癱瘓交通,逼 使政府面對群眾抗爭訴求,加速改革,雖然會給政府帶來無法維持經 濟活動的壓力,但同時也會造成民眾通行不便,所以應該在一週前預告,讓民眾先有心理準備及因應,並且要跟民眾道歉,說明雖然會造成短暫的不便,但將帶來重大的改革,以後大家的生活會更有保障,同時還要開出一條緊急通道,以便救護車和消防車通行。香港占中時,我也跟香港的朋友建議,這樣才會得到民眾的支持。

美國哲學家暨作家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其〈公民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主張:「公平正義是靠道德,而非法律達成的。隨時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因為做正確的事,比遵守法律還要高貴。」這是非暴力抗爭者應有的認知。

一九二二年,甘地因為帶領民眾違法製鹽及鼓吹反政府而被控告,罪名是「引起人民仇視與藐視英國國王在印度建立的政府」。

他在法庭陳述:「我想避免暴力……非暴力是我最重要的信念。 我知道我的同胞有時會失去理智,對此深感抱歉。因此,我在此 認罪,希望獲得最嚴厲的處罰,而非輕度的懲罰。我不要求饒 恕,不懇求從輕量刑。依法論斷我的行為是蓄意犯罪,但我認為 自己是在善盡公民職責,依法判處最高刑罰,我將欣然接受。

政府在扎連瓦拉公園屠殺人民,還下達爬行令,公開執行鞭刑以 及其他莫可名狀的侮辱行為,我仍然極力呼籲合作……希望改革 案能開啟新時代,為印度人民帶來希望。但我的希望一一破滅 了……在旁遮普所犯的罪行不僅沒受到懲罰,罪犯竟然還繼續留 任,有的甚至獲得獎賞(指在扎連瓦拉下達屠殺民眾的戴爾將 軍)。而觸犯旁遮普戒嚴令的罪犯,我認為至少九十%遭到誤 判,而他們唯一的罪就是愛國。法律蓄意或在無意間被濫用,以 圖利剝削者。

我並未對任何行政官員心存私怨。但這個政府在統治期間對印度 所造成的傷害,超過之前的所有體制。我認為,不滿這樣的政府 是一種德行。

法官大人,您必須在兩者中選擇其一。若您認為您必須執行的法律是邪惡的,而認為我實際上是無辜的,那您必須辭職,以脫離罪惡;如果您相信您所協助施行的制度與法律對印度人民有益,因而認為我的作為有害公眾福祉,那您必須對我判處最嚴厲的刑罰。」

法官被甘地的這番話感動了,於是說道:「這可能是印度法官有 史以來遭遇最大的難題,我從沒審判過像你這樣的人,以後也不 會再審判像你這樣的人。就算政治立場與你不同的人,都認為你 擁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甚至神聖的品德。我的職責是審 判你是否違法,而你自己承認違法,你的所做所為,沒有政府會 無罪釋放你的。絕大多數印度人民應該都會為此感到痛惜。我正 在想辦法權衡公眾利益,來判你適當的懲罰。

同樣案例的提拉先生(主張暴力抗英,煽動青年刺殺英國官員)被處監禁六年,你應該不會認為,被歸為與提拉先生同一類罪犯,那是不合理判決。因此,每條罪狀判處兩年,一共六年。雖然我如此判決,但我想說,若印度未來局勢改變,政府能減短刑期釋放你,最高興的莫過於我了。」

而這則故事也是我在回答「非暴力抗爭者是否要遵守法律?」時最常引用的例子。

不可和暴力抗爭交叉運用

許多學員贊成應盡量採取非暴力,但不應排除暴力,尤其,當人 民積怨怒氣爆發時,不妨任其以暴力抒發情緒,或許會有戲劇性成功 的機會。也有領導人在群眾聚會演講時暗示容許暴力,表示採用非暴 力抗爭是不得已的,只要我們力量夠大,就要讓統治者吃盡苦頭,加 倍奉還,因而得到群眾熱烈掌聲,受到莫大激賞,有如街頭戰神降 臨。

一九〇三年,芬蘭反抗蘇聯統治時,芬蘭的伯布利寇(Bobrikov) 將軍不相信非暴力抗爭有用,派士兵佯裝成非暴力抗爭鬥士,潛伏在 抗爭群眾當中,伺機煽動民眾採用暴力,結果給了俄軍殘暴反制的機 會,造成重大傷亡,非暴力抗爭因而受挫。

領導者須有堅定的非暴力信念,不應把非暴力抗爭當作策略之一,半信半疑,或暗示也可以使用暴力,讓暴力有機可乘,因為這麼一來,就難以讓群眾信服,而失去領導者的公信力,同時也會讓暴力者受到鼓舞,導致全面失敗。

我也經過很長的時間研修與實踐,「非暴力」才終於成為我幾近 信仰的核心價值。所以我能理解運動領導人的懷疑,而只把它當成運 動的策略之一,或者是階段性的工具。這讓我了解到,在加拿大研修 時,老師們為什麼會不斷講解甘地的思想。回國後,只要是關於甘地 的哲學、傳記及非暴力運動的書籍,都會吸引我閱讀,成為我和平理 念研修的養分,自己才終於跨過了這道門檻。

防止挑釁、煽動或潛伏作亂

有心的暴力者或統治者派人潛伏,破壞非暴力抗爭,以致民眾遭 到鎮壓,瓦解非暴力抗爭,這是運動發起組織最擔心的事,尤其是在 統治者面臨無法承受的壓力,意圖找動武藉口時,就有可能會出此下 策。

我常帶學員一起討論這個問題,加上自己多年來帶領抗爭,才摸索出來一些處理要領。早期我沿襲美國運動者的方法,重視糾察員的訓練,結果在執行時經常與參與民眾發生衝突。三一八學運時,也同樣碰到這樣的抱怨,認為大家非為「守秩序」而來,群眾的自主性不應被馴化。我建議將「糾察員」改名為「安全服務員」,其職責為柔性勸阻脫序行為,服務參與抗爭的群眾,站在衝突前線維持秩序,防止暴力發生。

但在大規模的抗爭時,不可能有足夠的安全服務員來防止暴力, 「必須靠所有群眾都相信非暴力」,以群體力量來制止挑釁、起鬨及 煽動,所以必須加強現場群眾的非暴力訓練,補強對非暴力的認同。 我較重視講解非暴力理念及釋疑,而非只是傳授技巧。

也只有當群眾都信服非暴力抗爭時,再以「非暴力行動守則」來要求大家遵守,才會有效果。「非暴力行動守則」大致如下:要隨時保持友善的態度;面對執政者或反對抗爭的人,必須跟參與抗爭的人一視同仁,以同情、諒解的態度來加以對待;不用惡意的言詞、口

號、標語去嘲弄譏諷對方,也不私製類似的標語和標示物;對於直接的暴力行為不予反擊,不報復、責罵或做敵意的批評;不攜帶武器或任何可作為武器的東西;遵守決策中心或領導者所做的決定;若無法接受決策中心的決定,可在稍後退出行動,或提出質疑,但請勿在行動進行中做出分裂或爭議行為;可運用「創造性」判斷,並立即付諸非暴力行動,同時保持彈性;若有必要,需有隨時遞補領導者的準備;若已經被捕,就接受逮捕,請勿反抗執行人員,除非人格尊嚴遭到蔑視,才會採取不合作態度。

我們會要求現場參與抗爭的民眾一起複誦「非暴力行動守則」, 請口齒清晰的幹部來宣讀,他唸一句,請群眾跟著唸一句,以了解並 牢記內容。除了要求參與者遵守之外,也是在藉此排除預備動用暴力 的民眾,明確告訴他們:如果不能遵守行動守則,就請離開,他們可 以另外發起抗爭,但絕不允許混入並破壞非暴力運動。為了篩除暴力 者,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帶領民眾複誦一次行動守則,不斷提醒民 眾,也讓中途加入的人能夠了解並遵守。

接著,在演講台上或靜坐場地中央,演練可能發生的狀況。告訴參與者應如何有效處置,不必等安全服務員前來處理。最好是安排志工在舞台上示範,或全體一起演練。以下是我所整理出來關於台灣抗爭現場最常發生的十個狀況:



圖說:台灣近年的街頭運動已有成熟的非暴力抗爭表現。圖為 2008年12月7日野草莓學運於總統府前的「人權出殯」活動,警方並未 強勢驅離。(邱萬興攝)

狀況一:遭受外力挑釁時,有參與者因此情緒不穩,以語言、肢 體反擊。

處理要領:相鄰者立即將他抱住,要求他坐下來冷卻情緒,若無效,則先隔離雙方,並勸告及護送他離開現場。

狀況二:反對者叫囂、辱罵,並向靜坐區丟擲器物。

處理要領:不予回應,挑釁者無法得逞,事端不致擴大。若有人 受傷,可要求警方處理,並護送就醫。 狀況三:遭遇突發狀況,因有人煽動、群情激動,幾近失控。

處理要領:周圍民眾站起來,手臂勾著手臂,圍住騷動群,將情況控制在「點」上,防止形成「面」的擴散。指揮者要求其他參與者坐下,以免因看熱鬧而形成圍觀。一起唱歌、呼口號,即可安撫群眾情緒。把煽動者請離現場,但切忌以擴音器責罵、驅逐,以免刺激情緒,造成失控。

狀況四:出現謠言傳播,使得參與者浮躁不安,這是最容易被操 弄的時機。

處理要領:了解謠言的內容,並分析其影響程度及目的。以正確 的資訊加以澄清,絕不能用欺騙的方式來安撫群眾,以免破壞領 導者與參與者的信任關係。

狀況五:警方舉牌要求解散,並動用警力強制驅離。

處理要領:不可侮辱警察,更不應煽動群眾襲警。指揮者可先與警方協調,並判斷是否應堅持不走。若是,則應要求群眾冷靜, 手勾著手唱歌。因為採取非暴力,警方沒有動武藉口,只能以抬 人的方式驅離,對警方來說是件最費力的事。被抬走時,用手抓 住警察的皮帶、衣袖或褲子,以免身體被放下時,頭先著地而受 傷。

狀況六:警方以水柱驅散。

處理要領:群眾應背對水柱,雙手抱頭,身體趴地,雙腳併攏, 避免水柱百沖,保護自身安全。 狀況七:警方以警車運送民眾到郊區放逐,以防再集結時。

處理要領:採取不要自己上車,也不要自己下車的「不合作」, 警方沒足夠警力抬上車,隨車警員人數更少,更沒能力一一抬人 下車,要求載回才要下車。指揮者應事先宣告再集結的第二地 點,並請參與者相互扶持克服困難再度集結。

狀況八:領導人遭到逮捕。

處理要領:交給律師團法律救援,並由預備領導人補位、第三順 位者備位。

狀況九:參與者多人被捕。

處理要領:律師團接手救援,陪赴警局保護其人身安全,要求合法訊問及釋放。避免形成包圍警局事件,而扭曲了運動的目標。

狀況十:指揮者宣布解散,但群眾不滿,指責領導人軟弱,非暴力抗爭沒用,而採取暴力襲警行動。

處理要領:宣告解散後,幹部應全數撤離,不要成為煽動者的後盾,讓他們孤立無援,起不了作用,以降低衝突。

在現場講解非暴力理念,再以「非暴力行動守則」排除暴力者, 最後演練一旦遭遇挑釁、煽動、起鬨時,民眾應就近立即制止。以群 體力量嚇阻,暴力者就難起破壞作用。

沒有祕密

非暴力抗爭的另一個原則就是,策略與行動都必須透明,向大眾公開,毋須保密,完全不同於軍事作戰或暴力行動。採行暴力抗爭若不保密,策劃者和參與者將遭到逮捕,更無法攻其不備而獲得成功,所以,暴力行動和恐怖攻擊都必須嚴格保守祕密,暗中計畫及執行。 非暴力抗爭則非但不用保密,而且應該主動公開。

在訓練非暴力抗爭時,學員常會問起:策略行動透明公開,等於 是讓非暴力抗爭處於不利的地位,讓對手得以先行壓制,導致功敗垂 成?

其實不然,因為「透明」有助於公開宣傳,號召民眾參與抗爭, 同時也可以讓參與者完全了解行動計畫,進而願意承擔風險和責任, 遵守非暴力行動守則。甘地也說:「不要有祕密,才可以做任何我們 想做的好事。祕密狀態是以圍起保護牆為目的,應鄙視這類保護,公 開地面對所有可能,堅持愛與非暴力的清純。」

非暴力抗爭之所以不需要保密,是因為要建立互信的社會。非暴力抗爭的目的在於「改變不公義的現況,締造有愛、相互尊重的社會」。尊重參與者及抗爭對手,也會得到他們的尊重,避免猜測或誤判而造成傷害。行動公開,至於計畫過程、草案及細節,為了減少干擾,可以不必主動公開,但也不用擔心有人洩漏。

要謹記非暴力的原則——以愛止恨、積極主動、無畏無懼、開誠 布公、自我犧牲、對事不對人,及爭取第三者。

我的非暴力抗爭經驗

◎郭倍宏闖關突破黑名單

一九八八年,我受邀赴美演講,鼓勵海外台獨聯盟朋友回台,當時擔任美國總部主席的郭倍宏,跟我約定在台灣見面。郭倍宏熱心台灣民主運動,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讀書時,為了抗議國民黨海外職業學生行徑囂張,發生了所謂的「海報事件」—郭倍宏等人張貼海報反擊,控訴抹黑,並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行為。而郭倍宏則從此成為無法回台的黑名單人士。

一九八九年,台灣舉行省議員及立法委員選舉,郭倍宏潛回台灣,希望公開為候選人站台助選,拉抬選情。當時,我擔任盧修一和問慧瑛的聯合競選總策劃,郭倍宏透過中間人跟我連絡,接著進行了一整套的「突破黑名單行動計畫」。

我先召開記者會,預告「欽命要犯郭倍宏」將現身站台,並批判 政府不准名列「黑名單」的台灣人回鄉的做法違憲。警政署受到正面 挑戰,祭出兩百二十萬的高額獎金懸賞捉拿郭倍宏。郭倍宏本來就有 被逮捕的打算,但不希望在公開現身前被捕,於是我開始跟警方鬥 智,盡力保護郭倍宏的安全。

若要聯絡郭倍宏或中間人,都是藉由隨機借用的室內電話打到我的叩機(BB Call),我在接到訊息後,立即開車到距離競選總部稍遠的地方,隨機以公共電話依所留的號碼回電話,簡短通話後,兩人都立即離開現場,讓警方無從竊聽,也來不及循線逮人。為了躲避跟蹤,我常在路口連續迴轉,或故意逆向闖一小段單行道,後車如果跟著一再迴轉,或者跟著逆向行駛,跟蹤車就現形了。在跟中間人談詳

細計畫時,我們會約在隨機挑選的KTV包廂裡進行,放大音量,關鍵 處則以文字交談,並且立刻燒毀紙條,把灰燼倒入馬桶沖掉。

警政署擔心一旦郭倍宏現身,會演變成「中壢事件」般的暴動。 我於是跟台北縣警局長溝通,保證堅持非暴力原則,而郭倍宏本人也 有被捕的準備,但希望別在現場逮捕,以免激怒民眾,只要讓郭倍宏 平安現身,之後就可以輕易地逮捕到他。不過,警方仍然堅持要在郭 倍宏現身之前將他逮捕,情蒐工作於是更加緊鑼密鼓。

依照我們的計畫,是要以群眾的力量來掩護郭倍宏現身,並且平安離場。當天,我們在現場發放數萬個印有反黑名單的黑色面具,好讓郭倍宏趁機混進人群,警方束手無策,只好動用數千名警力,將演說會場團團包圍,準備伺機逮人。郭倍宏一如預期現身演講,吸引國內外媒體現場報導。為了掌握現場狀況,不讓激進派人士趁機煽動民眾攻擊警察,我親自上場擔任主持人,掌控麥克風,過濾演講者。當郭倍宏現身舞台的那一刻,全場歡聲雷動。郭倍宏控訴政府「黑名單」做法違反人權,還暢快地發表了台灣獨立建國的願景,並在現場召開記者會,回答國內外記者提問。

我邀請高俊明牧師上台為郭禱告。舞台上,來賓團團圍住郭倍宏,一邊禱告,郭倍宏一邊將白夾克換成黑夾克。我還請現場小販配合,跟舞台燈光一起熄燈,再請民眾把面具戴上,然後宣布散場,郭倍宏則隨著兩名黨工混在人群中平安離開現場。由於軍警在各個橋頭嚴密過濾人車,黨工於是暫時和郭藏匿在附近,一小時後,按照欺敵計畫,由事先安排的桃園朋友來電競選總部,表示郭倍宏已經安全抵達桃園。警方依據竊聽信息撤掉圍捕警力,這時郭倍宏才從容離開現

場。不久後,郭平安潛回美國,台灣嚴密的情治警力徒勞無功,遭到重大打擊。國內外媒體大肆報導,拉抬選情,全台「新國家連線」獨派候選人全數當選。

隔年,張燦耋、李應元、黃昭堂、許世楷等台獨聯盟大將也一一 闖關,終於打破了海外黑名單禁忌,爭取到台灣人的還鄉權及尊重政 治主張的自由。



圖說:1989年,黑名單的郭倍宏在闖關回台後,就是藉著與群眾 一致戴起的黑面具而得以成功潛回美國,轟動全台。(周嘉華攝)

◎第一次最完美的非暴力演出──○○行動聯盟反閱兵

一九九一年九月,我接受「一〇〇行動聯盟」發起人陳師孟教授 委託,擔任非暴力抗爭訓練及總指揮,計畫在當年國慶日上演一場最 符合非暴力抗爭原則的運動。參加者都須事先經過訓練,並宣誓及遵 守行動守則。我們演練了各種狀況,像是防止暴力滲透及挑釁、面對 警方鎮壓驅離等各項模擬。

十月八日,先進行實兵演習,占據閱兵台的民眾慘遭總統府駐衛 憲兵暴力毆打及強力水柱傷害,媒體嚴厲譴責軍方使用暴力,非暴力 抗爭民眾受到肯定及鼓舞。雙十節當天,警方不敢持警棍和盾牌,只 以徒手抬離方式驅散反閱兵民眾,非暴力抗爭成功地將警方繳了械。 由於此一抗爭,後續很快就達成修法刪除《刑法》第一〇〇條「意圖 叛亂罪」相關文字的目標。

在這過程中,許多非暴力訓練及行動成為日後非暴力抗爭的仿效 榜樣,國史館還以專書《一〇〇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記錄此一運 動,作為台灣社運歷史的重要記錄。該運動過程請參閱本書附錄一, 國史館訪談的部分記錄。

◎愛與非暴力,嘉隆女工為計件工人爭公道

一九九二年,板橋的嘉隆成衣廠關廠,工廠遷往印尼,資方解雇台灣勞工,卻不按照《勞基法》規定,以員工實際領取的工資來計算平均工資。由於廠內百多位女工都是計件給薪,每月收入不一,資方主張只能依照基本工資來計算資遣費與加班費,完全違背《勞基法》所規定的工資定義及平均工資的計算方法,然而勞委會卻袒護違法的資方,女工們於是起而抗爭,追討合法資遣費和加班費。

這些女工大多教育程度不高,而心生自卑,缺乏信心。除了讓她們接受非暴力抗爭訓練,我也帶著她們做分析,訂定策略和行動要領,最後還要她們自己做決定。弱勢者通常都很沒信心,不敢自主決

定,很依賴專家為她們作主,或帶領抗爭,但這樣一來,她們將永遠 無法建立自信。其實,從失敗中學習,反省改進,才是最好的成長體 驗,所以我並不代位領導,而由她們自行推選出領導群,這也是我從 事工運的一貫作風。

經由密集的抗爭行動,女工們快速地成長。嘉隆公司的朱老闆,同時兼任台大教授,也篤信佛教。女工除了智取廠內廣場的占用權,也到其關係企業發傳單,控訴朱老闆的不義行為;向台大請求協助,要求朱老闆出面解決;以佛經經文作為遊行標語,召喚朱老闆的良心;埋鍋造飯,夜宿勞委會陳情抗議;突破警方封鎖,直逼老闆的辦公室;颱風天的悲情心戰喊話……種種精彩的創意行動,引起媒體注意及報導。



圖說:嘉隆女工爭取資遣費的抗爭,不僅創意十足,而且也非常 溫馨。(李孟哲提供)



圖說:嘉隆女工爭取資遣費的抗爭,不僅創意十足,而且也非常 溫馨。(李孟哲提供)

最後終於迫使官方要求老闆出面談判。為了讓女工代表有信心, 我們事先模擬談判狀況,演練因應官方和資方的談判策略。最後,談 判勝利,女工們取得了合法合理的資遣費和加班費,也為台灣計件勞 工討回公道,爭取到制度的保障。嘉隆女工們了解非暴力抗爭的真 意,所以並不恨她們的老闆,在談判勝利之後,還有女工不忍地擁抱 著朱老闆痛哭流涕。在這整個抗爭訓練、決策及行動過程中,好友李 孟哲和羅興階全程記錄,剪接成兩小時的抗爭實錄《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獲得當年中時晚報電影獎非商業映演類首獎及台灣人權報 導獎,更是極佳的工運教材,而廣為學校及工會所採用,也成為具台灣特色的工運非暴力抗爭範例。

◎一一○一怠工一小時抗議剝皮法案

一九九四年,當《全民健保法》進入立法院審議時,草案明訂勞 雇五五平均分攤保費,但勞保原本就涵蓋醫療給付,轉移到健保後, 保費不減反增,形成雙重剝皮,台灣勞工陣線於是決議發起「一一〇 一反賤保,怠工一小時」大規模抗爭。

台灣合法罷工的門檻很高,跨行業和跨廠罷工全都在禁止之列。 當時,我擬訂了一套一一〇一怠工抗爭計畫,花半年時間跑遍全台各 個工會,號召大家在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〇一分串聯怠工一小 時,突破聯合罷工的禁令。當時勞委會認為我們不會成功,存心要看 我們出糗,也就沒干預串聯及活動進行。

當天,許多公營事業工廠及民營大小工廠幾乎都熄火停工一小時,除了停轉會造成危險的機器之外,大多數工廠都停工,有些工會還舉行了環繞工廠的遊行。因為是針對政策抗爭,只怠工一小時,資方也都未加以阻擾。立法院助理則在院內提早聚餐吃火鍋,全民計程車聯誼會以計程車包圍立法院,間歇鳴喇叭一小時……各地工會陸續回報怠工捷報,聚集在勞陣辦公室採訪的記者們,一致肯定這是一次很成功的怠工。這次行動展現出了工會團結反剝皮法案的意志,也促使法案朝較合理的方向立法。

◎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與非暴力志工培訓

一九九四年,林義雄先生以禁食方式,計畫號召十萬人簽名連署,要求核四公投。我參與規劃,並負責簽名網絡的聯繫和動員。要是簽名速度太慢,將使林義雄承受更多的痛苦;也擔心萬一不到十萬人簽名,將危及林義雄的生命安全,關心林先生及反核的民眾於是積極動了起來,終於在第六天超過十一萬人簽名,林先生這才開始進食,而簽名單仍然陸續湧入,累計逾二十萬人為核四公投請命。

之後,林義雄先生又效仿甘地的千里苦行,宣導「核四公投,人民作主」的理念,我受命擬定行動守則,及訓練非暴力抗爭。由於林先生的號召,全台灣都有非暴力志工參與運動,非暴力也成為核四公投的標章。此一運動雖然催生出了《公投法》,但林先生認為公投門檻過高,迄今仍在為補正修法持續努力中。而他所寫的《心的錘鍊:淺談非武力抗爭》一書,更是本土非暴力抗爭重要的教材。

◎《勞工投票指南》與「落選運動」

一九九五年,勞工陣線決議發起反金權運動,以提升勞工的政治 思維。我請來當時台大勞工社的林宗弘和何明修等人,幫忙整理及分 析立法院與財團利益相關的法案,後來決定以《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遺產與贈與稅》、《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全 民健保法》、《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等修立法過程,從立委的發言 和表決立場,來檢視其是否力挺財團利益,作為判定「財團立委」的 標準。 勞陣印製了三十萬份《勞工投票指南》廣發到各個工會,決心齊力拉下「財團立委」。時值選舉競爭激烈期間,除了下鄉到各工會演講並串聯,工會還策動會員到財團立委的競選總部進行聲討。媒體多以頭版報導《勞工投票指南》的內容,及勞陣在各地進行「落選運動」的消息,而競選對手也以此資料攻擊財團立委。

結果導致金權立委翁大銘、吳東昇、吳德美等退選,而游淮銀、 葉憲修、劉文慶等落選。被點名的十一個財團立委,淘汰了七成,成 績不差。後來,洪秀柱和劉文慶對我提出「妨害名譽及意圖使人不當 選」的訴訟。不久,洪秀柱撤告,要求和解。至於劉文慶告我的訴訟 案,則以不起訴處分。這是利用選舉淘汰劣質政客,非暴力抗爭成功 的實驗。五年後,韓國社運團體也發起「落選運動」,為值得相互學 習的寶貴經驗。



圖說:1995年,勞工陣線發起「落選運動」,目標是拉下財團/ 金權立委。當時還是台大學生的林宗弘所繪的這幅漫畫,搭配《勞工 投票指南》,發揮了極佳的宣傳效果。

◎第一次嘗試的「抗稅運動」

- 二〇〇三年,我邀集具進步理念和行動力的社運朋友,共同組成「泛紫聯盟」,批判藍綠政黨財團化,提出「社會民主」主張,來跟藍綠兩黨總統候選人較勁。尤其泛紫聯盟訴求「公平稅制改革」,以通俗的語言來宣傳稅制不公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引發社會大眾廣泛迴響。
- 二〇〇五年,泛紫聯盟訴求「公平稅制」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最低稅負制)立法,發起「抗稅運動」,升高反稅制不公的抗爭,逼使兩黨迅速通過最低稅負制立法。

當時,我積極尋求工會與社會團體支持,說明稅制改革的重要性,及最低稅負立法的必要性,並邀請他們加入抗稅行列。不過,由於國人一向不太願意跟國稅局「過不去」,擔心會被查稅,自找麻煩,因此發起之始雖得到社會喝采,但實際加入抗稅者卻寥寥無幾,只有最體已與認同的朋友力挺,勉強湊合三十五位「友情義助」,組成「抗稅急先鋒」。

為了不讓參與者遭受司法干擾,我請來律師及會計師共商,決定 採取中度不合作的抗爭策略。要求參與者據實報稅,但不繳稅,等國 稅局催繳通知來了,才繳部分稅額,再由義務律師提出「爭議」,進 行行政訴訟。經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後,再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最後 雖然被判敗訴,必須補繳稅,但這時運動已成為媒體報導焦點,讓執 政者感受到稅制不公所造成的民怨壓力,因而促成「最低稅負制」的 立法。

時隔幾年後,泛紫聯盟所提出的稅改訴求中,關於提高標準扣除 額、扶養親屬扣除額、薪資特別扣除額,及打破教育特別扣除額一戶 一人為限等,一一陸續實現。在這次抗稅運動中,沒有人被扣押財產,也沒有人遭司法起訴,可說是一場本小利多、極具強度的社會運動。這次「抗稅」的非暴力抗爭經驗,讓我體認到抗稅的不合作運動,儘管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但能克服障礙、敢於參與行動的人並不多,不過仍然值得研究及繼續實驗。

◎紅衫軍百萬人圍城非暴力行動

希望台灣成為「東方瑞典」般的理想國,是我在從事工運時奠定的追求目標。瑞典政府的清廉是其人民願意繳較多的稅,以支持福利制度永續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很重視提升清廉政府的標準,而陳水扁總統及其家人涉貪,尤其讓我灰心,於是參與了《七一五宣言》的發起,這時候的陳總統已經失去了道德威信及人民的信任,此一宣言呼籲陳總統慎重考慮辭去總統職務,但並未獲得執政黨和總統的正面回應。

後來施明德發起反貪倒扁運動,邀我協助非暴力抗爭訓練和指揮。為了避免製造仇恨,我建議不應以「人」作為抗議對象,應該改名為「反貪腐運動」,施雖然同意我的看法,但因為運動已啟動多日,很難再加以導正。

「九一五圍城」及「雙十節反閱兵」是兩大重要抗爭,尤其是圍城當晚,遊行隊伍行經總統府及總統官邸,如果有人煽動暴力,丟石頭、汽油彈,或者衝撞警方防線,如何讓數十萬民眾遵守非暴力原則而不出亂子?所以,我們每天晚上都會在群眾靜坐會場加強非暴力抗爭的訓練。只有讓民眾都相信非暴力抗爭,才可能以群眾的力量來預防及制止暴力。理念的強化最為重要,在群眾場合,用講故事的方式

最有效果,我用甘地、金恩、美國反越戰青年、波羅的海三小國抵抗 蘇聯入侵、南非黑人反種族隔離制度的抗爭、塞爾維亞青年打敗獨裁 者米洛塞維奇等等,來證明非暴力抗爭的效果顯著。

帶領參與民眾宣讀「非暴力行動守則」,並演練遭挑釁、起鬨、警方驅離、推擠、抬人等可能發生的狀況。在演練萬人夜間靜默移師時,所展現出的秩序與紀律,讓在路旁圍觀的民眾也為之動容。學員的學習興致高昂,每一場都有多達數萬人一同參與訓練,同時也增強了大家的信心,願意擔負起完成非暴力抗爭的共同責任。

數十萬人受過訓練,達成百萬人圍城抗爭行動,這是第一次百萬 人參與非暴力抗爭的成功經驗。至於紅衫軍運動後來失敗的原因,則 應歸責於領導人(請參閱本書附錄三〈以紅衫軍失敗為殷鑑〉)。

第四章 值得努力的和平工作

放下仇恨是反併吞的第一步

台灣社會存在著統獨意識形態的對立,這源自於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屠殺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及禁止台語、公務員任用以省籍為考量等各種歧視台灣人的政策,激發台灣意識高漲,也催生了「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民進黨,挑戰「統一為國策」的國民黨。統獨成為藍綠兩黨主要差異,也成了選舉時的訴求主軸。

兩大政黨每逢選舉就會互貼「戰禍」、「賣台」之類的標籤,以操弄族群的低成本選舉伎倆撩撥選民情緒,來獲取選票。兩黨以統獨立場來排擠非我族類,深深撕裂社會,即使是在選後,仍影響民眾彼此間的信任關係。如果不重視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將導致全民難以團結一致抵抗侵略,也會為中國所利用,藉分化台灣內部,達成其併吞的野心。

二〇〇二年,我遠赴幾個二十世紀種族衝突頻仍的地方一北愛爾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進行和平學習之旅。拜會了許多和平團體、難民營、武裝革命組織、學者和政府官員。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平團體如何在仇恨之地進行和平工作的能耐和技巧。此一經驗也促使我在回台後積極從事「族群理解、增進包容」的和平工作。

長期以來,「北愛爾蘭社區合作協會」招募青少年志工,從事老人、貧病、身障者的服務。他們把原本敵視且不相往來的愛爾蘭和英國年輕人混編成幾個服務小組,然後開會討論服務計畫和分工合作事項,其中又以工作心得分享為最重要的討論項目。透過行善,他們相

互欣賞,建立信任和友誼,解開了來自家庭、族群的偏見。原來認為的「敵人」,實際上是個善良、有同情心的好人。看到他們玩在一起,互相捉弄嬉戲,無法想像他們原本相視如寇讎。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國際和平組織發起「約旦河清淨計畫」。 約旦河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共同飲用及灌溉之用的河流,主辦單位 邀請雙方人民開會討論計畫,從提出防止汙染、維護水資源的意見, 到認領分工合作事項,透過互動和協力,完成了此項計畫,也促使雙 方交流來往,降低敵對情緒。



圖說:2002年,我赴巴勒斯坦難民營進行和平學習之旅,對「化解仇恨」有更深的體會。

之後,幾個和平組織進一步合作,挑戰促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 人對話的艱難任務。首先分頭邀請雙方不同組織的代表,安排住在土 耳其某處營地。由於生活在一起,許多設備必須共用,又得在同一間 餐廳用餐,臥室也是緊鄰相間,不得不接觸。禮貌打招呼和回應是破 冰的開始。

隔天,進行「開放空間」會議。主辦單位只設定一個大題目一「促進以巴和平的第一步」,所有參與者都有權利提出想討論的議題,邀請大家自由加入討論。會議第一天,觀望者多,進展有限。第二天,對於風俗文化、歷史觀點有了較多的討論,從爭論中澄清一些誤解,但大家仍然迴避「以巴衝突」此一關鍵問題,或許是彼此還沒有信任到可以討論尖銳對立的議題。第三天,有人提出以色列應退出屯墾區還地給巴勒斯坦人、承認巴勒斯坦建國,最後雖然未能達成共識,但已藉由對話,增加了彼此間的理解。

二〇〇四年台灣總統大選,「愛台」、「賣台」標籤大鳴大放, 激起族群仇恨浪潮。選前又發生三一九槍擊案,陳水扁獲得選民同 情,驚險連任總統。選後國民黨及其支持者包圍總統府抗議,台灣社 會瀰漫著焦慮不安。

當時,我邀請族群議題學者范雲、李廣均,及開放空間操作專家蔡淑芳,一起籌劃「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民間的對話」計畫,獲得公共電視支援暨協辦,時報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也慷慨贊助經費,加入共同主辦。

報名者必須先填寫問卷,表明政黨支持傾向、統獨立場、族群背景、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職業等。為了涵蓋極獨、極

統、不統不獨、各階層及教育程度、城鄉差距,使之能代表台灣的多 元觀點,我們從近四百名報名者中篩選出三十位,一起住在台北近郊 的活動營區,進行對話。

活動第一天,將參與者分成兩組,分別由范雲和李廣均帶領討論,要每個人用帶來的照片講述他自己的故事,包括成長過程、對國家的認同,及族群間相處最不舒服的事等等,打開話匣子,直接切入問題。當晚播映了湯湘竹的《山有多高》,與李明典的《台灣的歷史——在光復初期二二八事件》兩部紀錄片。前者描述一個陪伴老父親回湖南探親的兒子,從他的眼睛看見時代刻在爸爸身上的鄉愁,以及見到人事全非的家鄉後,活在歷史記憶中的腦袋無法安頓眼前紛亂的失措。後一部紀錄片則是追訪噤若寒蟬數十年後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對親人下落的渴望與哀悼;在重返當年槍決現場時,一個世代的壓抑,轉化為集體的追思。這兩部紀錄片,不以言說的了解,而是以同情的理解,直視靈魂深處,讓觀眾簡單明瞭地看見靈魂身後的時代。

一位外省伯伯在看完影片以後,猶豫再三地說:「我願意以個人的身分為二二八事件道歉。」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起先並不認為外省族群需要背負二二八事件的「原罪」,況且他並不是既得利益者,一輩子生活得很清苦,他認為自己沒有因為外省人身分而得到過什麼好處,如果有二二八事件,那是政府的作為,是政府要道歉,外省人不應為了自己不能選擇的族群血液,去為這件個人無法阻擋的悲劇道歉。然而,當他從影片中看見了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的苦痛,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個人願意為此道歉,企圖以其個人單薄的力量,為整個時代的荒謬做出救贖。

另一個感動時刻發生在一位福佬籍女士分享生活故事。她說她的 公司附近有一個賣茶葉蛋的外省伯伯,拖著佝僂的身軀,每天都要推 著攤車出來叫賣,她有次跟老伯伯聊起,才知道老先生賣茶葉蛋是為 了要湊足返鄉探親的旅費,儘管省吃儉用,但還是沒存夠錢。

這位女士心想,一顆茶葉蛋賣那幾個錢,要賺多久才能一圓老先生返鄉的夢?於是她四處跟附近的鄰居、同事招攬生意,叫大家出錢幫忙買。有一天,那位外省伯伯沒有如常出來賣茶葉蛋,隔天也沒見到人,就這樣失蹤了一個多月,她猜想或許老伯伯的返鄉夢終於成行,就回去養老了也說不定。沒想到一個多月後,她竟然又看到老伯伯佝僂的身影和熟悉的茶葉蛋攤,經她一問,老伯伯嚎啕大哭,說自己多年的積蓄被騙光,全都沒了!她也陪著哭了好久。

對於「外省人心不在台灣,把錢都往大陸送」的批評,剛剛那位七十多歲的外省老先生說,他十六歲離家隨部隊來到台灣,父母過世時都無法回家送終,覺得自己對留在大陸的家人虧欠很多,回到大陸時,他把身上的錢、手錶、項鍊、衣服、鞋子都脫下,盡其所能地給,也彌補不了自己深藏內心的歉疚。他沒有親身侍奉過年邁的父母一天,不認為是被家人騙了,而是在彌補自己為人子的不孝。這高貴的靈魂原本不必把一切責任承擔在自己身上,但他試圖以個人的力量向分隔於海峽兩岸的老家和新家的「親人」負責,兩邊的苦痛都那麼真實,糾結在他個人的生命中,一邊是很個人的原始生命經驗,另一邊則是透過看見他人的故事而進入生命中的新經驗。每個個人的生命故事,才是真正決定歷史走向的力量。

在討論中也提到,台灣是個移民社會,除了原住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外來移民,新移民的外籍配偶則是當前族群議題很重要的一環。外籍配偶嫁來台灣常會被歧視為「買賣婚姻」,此外,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也經常聽到「媽媽不聽話,叫爸爸再買個媽媽」、「媽媽很笨,不認識字,也不會講國語」、「便當有蝦醬很臭,讓同學譏笑」、「他們都說我是菲傭的小孩」……諸如此類的歧視性言詞。家庭與社會對外籍配偶的偏見,深深影響其子女對母親的態度。

在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人們必須學會相互理解、包容差異與尊重 多元,不能任由偏見一再複製,否則新移民的子女會因為受到同儕嘲 笑而看不起自己的媽媽,或害怕與同學接觸而一再逃學,漸漸成為中 輟生,更讓人擔心的是,要是他們被不良幫派吸收,極可能出現越 幫、泰幫、菲幫等黑社會組織,對社會加諸於他們的不公進行反撲, 進而加深族群對立。

因此,在主流文化教育之外,還必須加強對多元文化的認知,去除刻板印象與偏見,並以同理心來教育學生看待事物。許多偏見源自於家庭,外籍配偶在夫家備受主流文化及種族歧視的壓迫。當局在受理移民婚配申請時,也應要求其家屬接受輔導教育,理解多元文化,以免日後製造出新的族群問題。

第二天,由蔡淑芳老師帶領大家進行開放空間討論。一開始,有一部分人聚在場外,質疑開放空間討論的效果,及主辦單位幕後操作的企圖等。但到了下午,所有人都回到場內各組,選擇自己關心的議題加入討論。蔡老師純熟的開放空間技巧,使得參與者都能放下己

見,傾聽不同的聲音,並且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盡情發表想法,最終學會理解差異、尊重與包容,改變其原有的偏見。

之後,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串聯各個社會團體,組成「族群和平 選舉觀察小組」。拜訪各政黨,請其簽署《族群和平承諾書》,要求 注意競選言行,承諾不操作統獨議題,以免引發族群對立。觀察小組 於選舉期間監督、警告、批判不當言行,並在投票前公布《族群和平 選舉觀察報告書》,讓政黨認知到操弄族群是不道德的,會被中間選 民唾棄,如此一來,才能有效嚇阻。此後,在立委及總統選舉中,操 作族群議題的情況才大為減少。



圖說:「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民間的對話」營隊中的開放空間 討論。

尋求「和平獨立」或「民主統一」的共識

有鑑於「面對族群與未來一來自民間的對話」成功地促進族群對話,和平基金會接著於二〇〇五年籌劃「從民間對話尋求兩岸未來的共識」。除了原班人馬范雲、李廣均,還找來了徐斯儉、黃長玲、林國明和徐銘謙幾位老師參與籌備。這次活動邀請六十位統獨立場不同的朋友住在一起,進行三天的對話,並引用開放空間和審議式民主會議要領,結果成效超平預期!

會中提出「和平獨立」與「民主統一」的交集,但由於出現「獨立」的選項,使得統派人士有所不安,最後雖然只能達成「弱共識」,但已找到民間可能接受的交叉點。

我邀請黃長玲、徐斯儉、范雲和徐銘謙成立兩岸小組,研究整合統獨雙方的兩岸主張,後來提出《和平與民主的兩岸關係》說帖,主張「和平」與「民主」比起「統一」或「獨立」有更高且根本的價值。如果「獨立」只強調「民主」,輕忽「和平」,以為透過公民投票即可完成「法理獨立」,將無法說服大眾如何避免戰爭;主張「統一」者若只強調「和平」,不強調中國必須民主化,及「統一」必須經由台灣人民公投同意,輕忽「民主」的結果,恐將落入屈服式的「和平統一」。

「和平獨立」的困難,在於它必須得到中國的認可,才能避免戰爭。但其實,台灣只要不貿然宣布獨立,中國人民並不會支持「中國人打中國人」。所以台灣要追求和平獨立,應努力爭取中國人民的支持,共同珍惜台灣的民主與文明。同時也讓中國人民了解:既然華人能搞好新加坡這個「國家」,為何不讓在台灣的華人也有同樣的機會?並承認中國和台灣已經分離近七十年,台灣獨立的現狀對中國並

沒有壞處,讓台灣法理獨立又何妨?互相尊重,互助合作,兄弟相挺,比起強硬併吞帶來抗爭不斷,應該是更佳的選擇。假以時日,中國人民逐漸接受台獨無害論,進而影響中國政府的態度,「和平獨立」就有實現的機會。一九〇五年,瑞典讓挪威和平獨立,諾貝爾和平獎也特別在挪威頒發,象徵和平的意義。兩國成為相互扶持、合作無間的兄弟之邦,或許是最好的借鏡,值得兩岸人民與政府省思。

至於「民主統一」的困難,則在於中國並非民主國家,而且否決了台灣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自行決定。儘管現在中國的GDP總值超日趕美,經濟實力堅強,但在「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以及「全球最幸福的國家和地區」調查報告中,始終排名在末端;總體「優良國家指數」排名全球倒數第十八名;二〇一四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國也被甩在最後十名之內,連回歸後的香港新聞自由度,都連續十二年節節下降,從原本排名全球第十八名,下降為第六十一名……獨裁統治使得台灣人的心距離中國越來越遠。中國若能加速推動民主改革,讓人民都享有投票權,取消言論監控,大步走向民主,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平等善待台灣,到了那一天,中國何需擔心台灣公投?「民主統一」的機會自然會到來。

兩岸未來必須同時滿足「和平」與「民主」的基本價值。我認為「和平獨立」與「民主統一」其實並不互斥,兩者正好補強統獨雙邊論述的不足,也是台灣人民可以接受的較佳選項。台灣必須打破「一中」桎梏,以免步上「終極統一」的窄路。加強推廣討論,可成為全民共識,整合統獨爭議,團結一心保衛台灣。

一九九〇年波羅的海三國推動獨立運動時,拉脫維亞人口結構中,拉脫維亞人占五十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共占四十八%,政治立場從支持獨立到激烈反對的都有。而首都里加,拉脫維亞人只占了三十六·五%,但投票支持獨立者卻多達六〇·六八%。而立陶宛的民調也顯示,九十八%的立陶宛人、七十五%的俄羅斯人、六十六%的波蘭人與七十四%的少數民族都贊成獨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例子值得我們深思、改進。

在台灣,不應把外省人貼標籤,而應增進理解,相信他們愛台灣不亞於其他人,同時也要善待原住民及來自各國的外籍配偶,台灣應先成為理解差異、相互尊重的和平國度,建立起穩固的社會基礎,共同認知我們一起對抗的是違反「和平與民主」、對台灣虎視眈眈的中共政權,團結維護我們共有的民主生活價值,才是一個理性且務實的抉擇。

協助中國民主化

過去兩岸交流幾乎都是經貿往來,由於經濟過度依賴中國,以致於台灣逐漸喪失自主性,「以商逼政,以經促統」成為中國對付台灣的利器,未來應加速發展兩岸民間交流。近二十年來,中國的自主性非政府組織(NGO)逐漸成長,並以各種型態突破政府的禁制。環保和慈善團體最先得到政府默許,又受到國際支援,發展迅速,各類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開始萌發。近年來,沿海各省勞工為爭取權益,罷工事件頻繁;農民捍衛土地及受害民眾的維權抗爭事件每年逾九萬多起;政治改革運動方興未艾,儘管遭受迫害,仍然前仆後繼。



圖說:台灣的環境及人權運動非常活躍而有創意,近年也屢屢形成極大的社會議題,予中國的NGO工作者很好的啟發與鼓勵。左圖為2013年8月18日大埔案於凱道的抗議活動(邱萬興攝)。



圖說:圖為2013年7月20日洪仲丘案,民眾以各種自製的標語包圍 國防部。(邱萬興攝)

在高壓統治下,中國沒有言論與集會結社的自由,猶如台灣的戒嚴時代,台灣的民主運動經驗因而尤其值得文化相近的中國人民參考。中國來台學生和訪台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最有興趣聽我談黨外民主運動、突破戒嚴及社運發展的經驗,也對台灣非暴力抗爭實踐充滿好奇。以台灣多元的社運組織和議題,如果能加強兩岸民間交流,互相觀摩學習,增進理解和情誼,不但可以協助中國民主改革,也能促使中國人民同情台灣的處境。北京當局如果貿然以武力犯台,內部反對的聲浪,也必然會削弱其侵略的能量。

參與國際和平事務

《聯合國宣言》闡明須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於二〇〇二年成立 的國際刑事法院,可對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 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更為具體有效地嚇阻、制裁暴力侵害,中 國若以武力犯台,其領導人也將觸犯上述四種罪行。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兩項公約都開宗明義在第一條就載明「自決權」,以顯示其重要性。台灣的未來必須經由台灣人民公投決定,尊重台灣人的自決權,這是國際社會最能接受的解決方式,也是台灣捍衛自由人權正當的依恃。

外交工作不必花太多心思去用錢買邦交國,因為這麼做往往會讓 貪汙成性的外國政府予取予求,或者挪用台灣援助的經費,去鎮壓他 們的人民,維護其專制統治,或介入政爭,反而讓國際社會看不起台 灣。台灣金援外交的祕密資金被「友邦」政客私吞,不乏前例,像是 所羅門群島總理里尼、尼加拉瓜前總理阿雷曼,及哥斯大黎加總統帕 奇科等人的貪汙醜聞,都遭當地媒體指控是「來自台灣的髒錢」,嚴 重損害我國名譽。

我們的外交政策應改弦易轍,集中力量,針對對中國政府有影響力的國家來進行,例如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各國。外交工作的重點也不在於爭取加入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而是爭取各國政府公開聲明或國會決議:「台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並尊重台灣人民的自決。」

我國外交處境艱難,不妨透過非政府組織來發揮我們的軟實力,爭取國際友誼及對台灣的支持。慈濟基金會、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

路竹會、台灣國際醫療行動協會等民間團體,都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人道救援是台灣爭取國際認同的軟實力,政府應編列預算培養國際青年志工,參與國際維護人權、促進和平、慈善和人道工作。這比花錢 買邦交、當冤大頭來得有意義,也更有助於維護台灣的形象及獲得國際支持。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曾多次與日本和平船組織合作,參與國際和平活動。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卸任前,積極催生全球防止戰爭的NGO組織,經由日本和平船創辦人暨執行長吉剛達也推薦,和平基金會也受邀參與「全球預防武裝衝突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 for the 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簡稱GPPAC)的籌備。GPPAC在全球共分為十五個區,總會設於荷蘭海牙,東北亞區的祕書處設於日本和平船,其成員均以城市為單位來加盟,和平基金會即為「台北夥伴」的聯絡窗口。

GPPAC的各區年會由成員輪流承辦,二〇一三年,台灣爭取到在台北舉辦「GPPAC東北亞區年會」。當年正好發生中日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日韓獨島(竹島),及日俄北方四島(千島群島)主權之爭,各國極右派訴諸民族主義,煽動仇恨情緒。這一年還發生了菲律賓海防人員殺害我國漁民的事件,激起國人憤怒情緒,台菲海域主權爭議隨之升高。

區域年會承辦國有設定議題優先權,只要向東北亞祕書處核備即可。會議籌備由和平基金會董事長陳瑤華教授負責召集,徐斯儉、徐銘謙、吳東傑和我參與規劃,決議在年會前先舉辦一場「台北海洋和平論壇」,針對東北亞島嶼主權紛爭激盪出和平方案,為年會暖身。

陳瑤華和徐斯儉先草擬《台北海洋和平宣言草案》,作為年會討論主題。主張海洋是人類共有的資源,從國際公民的角度思維,海洋及無人島嶼應屬共有共享的自然領域,各國有責任共同維護海洋生態永續,反對任何國家占為私有,並逐漸朝向「世界海洋公園」的概念來發展。

這次出席東北亞區年會的有GPPAC總會祕書處、日本、南韓、俄羅斯、中國、菲律賓、蒙古、香港、沖繩及美國等國代表,北韓代表則因簽證延誤,來不及與會。出席代表所屬國家大多是衝突當事國,卻能從和平觀點達成《台北海洋和平宣言》,因而顯得別具意義,也引起全球夥伴及關心海洋主權紛爭的學者與組織關注。

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很有活力,也促使政府簽署了多項重要的國際公約,例如婦女團體推動簽署的《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身心障礙團體的《反地雷公約》、《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及人權團體的「兩公約及其施行法」,都在國際上受到肯定。GPPAC東北亞區會並促成台灣與中國、南韓與北韓、日本與韓國及俄羅斯的民間對話,增進相互了解。台灣應善用這些國際平台,學習並貢獻,藉以增加國際友誼與支持。

創造希望、平凡幸福的和平國度

近年來,政府強徵民地;企業汙染河川;黑心商品毒害消費者; 政府放任炒房,無住屋者望屋興嘆;薪資水準倒退回十六年前;貧富 差距日益擴大;租稅不公,圖利財團巨賈……這些事件不斷傷害台灣 社會,不滿政府政策的抗爭接二連三爆發,而且往往解決了單一問 題,卻衍生出更多的問題。 從民間發起「國家願景運動」,有別於對抗式的社會運動,除了可降低利益團體角力,更重要的是,正向思考台灣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如何讓人人擁有希望?藉以凝聚全民共識,並促使政黨將它當作政治目標。如此一來,台灣或許可以走出困境,甚至開創出美好的未來。

發揚台灣的優勢,同時參考先進良治國家的發展經驗,讓台灣成為「創造希望、平凡幸福的和平國度」。從生活中實踐自由、平等與團結,締造互助分享的福利社會、幸福國度。人人以台灣為榮,才是萌生愛國心、團結抵抗侵略的保證。

愛國家,愛同胞,才能推己及人「愛你的敵人」。以愛與意志力來對抗侵略者,對方的武力將無法施展;召喚他的道德良心,是非暴力公民防衛的致勝關鍵。

第五章 非武裝國防

中共毋需動武就可併吞台灣

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快速成長,其威脅利誘的影響力,已經大 到台灣無法抵擋。國際上,台灣想跟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FTA),或加入區域性組織,例如東協(ASEAN)和跨太平洋夥伴 (TPP),同樣受中國法力無邊的掣肘。世界各國都想獲取中國龐大 的市場利益,也都承認「一個中國」,台灣倡言「經濟歸經濟」,不 應受中國左右,是不切實際的天真。

試想,萬一中國對台灣實施投資貿易制裁,註銷金融、生技、重工、化工、尖端電子業等特許行業的許可證,取消關稅及企業投資優惠,並緊縮對台開放市場,台灣的經濟將立即崩潰。股市大崩盤、企業紛紛倒閉,失業人口直線上升,進而導致社會動盪不安,如此一來,即可逼使台灣屈服投降,何必動刀動槍?

不和中國搞好關係,台灣的經濟就難以為續,政治和社會穩定勢必受到影響。台灣人不喜歡中國專制政府,但也怕得罪中國,致使經濟陷入危機。二〇一二年台灣總統大選,選民擔心民進黨勝選會搞壞兩岸關係,拖垮台灣經濟,在經濟利益考量下,選票於是在最後一刻大量移往親中候選人,顯見中國已有實質影響力操控台灣選民的投票意向。

台灣雖然自稱是採「雙首長」制的憲政體制,其實卻是實質的「總統制」。總統擁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行政院長的權力來自總統,沒有任期保障,總統可任意予以更換,幾乎完全聽命於總統,不

具有內閣制總理的實權。既然中國能決定台灣的總統由誰來當,有哪個總統候選人敢反中?中國只要影響或操控總統一人,即可搞定兩岸未來的發展。加上經濟制裁和武力恫嚇,使得兩岸經貿與政治談判的主控權完全操之於中國,何時談?要談什麼?台灣的總統恐怕只能任其予取予求。

二〇一二年,中國祭出了「民進黨沒能力改善兩岸關係」的符 咒,導致民進黨敗選,選後民進黨閉門反思,轉舵迴帆,調整其中國 政策,不再反對「一中」,「凍結台獨黨綱」的聲勢難擋,顯見中國 已有能力在遠端操盤台灣政局,使得民進黨不得不向政治現實低頭。 順著這種發展趨勢,將來中國只要釋放給台灣「更多國際參與空間、 高度自治」的可能性,相信各政黨都會急著搶功,連「統一公投」也 可順利通過,屆時還堅持獨立的組織及小黨抵不過大黨的實力,就算 上街頭激烈抗爭,恐怕也難挽回台灣「被統一」的結局。

現在進行式

媒體是控制輿論和民眾思想的重要工具,香港原本是「言論自由」最受國際肯定的地區之一,但在「回歸祖國」後,北京當局即以經濟手段控制媒體。香港大企業無不依賴中國政府的恩賜,中國的巨無霸國營事業,更是香港大企業依存的夥伴,國營企業和香港大企業則是媒體的廣告大戶,廣告又是媒體生存的命根子。在北京當局操控下,想要獎勵或處罰特定媒體,只需指使大企業「給廣告」或「抽廣告」,就足以讓港媒乖乖聽話。近十年來,香港的言論自由評比年年嚴重倒退,原因就出在媒體受到政治黑手干預。

中國在香港操弄媒體的技巧,已經到達爐火純青的地步,運用在台灣媒體上,同樣無往不利。台灣的市場小,媒體多,競爭激烈,不管平面或電子媒體,個個都瀕臨虧本邊緣,經營陷入困境,像是有五十多年歷史的《中國時報》,就拱手轉賣給旺旺集團。賣米果的竟然跨行玩起媒體,「媒體改造學社」便率先質疑其背後恐怕暗藏著「中國任務」。

旺旺集團接手一段時間後,原可自由撰稿的資深記者紛紛被迫離職,該集團的平面和電子媒體在報導政治和社運新聞時,立場明顯傾中,媒改社學者先前的質疑不幸成真,因此聯名呼籲停止投稿給該報,許多學者紛紛響應跟進,不願成為該報的背書工具。社運幹部也聯合拒絕出席其旗下電視台的談話性節目。另外,旺旺還進一步打算購併中嘉網路,要是此一購併案通過,該集團即可掌握十二個頻道及十一個有線電視系統,搖身一變成為媒體巨無霸。學生團體於是發起「反媒體怪獸大遊行」,及時擋下旺旺中時集團壟斷媒體的企圖,並揭露中國正在操控台灣媒體,已危及台灣的言論自由。

不過,社運反抗並無法阻止中國操控台灣媒體,反而促使北京當局加速進行。幾個經營艱困的媒體接連被大企業買走,這些企業負責人所屬的關係企業,幾乎都是依賴中國市場在賺大錢,他們擁有媒體的目的,或許不在於獲利,而是想藉由為中國統戰服務,受到北京當局重愛,以便經營在中國的政商關係,這一點可以從該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相關新聞,尤其是關鍵性的新聞,看出端倪。



圖說:「你好大,我好怕!」反旺中媒體怪獸,是由各地學生透 過網路自行串聯,而非特定組識發動的群眾運動,但卻有驚人的動員 力。圖為2012年9月1日大遊行的畫面。(邱萬興攝)

中國市場的引誘及廣告客戶的操弄,已經使得許多台灣媒體進行「自我審查」,凡是涉中新聞及反中運動,都會扭曲報導或自動消音。三一八學運,青年反對兩岸經貿黑箱協議,旺旺中時集團所屬媒體,報導避重就輕,極力醜化學生,扭曲真相,不免讓人懷疑它想藉由打擊社運向中國激功。

台灣現在媒體的自我審查,跟戒嚴時代沒啥差別。原本民主自由 的台灣社會,卻多了個「中國警總」。此一專司精神壓迫的中國警 總,更成為台商和媒體商人頭上的七尺神明,所以無不小心翼翼,擔 心一言一行要是被記錄在它的生死簿上,日後恐將難以超生。中國毋 需疾言厲色,財團媒體就會自動自發地自我審查,台灣言論自由因而 明顯倒退,且持續惡化,實在讓人擔憂!

再者,兩岸交流密切,身負任務的「特殊身分者」,也化身各種名義進入台灣,接觸並影響官員、政黨、商人、農民、學生。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就發現,連解放軍都已穿起西裝來台「執行任務」。近年來,退役將領和國安人員出賣情報給中國的事件頻傳,其中有些人不曾到過中國,他們是怎麼接頭的?這也難怪台灣人民對國安局和國防部信心漸失。讓中國解放軍和情報人員進出自如,開門揖盜,敵暗我明,如何能確保國家安全?

中國接收台灣其實已是現在進行式,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北京當局正逐漸掌握對台政治、經濟、媒體的控制,在中國看來,台灣已經是一隻甕中之鱉。三一八學運後,中國驚覺台灣新世代的台獨思想比民進黨更難搞定,對台統戰策略因此做了不小的修正。台灣正面臨新一波的統戰攻勢,無煙的戰火繼續在台灣竄燒。

不民主的統一就是併吞

根據一九八四年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英雙方共同承諾,香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歸還中國。香港主權移交,未經香港人民自決,就連《香港基本法》也未經港人複決,港人的命運是由兩大政治集團私相授受決定的。

而依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最終目標應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達成自治。二〇〇七年,北京承諾將在二〇一七年實現香港行政長官普選,並於二〇二〇年通過立法會委員直接選舉。結果中國政府企圖食言,一再採取拖延戰術,學者戴耀廷等人因而發起「占領中環,要求真普選」抗爭,引起熱烈響應,也凝聚了港人爭取民主的意志。

而中國則以《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回應,明示中央擁有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制權及監督權,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 會議一致通過,拍板定案。北京當局持續掌控特首提名權,不給港人 真普選,還列出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條件,不允許選出不滿 中央政府的特首。顯然,中國擔心香港若真普選,國內各大城市恐怕 會要求比照辦理,如此一來,將危及其專制統治。

中國在中共獨裁統治下,沒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無在野黨監督,自稱為「中國式協商民主」,領導人由頂層的小圈圈協商產生,剝奪人民選舉權。鎮壓、任意逮捕民運人士。為了防止民眾反抗,編制了三十多萬網路警察,嚴格管控思想與言論,維穩經費甚至超過國防預算。將這樣的統治方式複製到香港和台灣,實非港台人民所能接受的。

武力鎮壓是必然的

軍事占領是侵略者無法貫徹其統治意志、無法有效控制時才會採 取的手段。解放軍之所以駐紮香港,並非擔心香港遭他國武力侵犯, 而在於就近武嚇、鎮壓香港人。港人爭取真普選,發動「雨傘革 命」,以非暴力抗爭占領街道,癱瘓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等 地,眼見特區政府無力驅離多達二十萬的抗爭民眾,不少人擔心解放 軍將動用武力鎮壓民眾,重演六四天安門事件。

台灣歷經民主運動淬鍊的社會文化,不同於香港,對非經人民合法選出的統治代表,比方由中國單方面決定的特首或傀儡政權,是絕對不會予以承認的,中國在台的專制統治勢必遭受激烈反抗。一旦抗爭升高,造成其統治危機時,動用解放軍是中國必然採取的手段,台灣終將面對中國直接的武力迫害,這會是捍衛民主生活的決戰。因此,我們應做好心理準備,不能一味認為中國不會對台灣動武。

正向思考

非暴力公民防衛已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成功實踐,它並非理想主義者憑空想像的學說。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傑克·杜瓦(Jack Duvall)合著的《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A Forse More Powerful: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記錄了各國許多成功的案例。

但有些知識分子常提出質疑,認為這種虛幻的主張,只有在道德水準很高且普及的理想社會條件下才行得通。他們舉盧安達、薩爾瓦多、波士尼亞內戰的屠殺事件,甚至是駭人的納粹大屠殺為例,認為對沒道德的暴君採取非暴力抗爭,只會讓屠殺更方便,叫人民白白送死而已。不過,這種說法卻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這些殘暴的統治者是否因此成功?更別說他們悲慘的下場。

非暴力公民防衛並不是要人民當殉道者。事實上,迴避、逃離危 險是必要的保護策略,而且必須經過訓練及有計畫地行動,非暴力公 民防衛才能發揮制敵的效果。它和採取暴力抵抗一樣,都會面臨危險,也同樣可能失敗。但不同的是,暴力抗爭者是以弱小的武裝力量,來對抗侵略者強大的軍力,因此只能採取刺殺、恐怖攻擊的方式,以暴易暴;只會造成對方前線官員和軍人死傷,卻無法擊敗其背後的統治者,反而會激怒統治者及其軍警,抗爭會因為遭到更為殘暴的屠殺而瓦解。

當侵略者面對非暴力抗爭者,其軍警會面臨很大的道德壓力,因 而降低仇恨、報復的情緒,侵略者也會擔心遭到國際譴責及外交杯 葛,施暴時會比較心虛,造成的傷亡也會較少。非暴力抗爭靠的是團 結意志,並不需要武器,所以不易被削弱或瓦解,隨時都可以再次發 動抗爭,直到侵略者敗退為止。

非暴力公民防衛者了解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以「不合作」取回 其權力根源,就能打敗當權者,務實而不虛幻。非暴力公民防衛的實 踐並不需要理想的社會條件。非暴力公民防衛的真正力量,可稱為 「民主權力」。我們應正面看待社運團體的非暴力抗爭,將活潑有創 意的人民視為民主的基石,也是抵抗侵略的主力;強大的公民社會才 是國家安全最大的保障。

然而,任何和平主義團體及激進政治組織,都不宜當非暴力公民 防衛的主導者,也不適合擔任籌備成員,以免保守派、國防部或不同 立場的獨立社團加以排拒,而落入社運規模,以致於削弱了民力。

其最大的阻力常來自堅持武力傳統思維的國防部,不但理念難以 接受,而且基於捍衛員額和預算的利益考量,也會採取抗拒的態度。 即使在先進國家,要將非武裝防衛納入國防體系,都會遭到國防單位 的抵制。因此在舉辦政策推動的座談會或公聽會時,有必要邀請國防 部決策單位出席,傾聽他們的意見,釋疑並耐心地說服,不應採對立 施壓的方式來迫使對方屈服,以免傷害合作與信任的關係。

此外,非暴力公民防衛者的軍事知識不如軍事專家,需要他們的協助,才能了解侵略者在入侵時會採取何種戰略、戰術或行動,進而擬定有效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和行動計畫,減少無調的損傷。國防部若將非武裝防衛體系納入防務,成立「非武裝防衛中心」,將更能發揮無間的合作效果,加速使侵略者敗退,減少人員及資源損耗。

台灣新一代的國防菁英具有良好的學術基礎,吸收新觀念的能力強,有助於理性溝通,建立信任。推動非武裝國防,不是要削弱軍權,而是讓國防部引進及培養非武裝防衛專家,強化國家防務。正向思考就能化阻力為助力,加速我國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的建構。

公務員有「不合作」的義務

策略上,一方面建立新型態的防衛體系,一方面則應在立法院訂定《非武裝國防法》,除作為法源,也載明國民依法須擔負起團結抵抗侵略的義務。政黨、公務員、軍警有義務拒絕承認侵略者政權或傀儡政府,不執行其命令,或以消極執行方式抵制其命令;協助、掩護我方反抗者;傳遞內部信息給非暴力防衛決策中心;伺機公開對抗侵略者或偽政府。包括非政府部門的媒體、企業、金融機構、工會、協會、專業技術團體、學校、社團、宗教團體等各種民間組織,都應善盡「保護憲政、反抗非法政府」的國民義務與責任。透過媒體宣傳和公共教育,讓每個人都知道也願意負起這種道德和法律上的義務,拒絕支持且不服從違憲或不民主的新統治者。

社會大眾也必須明確認知,並決心反抗侵略者,表明對其不合作 的態度。有效對抗不民主的併吞,必須靠國民的集體行動。對抗大國 侵略,小國最強的資源就是它的人民。

當然,溝通和教育比立法更重要,因為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必須 基於理解與合作。要先讓各界了解及認同,才能得到他們真誠熱情的 貢獻。運用他們的經驗及專業領域,並將他們的意見納入計畫,例如 運輸工人最了解如何癱瘓運輸系統、工會最清楚團結罷工的技巧、企 業老闆知道如何杯葛市場及罷稅的要領、社運幹部有領導群眾非暴力 抗爭的經驗……都是非暴力公民防衛寶貴的資源。

統治需要合法性,必須取得道德上的正當、政治學者及國際領導人的支持;被統治國家公務員、官僚、記者、軍人和警察的服從;政治、經濟和社會機構的合作。當台灣通過《非武裝國防法》,並積極宣傳訓練,就是在向中共宣告,中國只能以符合民主的方式「統一」,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態進行併吞。



圖說:1987年12月25日「行憲四十週年紀念日」, 甫創黨一年多的民進黨發起主張「國會全面改選」的大規模抗爭,將中山堂四周團團圍住。由於人太多(兩萬餘),「外溢」到尚未地下化的西門町平交道上,也意外成就了台灣第一次癱瘓鐵道運輸的抗爭事件。(黃子明提供)

理念是力量的泉源

在國防部尚未將非武裝防衛納入國防體系之前,民間可以先成立「非武裝防衛籌備中心」,進行研究及教育,透過演講、座談會、公聽會、網路平台及媒體投書宣揚理念,而主要目標是遊說立法院制定《非武裝國防法》,推動國防部成立「非武裝防衛中心」,達到武裝與非武裝雙軌布建的國家防務。

籌備中心另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培訓,目標以加強理念為主,因為思想是行動的引擎,也是防衛力量的泉源。釋疑是課程的開始,最好採取「參與、體驗式螺旋前進的教學方法」,少講「大道理」,以免學員覺得無趣。

如果講師的功力不夠,那麼,至少整理出三到五題民眾對非暴力公民防衛的疑點或誤解,交由學員分組討論,再回來分享各組討論的結果。這是從學員的經驗出發,而不是講師帶著標準答案來灌輸,才能了解學員真正的問題以及他們的潛能。講師接著再根據各組報告提出補充,或提示可以繼續思考的問題。講師可從中釐清疑點和誤解,藉由學員參與、表達看法,一起腦力激盪,這麼一來,學員也會比較願意動腦筋思考講師的講解。

另外,也可以讓學員激辯非暴力公民防衛的可行性,例如是否能贏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持?真的能降低損傷嗎?施暴命令真的會引起對方部隊的不滿和反叛?進而吸引非暴力抗爭者積極參與,擴大力量?或者爭取到國內外廣泛的支持?其實學員有能力自己找到解答,講師毋需大費脣舌推銷單調無趣的標準答案。

了解非暴力理論才能堅定思想,但一般民眾不會喜歡無趣的理論,講師可以運用視覺工具,提高學習興趣,例如播放非暴力抗爭的紀錄片或劇情片,在映後討論時,順著學員討論內容或爭議點,再將理論帶入,學員會很自然地吸收理論,來印證他們的觀點,印象就會較為深刻。

訓練課程應包括:公民意識教育、民主與國家認同;了解中共對台謀略、國際局勢;議題分析、策略模型、行動計畫;開放空間技

巧、建立共識要領;非暴力抗爭理論與實踐、金·夏普的《一九八種 非暴力抗爭方法》;各國非暴力抗爭案例紀錄片討論。

同時採取非正式訓練方式,做多元的理念推廣,例如製作小冊子,出版書籍、光碟,架設網路平台,提供個人或團體自我學習的資料;並建立個人專長合作關係,例如學術研究者、教師、演說家、作者等具有專長的人士,對社會教育宣傳都能發揮專業協助的效果。

在國防部設立「非武裝防衛中心」後,初期的工作在於執行研究 和訓練任務。針對公務員、軍警、政黨、工會、社會團體、民眾及學 生,採行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或情境模擬演習等訓練,對民眾及其 組織進行有計畫的訓練。同時,將非暴力公民防衛融入公民教育課綱 中,廣泛運用於相關科目,傳授知識,激發學生思考與創新。

技巧演練

我曾數次受邀到香港非暴力研習營擔任講師,為學運、社運團體 及政黨幹部進行每梯兩天一夜的非暴力訓練,學員不想聽冗長的理論 講解,都要求教授實戰技巧。我加進了許多團體動力遊戲,這是一種 從遊戲中體會出賣、背叛、信任、偏見、溝通的體驗式教學,技巧地 將理念融入實戰教學,讓學員了解統治者分化、壓迫的伎倆。

我常使用到的遊戲,包括以下幾種:

一、贏你所能贏的:這是參考「囚犯困境理論」設計出來的團體動力遊戲。將學員分成四組,規則是「自私」比「合作」可得到較多的分數,每組為了贏得最高分,勾心鬥角,無所不用其極。即使談判

達成合作協議,仍然經常遭到背叛、詐騙。透過破壞信任,體驗統治者分而治之,造成合作的困難,也反思非暴力公民防衛的團體和個人,應如何看清並超越這種操弄,學習如何分享、合作、「共同得分」。

二、權力之星:透過籌碼交易遊戲,贏到最多籌碼的人成為「權力之星」,掌握修改遊戲規則的特權。他會訂出何種剝削、土匪式的新規則?其他人要怎樣改變這種不公平?暴力或非暴力抗爭?學員可藉此體會統治的權力根源,以及改變的可能。三、信任之旅:可體驗帶隊者的責任和辛苦。帶著盲目的隊員一路冒險,如何才能把他們平安地帶回來?隊員為什麼不信任帶隊者?要如何建立信任?讓學員體驗領導人的辛苦、責任和容忍。

四、牛馬橋的愛情故事:這款遊戲是我設計的,已經實驗了近百次,修正到很完善的水準,玩過的學員都說衝擊很大一對於人性、觀念差異、偏見固執所造成的溝通困難,讓人灰心。達成共識,為何有人容易,有人不容易?挫折的心情,體會到和你很熟的人,其實你很不了解他。當我們這群人要組成一個組織,那會是什樣的團體?又應該如何調適?畢竟是來自各方不認識的人,必須學會如何達成共識、信任,才能發揮集體抗爭的能量。

五、都市叢林:這是我從事工運時設計的一款團體動力遊戲,目 的是要讓勞工體驗政商關係,圈地、變更地目、炒房,看似公平、合 法的規則,其實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騙術,以此來考驗無殼蝸牛改 變命運的能耐。後來我把遊戲修改成統治者如何運作、圖利其「權力 來源的特權小圈」,來模擬侵略者如何分配占領所得的利益。學員很 容易就了解土地對生存的意義、法律的虛偽,及守法的反思。在台灣和中國都發生許多迫害弱勢者的「徵地」事件,誰是受益者?我們可以用這款遊戲,以體驗的方式,從中學到議題分析、團結和策略。

六、演講比賽:「我最討厭的人」:這個遊戲對個人的挑戰很強烈,如果沒有功力夠強的講師來當催化員,遊戲容易失敗,反而會讓學員感到挫折。不過,如果能成功帶引,就可以讓學員體驗到「愛你的敵人」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學員若能領會其中真意,做到愛自己的敵人,將阻力化為助力,日後將受益無窮。

七、建造報紙塔比賽:經由團結合作完成建塔的過程,來發掘誰 是意見領袖,了解如何形成共識,以及為什麼有人不講話?誰沒有參 與感和成就感?以此來體驗團隊問題,並從中學到領導的要領。

八、角色扮演:實際議題的模擬演練。了解各個角色在議題中所 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及其策略,分析如何因應,及如何修正我方的策 略。這種團體動力遊戲也可以用於尋找問題根源,或同理心的學習。

九、溝通真困難:每個學員從議題的三十個問題中,選出他認為 最重要的三個,並依重要性來排列,結果會發現每人選列的差異頗 大。接著進行配對溝通,達成選項及排序的共識,來感受要達成全體 認同的共識,為什麼那麼困難?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有效地達成共識? 這時候,你會發覺透過學員腦力激盪真有用!

十、KJ法和名目團體法:目的在於解決會議時發言不平等的老問題,讓學員都有公平表達意見的機會,學習問題歸納,並一起找出根源,然後再進行議題分析、策略訂定及行動方案的擬定。

至於其他團體動力遊戲,像是「標籤遊戲」、「積木仿做」、「說畫圖形」、「一筆畫」、「會議觀察」、「沙漠求生」、「司馬光打破水缸」、「情境測驗」、「家人過河」、「鱷魚河的事件」、「買賣遊戲」、「公共自來水」、「獨占市場」、「市場競爭高手」等等,都是很好的參與式體驗教學遊戲。

團體動力遊戲後的分享討論非常重要,可以藉此了解學員體會和 學到的成果。我會在討論或講評時,技巧地把非暴力理念融入其中。 每梯次營隊檢討心得時,團體動力遊戲可說是學員們最喜歡的課程之 一。

另外,狀況模擬的實戰演練也是學員學習情緒最高昂的課程—鎮壓、煽動起鬨、暴力突襲、謠言散布、逮捕驅離、指揮者陣亡、內部分裂、化學武器……並加入在香港可能發生的情況當作演練課題,學員的學習熱情常會使得課程超過預定時間,欲罷不能,心得討論及狀況處理的創意不斷湧現,值得「非武裝防衛籌備中心」參考引用。(香港非暴力研習營課程規劃詳見本書附錄二)

講師培訓

講師培訓以讀書會或專家演講的方式來進行,除了傳授教學技巧 及培養課程規劃能力之外,更應著重對非暴力理念的研修,將非暴力 當成講師人格養成的核心。比起教學技能的培訓,這部分是最困難 的,必須從長期研習與實踐中才能領悟養成。

講師培訓內容也包括研修甘地思想理念的演進過程,閱讀甘地的著作,探討影響甘地非暴力抗爭的哲學理論。還有亨利·梭羅的「公

民不服從論」,以及金·夏普關於非暴力抗爭與非暴力公民防衛的著作,都是講師培訓的重要素材。

甘地以「真理」作為非暴力的核心價值,並將它當作信仰,窮其一生追求與實踐。若講師對非暴力半信半疑,將其視為策略之一,或目的只在於「欺敵」,或者認為可以和暴力交叉運用,這種講師即使口才再好,也不能重用,以免他誤導學員而危及非暴力公民防衛。「愛你的敵人」,這是甘地非暴力抗爭的哲理,對敵人只有愛,而不存絲毫仇恨,這對一般人而言何其困難!而甘地就是這樣實現了非暴力的真理,成就了非暴力的深遠影響。但其實,甘地也是個凡人,他曾把自己所犯過的錯誤和懺悔,及他追求真理的修練心得都寫在自傳裡。

甘地在自傳中寫道,其家族屬於種姓制度的第三等階級一吠舍(僅次於婆羅門和剎帝利),他生在一個信奉毗濕奴教的家庭,年輕時曾背叛他所屬的宗教,偷吃肉,偷抽香菸,結婚後受朋友慫恿上過妓院,也偷過銅板和服飾上的金子。他很後悔,決定寫悔過書給父親,請求原諒,那時他的父親已臥病在床。在看過兒子的悔過書後,甘地的父親淚流滿面,閉上眼睛把紙條撕碎。父親流下的淚水代表他對甘地的愛,洗滌了甘地的心靈,也洗淨了他的罪,甘地由此深深感受到了愛能感召有罪者的神奇力量。

甘地年輕時脾氣相當暴躁,太太卡絲德貝不願幫甘地的一位「賤 民」階級雇員倒便壺,甘地一再強迫她,因而爭執不斷。有一次,卡 絲德貝對著甘地大吼:「房子留給你,我走!」甘地竟一把抓住她的 手,死命地把她拖到門口,作勢要將她推出家門外,她當場淚如雨 下,哭道:「你真不要臉!我能去哪?我在南非沒有父母,也沒有親戚!」甘地這才恢復理智,驚覺自己怎會做出這種行為。

講師培訓雖然不必像甘地清教徒式的修練,但須著重思想與理念的養成。研究甘地的哲學思想,有助於堅定信念。透過修練,讓自己言行一致。以此培養出值得信任的領導人,才能化解非暴力公民防衛可能面臨的危機,最終完成艱難的功業。

行動前應有的認知

台灣發展非武裝國防,目的在阻止中國侵略。它是一種預防性國防,而非具攻擊性的武力。降低仇恨,減少生命傷亡,也有助於日後和平的建構,及未來正常關係的開展。

已故的挪威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赫爾斯特(Johan Jorgen Holst),在其著作《新時代小國的防衛策略》(Civilian-Based Defense in a New Era: Theses on the Defense Strategy of a Small State)中寫道:「以戰爭作為國家擴張策略的效益已經消失了,占領的代價遠遠高過侵略行動的成本,龐大的潛在成本及負擔,足以對占領者發揮嚇阻作用。東歐人民革命的教訓,讓侵略者領悟到占領需付出昂貴的代價。」



圖說:「紀律」是非暴力抗爭的成功要素。圖為1991年「一〇〇 行動聯盟」發起反閱兵抗爭,於閱兵台遭憲兵以強力水柱試圖驅離的 場景。(蔡明德攝)

「決定權」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以「不合作、不服從」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打敗侵略者。它不像武裝防衛,必須仰賴年輕力壯者的戰鬥力。採取非武裝防衛,是不分男女老幼的,是一種全民都可參與的抗爭。用非暴力的手段,發起政治不服從,不守侵略者所頒布的法律和命令;經濟不合作,採取罷工、罷稅、罷市、拒買,癱瘓統治秩序,使其無法掠奪經濟利益;文化反洗腦,拒看、拒聽侵略者的出版品或文宣、不出席其會議、盡可能講母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拒絕說「普通話」。

不合作、不服從的成功要件

以下所列的幾個要件,是不合作、不服從成功必備的條件:

- 一、否定侵略者的合法性,宣告「不合作」具有正當性。
- 二、平時就應製作《非武裝國防手冊》,訓練人民如何對抗。
- 三、加強對政府單位、社運團體核心人員的培訓,增強防衛策略的擬定能力。

四、立法院訂定《非武裝國防法》,載明國民依法有團結抵抗侵略的義務。

五、在面對鎮壓或挑釁時,要有保持非暴力紀律的能力。

六、將各類抗爭行動製作成《防衛指南》,做詳細的規定,統籌戰力。並透過教育機構和媒體,納入公民教育的課程。持續研究 創新,修正、增強《防衛指南》的內容。

訓練軍隊、民眾及社團,了解非武裝國防如何瓦解侵略者所制定的秩序與機關、如何進行地下廣播或印刷、如何罷工與杯葛、如何維持原有生活秩序;以政府財政,落實對公務員、警察、軍人、教育人員、工會成員、志工團體、社會組織等,進行非暴力公民防衛的教育訓練(尤其應把維護集體安全及危機發生時的因應計畫作為訓練要項)。若準備不周、條件不夠,或缺乏戰鬥力,將使整個防衛喪失功效。訓練與準備是成功的要素。

若無戰略規劃,就是有勇無謀的盲動,常會導致失敗或帶來災難,造成民心士氣崩潰。發起罷工、聯合抵制、政治抗命、策劃士兵倒戈,都不應隨性為之,必須評估情勢,加上嚴謹的戰略計畫,才能成功。

執行要領

指導民眾採取一致的態度與行動,進行干擾、抵制、拒絕,使得 侵略者的控制失靈。執行時可參考以下摘列的要領:

- 一、公開譴責其非法性。
- 二、否定其所聲稱的合法性,拒絕不對等的談判。
- 三、認定其命令均為非法,不予服從。
- 四、否定其所控制的政府機關、社會機構,並以不合作方式抵制。
- 五、否定其制定的《基本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權威 性。
- 六、保存原中華民國合法組織,並做好遭迫害時的第二線接棒安排。 排。
- 七、拒絕給予侵略者資訊和資源。
- 八、破壞侵略者的軍人效忠意志。
- 九、媒體拒絕為其宣傳。
- 十、記錄其不當、非人道的行為,以文字和影像留存。利用 Youtube、Facebook等,傳播至全球,及蒐集可用的統計資料。
- 十一、將地下電台、印刷機及電郵、簡訊群組名單加以隱藏。

公開演習

事先的訓練和演習是非常必要的,尤其經過大規模演習,大眾才懂得如何操作。不必擔心敵人情蒐,了解我們的抗爭計畫。也不必擔心曝光,非暴力抗爭的原則就是透明,沒有祕密。公開演習不僅可以嚇阻入侵,同時也是為了提升人民的抵抗意志和信心。雖然這會造成與中國的關係變得緊張,卻能使中國不敢輕易動武。

相反的,「保密」反而會吸引敵方間諜前來進行刺探或滲透活動,也無法建立與敵方的信任。甘地認為,不必要有地下組織。藉由訓練與實作,發展出許多可行方式和道德的建立,就不需要祕密組織。

只有在被占領後,遭到嚴密監控,為了抗爭準備與訊息暢通,對 組織內資訊傳遞、動員系統、電信傳輸站、印刷廠設備及傳單、報紙 的散發管道等項目,才有保密的必要。

第六章 面對侵略者與通敵者

與武裝防衛併行

受到甘地非暴力抗爭的感召,我和學界朋友成立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倡議和平,認為公義的實現及非武裝的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我也認同日本和平主義者永井隆的主張一「和平主義者連藏一根針都不應該」,主張完全放棄軍備,是人類走向和平的康莊大道。我還多次寫文章推崇日本和平憲法是全世界最進步的憲法一為了保障人類的和平生存權,日本立憲放棄國家交戰權,不再擁有陸、海、空軍;同時譴責日本政府擴大自衛隊,雖然聲稱不主動攻擊,卻已違背和平憲法的精神,最近甚至解禁「集體自衛權」,賦予自衛隊預防性攻擊任務,完全破壞和平憲法,深感遺憾。

在文章中,我主張台灣應制定和平憲法,解除所有軍備,才能展現非武裝防衛的純度,就像甘地領導印度和平獨立一樣。後來,金‧夏普教授指正了我這觀念,他認為非暴力公民防衛不應落入理想主義的天真想法;理想主義者的「非武裝」,容易讓人質疑為「放棄抵抗」,很難說服民眾,應該讓民眾了解「我們要強化的武裝不是軍事,而是心理、政經社會的武裝」;一開始採混合式的國防,軍事和非軍事兼備,等人民對非武裝防衛有信心,漸予肯定後,才可逐漸減少武裝軍備。

事實上,軍事抵抗代表國家的尊嚴與驕傲,可引起國際社會關注、鼓舞民心士氣,並爭取時間來部署全面性的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立陶宛在蘇聯入侵初期也採取了適度的軍事行動,用以顯示「戰

爭爆發了」,蘇聯的侵略行為因而受到廣泛的譴責和關注。立陶宛的 例子說明了維持武裝的必要,尤其在平時防禦時,需依賴有紀律且高 素質的軍力。

具體來說,就是軍事用於防衛台海,一旦敵軍登陸,就轉換成非暴力公民防衛,絕不能就此停止抵抗。由軍事對抗轉換為非公民防衛必須無縫接軌,同時立即向國際及國內發布轉換抵抗方式的信息,削弱其武力侵犯的正當性,同時召喚人民接替抵抗任務。侵略者面對不習慣的作戰對象及道德壓力,武力施展將會受阻。

萬一出現暴力組織採取游擊戰對抗,應嚴格與其區隔,絕不能暗地裡合作。對付游擊隊,侵略者具有以暴制暴的正當性,尤其在侵略者的軍官遭到殺害時,侵略者會採行極端懲罰和壓迫手段來報復,甚至牽連殺害非暴力抗爭者,導致人民產生恐懼而退出防衛。這也是非暴力公民防衛需加強訓練、宣傳,極力防止暴力者破壞的原因。訓練的目的是為了讓群眾相信,非暴力公民防衛的效果超越軍事武裝,足以威懾敵人及增強國家防衛能力,但必須防範暴力者的破壞,民眾有了此一信念,才能以群體力量防止暴力者的煽動和破壞。

轉換為非暴力抵抗後,軍人的職責也應跟著轉換。就像平時擔負起救援天災人禍的任務,當敵人入侵時,社會也會較為混亂不安,軍人此時的主要任務是維持公共秩序、防止歹徒趁機作亂、竊盜劫取財物,保護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不應與敵人周旋,或成為游擊戰士或恐怖分子。

入侵初期的防衛

侵略者在入侵初期,通常挾其強大的軍力迅速占領,並宣布戒嚴,以嚴密控制。非暴力公民防衛行動可以參考立陶宛的抗爭方式:

為了阻止侵略者前進,發動民眾分區堆積障礙物,例如石塊、廢家具、廢棄車輛、混凝土塊、大型卡車、推土機等,再以鐵絲、鋼釘、沙袋等加以鞏固結構,讓敵人不易破壞清除。每區都有一負責人負責指揮,部分障礙物用可燃物構築,在遭受攻擊時,點火形成火牆,可以有效阻礙、拖延敵人深入占領。

拆下城市、鄉村的街道名牌、建築物號碼、路標、有地名的匾額 及標誌。雖然現代科技已經可以用GPS導航,但如果失去對照標的, 還是會迷路。或者,可以研發干擾、變造GPS導航的程式,藉以阻擾 其兵力調動、占領速度及效果。

另外,應將有關組織與個人的資料及文件藏匿起來,要是不幸被捕,也別提供任何真實資訊。廣播和電視台遭占領時,可用手提式移動發射台進行廣播,或運用Youtube、google、臉書、推特或其他連結平台散播及接收訊息。

初期,應該避免因挑釁升高而導致非計畫的公開衝突,以免情況 失控。敵人實施高壓統治時,可以採取「踩紅線」的方式抵抗,例如 發動溫和的遊行、張貼標語、「象徵性」的群眾活動(以哀悼會、婚 禮、社區聯誼活動作為聚會藉口);進行社會抵制,不參加社會事務 (例如師生以請假方式進行柔性罷課、集體閉門不出、故意表現冷漠 等);藉故拒買拒賣、怠工、休市、提清存款;進行「政治拒絕」的 抗爭,例如鄙視其所聲稱的合法性和權威、故意公開違法、抵制其新 制度等等。然後視侵略者控制的鬆動程度來升高抵抗,也可以採取積 極的非暴力干涉,像是阻擾行政、另建機構體系或平行政府、占領癱 瘓交通或特殊場所。並切記所有的抗爭行動及遭迫害過程,都應製作 成影像或文字記錄,向國際發出控訴。

以下幾個有趣的例子可供參考:

波羅的海非暴力獨立成功之道(The Baltic Way)包括:初期抵抗 採行地下抗議活動、討論會、文化活動;印發傳單刊物;展示國旗; 撕下侵略者的國旗;在牆上畫上象徵圖案或標語口號;高唱民族歌曲 或禁歌;kuso、抵制敵人強制性的社會或政治活動;講母語,讓統治 者聽不懂;向受難者獻花或辦紀念活動;以禱告及講道方式宣揚抗爭 理念;利用環保、教育、宗教、文化活動包裝反抗行動;用人牆保衛 重要政府機關及公共建築物。

拉脫維亞的「赫爾辛基一八六小組」則藉由人權訴求舉辦各種活動,讓人民逐漸卸除恐懼感。他們利用活動和演講,批判侵略者對經濟及社會的剝削、歧視、扭曲歷史、造成生活困境,號召人民行動,引起政治大震盪。當時,知識分子扮演鼓舞民眾的重要角色,由數十位教授、作家及記者率先突破禁忌,組成「人民陣線」,時常以激進的言論、行動挑戰當權者的禁令,承擔對抗的主謀角色,減輕人民參與活動的責任,以免其遭受迫害,而敢站出來團結抵抗。



圖說: 癱瘓火車站是強度很高的非暴力抗爭。圖為1991年5月15日, 為聲援「獨台會案」, 來自全台約千名大學生突然進占台北火車站, 直到5月20日才撤離, 最後贏得多項的勝利。(邱萬興攝)

二次大戰時,丹麥國王克里斯汀在德軍占領期間,每天騎馬穿越 哥本哈根的街頭巷尾,向民眾打招呼,凝聚人民信心。當德國要求每 一個猶太人都要佩戴黃色大衛星(猶太文化的象徵,用以標示出猶太 人)時,國王宣布:「如果將大衛星引進丹麥,我和家人都將佩戴 它,當作榮耀的象徵。」為民表率,展現出抗德的勇氣,大大地鼓舞 了民眾。

另外,在二戰期間,德國占領法國時,法國人民在特定的日子裡 戴黑色領帶,以汽車長短喇叭聲,鳴放摩斯密碼「V」的信號,或在 牆上、布告欄上畫下象徵勝利的「V」標誌,以此向德國軍人示威, 代表盟軍終將勝利,以及法國人團結抗爭到底的決心。

我們同樣可仿效這些做法來對抗中國的入侵,例如以國旗或青天白日滿地紅三顏色作為標示,到處塗鴉,或者當作裝飾品佩戴在身上;隨時隨地發起齊唱國歌或台灣民謠;倒掛或焚燒五星旗;選定特定的日子,像是中國侵台日、屠殺日、台灣領導人被捕或遭殺害的日子,以及六四、二二八、雙十節、十一中國國慶等紀念日,穿上黑色的衣服以示哀悼,來象徵性地抵抗,作為全面抵抗前的暖身。

十字架小山丘是立陶宛對抗蘇聯宗教壓迫的抗爭象徵,雖然蘇聯當局一再取締禁止,但數以千、萬計的十字架被拆後,立刻又被重新豎立了起來,直到蘇聯當局煩不勝煩而作罷,因而成為立陶宛反宗教壓迫成功的例子。

立陶宛電視台也好幾次播放甘地非暴力抗爭的影片,來鼓舞民眾,進而引起民眾討論,升高抗爭意識,蘇聯卻無法取締,帶給占領官員莫大的心理壓力。

罷工有時候並不容易發動,不妨採取「上班而不合作」的方式來加以抵制,比如怠工、降低效率、占據工作檯等著下班、降低產品質量、故意出錯、拒絕任務、直接抗命等等。立陶宛人民團結反對軍事占領,反對蘇聯徵兵,民眾聯手幫助逃兵,並組織「母親反戰團體」。母親的特殊身分是侵略者最無力攻擊的對象,尤其受到殺害或失蹤青年的母親對統治者的血淚控訴:要求平反,還給公道;反對暴力統治;呼籲和平人道……給統治者帶來難以承受的道德壓力。

還有,非暴力公民防衛指揮中心應保持策略彈性,隨時發布防衛 命令;並預先擬訂對抗心戰或攻擊的應對策略,指示人民如何保護自 身安全,採行適當的不合作抵抗行動。公務員和警察的「不合作」, 會對統治者造成莫大的干擾,但也容易遭到懲罰,所以得「適當地」 不合作,採取有創意而讓統治者難以重懲的「失誤理由」,像是假裝 忙碌而忘記處理某限時文件;把要送到台南的公文錯送到官蘭;假裝 突然生病,來不及交辦職務代理事項,延誤重要行政事務;遺失鑰 匙;公文信封袋裝錯公文;假裝聽錯上級命令內容;故意將聯絡事項 講得很複雜,或者遺漏部分重點,使對方無法完全了解,因而出錯, 降低效率;假裝配合工作,但偽裝健忘、愚笨、緊張出錯,而扭曲、 妨礙、阻擋敵人命令。這些都應事先在非暴力《防衛指南》中提示, 平時就激請公務員、警察專案討論,想出許多具創意的抗爭方法,作 為訓練教材。各行各業都有其專業領域,也可發想出對抗侵略者的獨 特方法,將它們納入各領域的《防衛指南》。因為侵略者在面對全民 大規模「不合作」時,受限於地緣、人際、制度等等因素,不可能從 中國調派所有專業人員來替代。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的 火車技工發起抵制,不讓法國強行運走煤炭,他們採取怠工和罷工方 式,重挫法國的掠奪計畫,法國技工被派來接替,結果事故連連,無 功而返。

非暴力抗爭有無窮的創意可能,立基於愛和意志力,加上用智慧 發想出具創意的不合作戰略及戰術,相較於武力行使,強調仇恨暴力,戰略和戰術的單調,高下立見。

受金錢或特權收買的背叛者

侵略者在入侵時往往必須借助背叛者的協助,用錢收買可能為侵略者工作的對象,從事內部的策反工作,或是提供防衛指揮者及各地領導人名單。中共已經在台灣布建日益綿密的統戰網絡,利用像是高價收購生產過剩的農產品,來「照顧」台灣農民;下巨額的訂單契作漁業養殖,利誘漁民,並且將「功勞」歸給地方民代和首長,收編地方政治勢力。

這些都是中國對台研究機構所提出的統戰策略,認為台灣南部是 民進黨的票倉,要瓦解台獨勢力,就得在南台灣撒錢收買人心,淡化 民眾反中情緒,甚至進而轉化為中國對台工作的助力。在北京當局看 來,南台灣的地方民代多半利益取向,習慣以關說服務、包工程來經 營政治地盤,台獨意識薄弱,用錢就可以擺平他們,統戰效果最為可 期。

而且南台灣以農業及中小企業為主,賦予地方政客中介中國市場利益的特權,替他做政績,穩固其地方政治實力,即可藉由「利益鏈」收編農、漁、工商業成為樁腳。地方政客深知箇中奧祕,連民進黨的地方政治人物也難以抗拒,因此中國不只對台灣的中央選舉具有影響力,就連縣市鄉鎮也已經受到它的操控。假以時日,中國就不怕民進黨搞公投了。由於大企業、中小企業和農漁業關係到民眾就業的實際生活依靠,只要「利益鏈」串聯得夠廣闊,「統一公投」必然會過關,這麼一來,中國就能順利取得對台統治的正當性,這是北京當局打出的上上之策。

一旦中國併吞台灣,通常需要政治領袖、學者和社會賢達支持其 政權,並且需要台灣的基層公務員、各級官員、軍人和警察的服從, 也要得到各個政治、經濟及社會機構的合作,才能有效地統治。

如果媒體、記者和出版機構不願意配合,拒絕為它宣傳;警方和司法機關不遵循其命令逮捕、監禁、處決反抗者,侵略者就不能得逞。拒絕以任何方式給予侵略者合法地位,是非暴力公民防衛對付侵略者最有效的打擊。而且在它還沒能掌握所有資源之前,會比較容易擊潰侵略者,一旦其政權鞏固了,我們恐怕就會陷入長期且艱困的抵抗期。在中國威脅下通過的「統一公投」,只是形式,中國並無法就此合法且有效地統治台灣,非暴力公民防衛因此必須在占領初期盡早啟動,以發揮效能。

傀儡政府

「以台治台」是中國統治台灣的必要手段。由中國指定的香港特首,並非經香港全民普選產生的,不過就是個傀儡政府。在中國併吞台灣初期,同樣也會扶植傀儡政權,以軍政府或文人政府的形式以台治台。

要是台灣內部反抗聲浪高漲,中國無法順利逼迫統一,台灣內部的統獨對立也會跟著升高,甚至出現混亂現象,導致政權危機。這時,中國就有可能煽動親中將領發動政變,成立傀儡軍政府,由中國任命其為「臨時安定特首」。此一軍事集團也會宣稱它所成立的是一個過渡政府,目的是為了「平定動亂,拯救國家」,以取得合法統治權。

這種做法是有前例可循的,例如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相互傾 車,政治與社會長期動盪,影響經濟。軍人以平亂為由發動政變,反

而獲得一般民眾及商人的肯定。軍人擁有優勢武力,足以鎮壓任何政 治勢力,藉由恢復社會秩序,使得軍事政變具有正當性。為了安定, 人民不會質疑軍事統治及其危害民主體制的嚴重性。

再以克里米亞軍人投奔敵營為例。當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宣布獨立時,俄軍進駐克里米亞,烏克蘭軍隊完全沒有抵抗,大批烏克蘭軍人甚至投奔俄國,連海軍總司令比瑞索夫斯基上將都跟俄軍「投誠」。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總理阿克瑟諾夫宣稱,超過五千五百名烏克蘭士兵轉向效忠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

反觀台灣的情況,有些軍官是認同中國的,甚至還幫中國竊取台灣的情報。中國也認為,許多台灣的外省軍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些是雙重認同,就像烏克蘭的俄裔軍人。如果中國遂行併吞,台灣的處境很可能就像現在的烏克蘭。

另外,一九二〇年,德國卡普集團發動政變,打算成立威權政府,卻遭到公務員、工人發起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警察也要求卡普辭職,卡普因而被迫流亡瑞典。而一九九一年八月蘇聯政變失敗的原因,也是群眾以不合作對抗的例子。

不過,在台灣,軍事政變的成功率並不高,倒是扶植文官傀儡政府的可能性比較高。由假民主所產生的兒皇帝,民眾誤認為其統治具有正當性,反而是最難反抗的,香港特首就是個典型例子。當中國有把握以「統一公投」來併吞台灣,屆時它絕對有能力以台灣的選舉方式選出其所扶植的總統。台灣總統是最高且有實權的統治者,中國只要控制台灣總統一個人,來充當其傀儡統治者,就能貫徹其統治意志,有效併吞台灣。

傀儡政府在執政初期,必定會表現出極力捍衛台灣民主自由的樣子,並向中國爭取到較為有利的自治條件,例如跟中國套招演戲,爭取到擴大對台讓利,及維持台灣的民主體制不變,以取得民眾信任。但就跟香港的情況一樣,位居上位的「宗祖國」可發布《關於台灣白皮書》,隨時都可以縮減對台灣的民主讓利。別的不說,光是繼續操控媒體和大企業,以支持中國在台灣的任何改變,就可以讓台灣民主倒退。猶如溫水煮青蛙,讓台灣人死到臨頭都還不自知。中國最終將採行「一國一制」,將台灣「西藏化」,加緊對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控制,貫徹其專制統治,屆時港台恐將成為同命相連的「次殖民特區」。



圖說:大埔案中,抗議民眾將布條繫在總統府前的拒馬上。(邱 萬興攝)

當執政者已無自治能力,此時總統已非民主領袖,其所指派的國防部長並無實質權力反抗總統,非暴力行動中心應該轉為體制外組織,改以「非暴力公民防衛指揮中心」主導,並將鄰里、社區、學校、NGO等納入防衛組織,原已建構的公務員、軍警系統繼續整編、納入抗爭體系;宣傳則以「否定傀儡政權」為主,提供資訊與分析,讓人民洞悉中國和傀儡政府的伎倆,建立民眾反抗的信心。



圖說:1987年立法院制定國安法,再度激化了國內的統獨對立。 (邱萬興攝)

另一種情況是,民選總統站在人民立場,反抗中國併吞,成為非 暴力公民防衛領袖,就像波羅的海三國的政治領導人。此時最重要的 是,要防止合法政府被推翻;防止指揮中心、媒體及經濟樞紐遭占 領,例如保護郵政、電信、電力、水利、物資倉庫等;隱藏或燒毀重 要資訊,以免敵人取得後進行逮捕、提前破壞抗爭計畫。

延續政府的合法功能,建立自治政府的架構,保護領袖及官員。如果原政府被傀儡政府取代,應維持效忠原政府,或另立新政府以凝聚民心,負責非暴力抗爭的總策略與總指揮。這時候,非暴力公民防衛應該把重點放在保護憲政體制、社會機構和媒體,維持自治,維持資訊能有效傳遞,至於象徵性的總統府或國會等建築物則較為次要。

持續藐視、批判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權的非法性,破壞其士兵與官員的忠貞。如果發動抵抗行動,先知會侵略者的士兵,讓他們充分理解抗爭行動將採取非暴力方式,不會傷害士兵人身安全。這麼做,除了可減少其粗暴行為,甚至能取得他們的信任與同情,有時在侵略者下令殘殺民眾時,還會導致士兵倒戈抗命。別將對方的士兵當作敵人,降低仇恨,有紀律地增強非暴力抗爭的力量,暴力就會逐漸削弱。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曾取得一批解放軍文件,發現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軍隊裡沒有幾個人願意負起向平民開槍的責任。在大軍開向北京時,有些指揮官還要求保證不會命令部隊開火。軍隊將領楊白冰說:「有些同志對於阻止這場動亂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和懷疑。」當年,解放軍第三十八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就違抗中央命令,拒絕屠城。

徐勤先的抗命,讓北京當局更加擔心軍隊叛變。而徐並非軍中唯一提出質疑的人,上校王東也曾祕密發起請願,與六名高階軍官共同連署,反對戒嚴,呼籲撤軍,請願書寫道:「人民的軍隊屬於人民,不能與人民作對,更不能殺害人民。」除了徐勤先因抗命被判刑外,

還有當時北京軍區第二十八軍軍長何燕然、二十八軍政委張明春、三十九集團軍一一六師師長許峰等人,皆因不願執行武力鎮壓命令,受到降職、調職等處分。

可見向非暴力民眾開槍,對軍人所造成的精神壓力何其之大!相信解放軍在面對台灣善意和平的反抗者時,不會比面對天安門廣場上的民眾來得輕鬆。爭取解放軍的同情,對非暴力公民防衛有很大的助益。愛你的敵人,應從心中發出,而非只是策略運用而已,唯有真誠才能發揮非暴力潛在的能量,在危急的時候化解危機,帶來轉機。

或許有人會質疑,六四天安門流血鎮壓,解放軍面對的是他們自己的年輕人,而不是所謂「數典忘祖、分離中國領土」的「台獨分子」,對於鎮壓台灣民眾,他們可不會心生同情,更別說是違抗上級命令拒絕屠殺。在第三章我曾舉例前蘇聯紅軍開槍殺害立陶宛赤手空拳的民眾,造成軍人心理創傷,拒絕再度向「立陶宛獨立同路人」開槍,就是最好的說明。

遭侵略者占領的地方,應該另立社會秩序系統,由認同非暴力的 民眾來維持秩序,形成社會壓力,防止分化破壞;自組地下法庭與仲 裁組織來處理紛爭、犯罪;對強盜團體或通敵者,以同情的心態來對 待,不要全面批判、報復,鼓勵他們回頭加入防衛抗爭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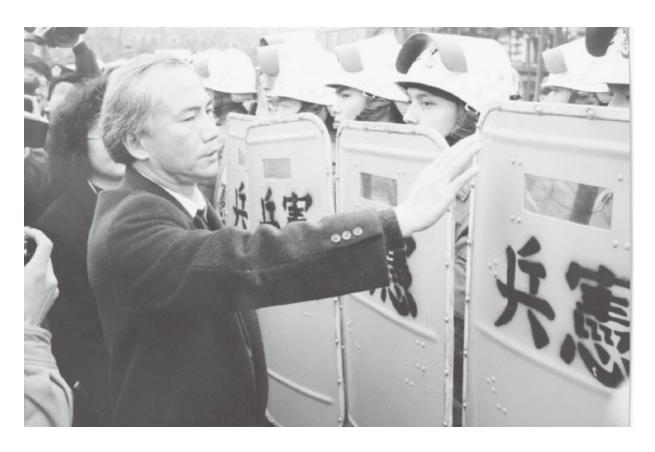
善待侵略者與通敵者

鼓勵人民檢舉背叛與通敵者,並詳細記錄事件。不應濫用「博愛」,別讓民眾陷入無是非、冷漠和絕望,才有持續抗爭、致勝的希望。

社會的民主意志是嚇阻侵略及捍衛憲政的力量,也是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成功的基石。避免以暴力對付通敵背叛者,只要採取「聯合抵制、孤立他們」即可,如果勸告召喚無效,才公布其姓名和事蹟,降低他的破壞力和影響力。

對於趁亂組織強盜集團或通敵者,憤怒地指責他們自私、不愛國,只會逼使他們報復、加劇這樣的行為。不要排擠他們,以同情心把他們納為互助對象,提供他們食物和服務,會比全面抵制、批評來得更有效,也比較可能改變他們。並鼓勵他們加入抵抗行列,讓他們知道跟民眾一起抵抗侵略者,是在社會棲身並贏回尊敬的唯一機會。

甘地也說過:社會的聯合抵制絕不能妨礙任何人對別人的幫助, 不能拒絕提供社會服務給通敵者,醫生也不能拒絕醫治通敵者,商店 對通敵者也應公平地販售商品、提供服務。不要仇視通敵者,只要讓 他感覺你並不贊成他的行為,但卻不會拒絕付出善意給他,這就是買 徹非暴力抗爭「對事不對人」的原則。



圖說:林義雄先生輕觸盾牌及警棍的神情,完全傳達了非暴力抗 爭的精神是愛而非仇恨。(邱萬興攝)

非暴力抗爭者應基於善意而非怨恨,而善意也應用在賣國者身上。一旦他真誠加入抵抗行列,他會運用敵方對他的信任,來改變鎮壓行動;或者讓敵方無法完全信賴通敵者,使敵方不知所措。甘地曾經勸告、發動印度地方官員辭去英國政府的官職,但他對不辭職者只採取「社會流放」,不接受他的宴會或婚禮邀請,也不邀請他參與民眾的宴會或慶典,目的在於使當事人清醒了解,所以不能依情緒而為之。原諒別人是一種高貴的美德,也是勝利的先決條件。

另外,對於突然介入的「和平使者」,尤其應該加倍審慎因應, 因為他們的善意往往會帶來危險。這些人可能是宗教領袖、知名大學 教授、擁有許多粉絲的影視明星或知名作家。他們或許並沒有明確的立場,對政治也顯得無知,其出自良心而毫無原則的姑息,會使得缺乏判斷力的民眾隨之起舞,而建立其發言地位及影響力。他們可能會對侵略者提出妥協、投降的建議,來締造假和平,結果帶來比通敵者更大的災禍。

至於「恐怖分子」所帶來的破壞力更是直接而且強烈,他們通常都是狂熱的愛國者,不相信非暴力抵抗能夠成功。但企圖暗殺侵略者的領導軍官或傀儡特首,不僅會破壞非暴力抗爭,降低抵抗的效果,甚至會使得非暴力抗爭者遭到報復或殺害,因為侵略者會將「恐怖分子」與「非暴力抗爭者」等同視之。暴力行為其實可視為無知的「間接通敵」,也是最具毀滅性的通敵。平時在進行非暴力公民防衛訓練時,就應不斷加強此一觀念,必須防止、拆穿英雄主義的錯誤想法。

這類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一九二三年,德國魯爾區民眾非暴力抵抗法國掠奪煤礦時,就是因為「英雄」的行為而受到嚴重危害。當時的「英雄」里歐席拉吉特崇尚暴力,用炸彈炸毀運煤火車,造成法國軍人傷亡,結果非暴力抗爭者也連帶遭到報復,其後果比所有通敵者所造成的傷害都來得巨大。

還有,在一九四五年時,挪威抗爭英雄爆破了喬士丹摩恩附近的 鐵路橋梁,當時運載德國部隊的火車正行駛其間,造成火車翻落峽 谷,一百八十多名士兵因而喪命,數百人受到重傷。結果不僅使得非 暴力抗爭功虧一簣,還遭來嚴厲的報復。

暴力的能量來自仇恨,國民政府早年為了讓軍人和國民團結殺敵,不只在軍中進行「仇匪恨匪」的教育,對一般民眾也同樣洗腦,

用「殺朱拔毛」來將敵人「非人化」,毛澤東和朱德則是代表「萬惡 共匪」的魔頭,而且是從小學就開始灌輸仇恨思想,作文、演講和壁 報比賽,一定要強調「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才能拿到高 分,這是一種奴化人民的國策,也是獨裁者藉由製造「共匪犯台」的 危機意識,來正當化其軍事統治。

讓軍人視敵為「非人」,才能激發殘暴能量,殺敵也才有正當性;如果不灌輸仇恨,暴力就難以施展了。相反的,非暴力者則是以愛和真理作為抗爭力量的來源,和暴力者剛好處於兩個極端,所以很難輕易說服主張暴力的人,只能從實踐中累積成功案例,讓主張暴力者肯定,才能逐漸改變其看法。

非暴力抗爭者並不把對手當仇人看待,而是同情他們只是邪惡體制下的囚徒,而非壞人,所以入侵者的生命也同樣需要受到保護。非暴力抵抗的方法是基於對人的愛,相信遲早會觸動每個人的道德與情感。再殘暴的侵略者也有他的家人,也有他心愛的人,而他也受過良好教育,讀過聖賢書,明白是非對錯,他只是為了權力欲望,刻意壓抑良心罷了。只有愛和寬恕的力量能召喚他的道德良知,反之,採用暴力和仇恨來制裁他,只會適得其反,加重他的仇恨,及遭來殘暴反制,反而沒有機會讓他深自反省、發覺良知。

一八九九年,在南非發生波耳人起而挑釁;一九〇六年,祖魯人造反;一九一四年,英國與德國爆發戰爭之時,甘地都曾經組織志願軍,擔任戰場救護工作。反對者認為,當主人有難時,奴隸應趁機起而爭取自由。不過,甘地並不認為印度人已淪為奴隸,而是殖民制度

所造成的錯誤,若希望英國人出手幫忙改變印度的現況,就應該用愛 來扭轉錯誤,應該在他們有難時共度患難。

甘地拜訪英國下議院,並發表演講,提出獨立的印度相較於受奴 役但卻難以控制的印度,對英國而言,哪一種印度比較好?是受奴役 但難駕馭的印度呢?還是與英國合作互敬,在英國遭遇災難時願意共 患難,並協助造福全球的印度?甘地要求英國放棄印度,但並不要求 印度捨棄英國,希望印度能在文化等方面和英國發展深厚的關係。

甘地的這番論述,並非出自政客之口的「好聽話」,或只是用來遊說英國的說詞,而是出自他由衷愛英國的心,甘地言行一致,他所說的話感動了英國的政治家,奠定了印度和平獨立的基石。

對待英國統治者,甘地以「愛」來感動他們,以愛英國的立場,來說服英國人。反觀台獨運動者常以仇恨來對抗中國,又怎能說服中國理解台獨,給予「和平獨立」的機會?非暴力公民防衛對抗的是「不民主的併吞」,是針對此一不公義的事件,而不是針對中國領導人。只針對事,而非針對人的報復,所以不存在對人仇恨的因子。雖然不公義的事是領導人所為,但應體諒其在中國領導階層的位置,而就所謂「民族大義」和「國家統一」,是任何中國領導人不得不為的使命。我們不應醜化及仇視中國領導人,固然「愛你的敵人」是何等的困難,但也唯有在真心的愛之中,才能使真理實現,讓兩岸互助互愛,相互扶持,建立永久和平且緊密的兄弟關係。

就如同甘地所說的:必須去關愛、寬恕,不要心存仇恨。比起使 用暴力,使用非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氣。愛自己的家人和同胞很容易, 但能和不同的人互愛互諒,比同類的人互愛互諒,更具美德。這就是非暴力所要修練的核心價值,也是追求真理的力量根源。

第七章 全面性徹底抵抗

面對鎮壓

非暴力公民防衛時常會遭遇三種危機—鎮壓迫害或屠殺、內部分 裂,以及不知勝利將至,承受不了挫折,因而放棄最後一里的抗爭。

鎮壓是非暴力抗爭最大的挑戰,也是經常面臨的狀況。要注意鎮壓的前兆,侵略者會先採取檢查新聞、沒收財產、限制行動、切斷通訊、干擾或封鎖網路等,接下來才是殘暴的鎮壓。抗爭者將面臨逮捕、拷打、關進集中營、流放北大荒,甚至遭到屠殺。不過,極端的鎮壓行為曝露了侵略者的殘暴,非暴力抗爭者將得到更多的國際關注、聲援,或許也能得到敵方人民的同情,增加對統治者的道德壓力,因而停止施暴。

暴力和非暴力抵抗一樣都會遭遇到鎮壓,但非暴力抗爭卻能使傷亡和破壞減到最小。面臨鎮壓時,應特別注重非暴力紀律,即使面對極端暴力鎮壓,也要堅持非暴力行為,才能減少傷亡,運用道德與毅力來擊垮對方;堅信鎮壓將反彈到侵略者自身,加速其敗亡。

當鎮壓和暴行發生時,不能停止抵抗,如果降低或停止抵抗,不但無法使暴力減少,反而會使侵略者以為反抗者已屈服,認為鎮壓有效,因而加重暴行。鎮壓的主要目的在於懲罰不服從者與抗爭領導者,及製造民眾的恐懼,以粉碎民眾的團結力量。所以應加強非暴力抵抗,讓侵略者無法達成目的,反而因此承受人道壓力,而停止鎮壓。

此外,侵略者也會企圖激怒及煽動抵抗者使用暴力,或安插挑釁者製造暴動,來破壞非暴力抗爭。這通常是證明非暴力抗爭已造成侵略者巨大困境,卻找不到動武的正當理由,所以需要將非暴力公民防衛者抹黑成暴力組織,以便遂行鎮壓。但暴力鎮壓手段越是殘酷,越會引起大批軍警質疑其必要性,統治者受到的支持將急速減弱,有時還會造成其內部出現分裂。侵略者很清楚自主獨立的公民社會是很難被鎮壓下去的。因此,在面對鎮壓時,嚴守非暴力紀律,增強抵抗,直到減少暴力,就能增加贏得勝利的機會。



圖說:1988年五二〇農民運動中,憲警殘暴地攻擊抗議學生及農民,並聲稱是農民在丟擲的蔬果中夾藏石塊;但事後則被調查團予以推翻,反指控憲警栽贓且逼供。(余岳叔攝)

爭取中國人民的同情

侵略者常採取煽動、製造被侵略國內部的動亂,來作為其動武的 理由。中國也可能以此方式動武,來「解放台灣、恢復秩序、消滅台 獨分離分子」,並以「中國內政問題」為由,阻擋國際干預,或者獲 得國際默許。因此預防之道,應掌握先機揭穿它的偽裝和操弄,使其 露出真面目,削弱其正當性。

蘇聯之所以不敢動用武力粉碎立陶宛獨立運動,原因就在於立陶 宛政府堅決一貫的態度、人民廣泛的支持、蘇聯內部的民主力量聲援 立陶宛,及世界媒體的關注,當然,非暴力的策略是最主要的因素。

立陶宛很積極爭取蘇聯人民的同情,極力加強與蘇聯NGO和利益 團體的交流。接受過立陶宛訓練的眾多專業人士遍布蘇聯各個領域, 他們對蘇聯政府的侵略行為提出質疑,掀起同情立陶宛的反對聲浪, 因而弱化了蘇聯的侵略行動。

蘇聯軍人朝保衛電視台的立陶宛民眾開火,造成重大死傷,引起 蘇聯民眾同情及譴責,加深士兵的罪惡感,蘇聯也因此停止了所有暴 力攻擊。運用其國內輿論的同情,是牽制侵略者暴行最有效的策略。

台灣有許多關心兩岸和平的NGO,有機會和中國各個團體交流,應研究分析中國製造動武藉口的各種理由,預先在兩岸交流的相關座談會、聯誼會及網路上廣為宣傳,提醒中國NGO共同留意防止兩岸發生戰爭。只要中國人民打過「反戰預防針」,能夠理性分析政客的伎倆,即便北京當局揚言動武只是為了對付一小撮台獨分子,或者是登陸台灣平亂、維持社會秩序、保護台灣同胞等理由,相信其民間自主團體和網民必然會發出質疑言論,來制止當局採取軍事行動。

其實,就連為釣魚台主權問題對日開戰,中國民間都未必百分之百同意。台灣應善待來台的中國留學生及配偶,增進民間交流與情感,共同預防政客煽動以武力犯台;讓他們了解,給台灣自主發展的機會,並協助中國民主改革,締造和平與民主的永續關係,才是兩岸人民共同的福祉。

萬一中國武力犯台,不要撩撥仇恨,用友善的態度來對待敵方士 兵、軍官及其眷屬,學習波羅的海三國人民,在友善、禮貌的友好關 係下,爭取到他們尊重台灣人民的抉擇。

分裂的危機

若不幸遭遇鎮壓,勢必造成民眾極度恐慌,很可能帶來內部分裂,削弱抵抗力量。另一種分裂則是在殘暴鎮壓後,人民情緒憤怒,加上暴力分子的煽動,認為非暴力抗爭沒用,導致嚴重分裂。由於激進暴力容易吸引年輕人跟隨,導致抗爭轉向,走上報復之路,從此陷進了暴力的輪迴。

再者,台灣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平時影響人民對國家的信任, 因而對政治冷漠,一旦遭遇鎮壓、抗爭受挫,也會出現對領導群的不 信任,階級問題突然升高,嚴重打擊非暴力公民防衛的根基與國家社 會的團結,這時就很容易受暴力者趁機挑動,瓦解非暴力抗爭組織。

權力分散的公民社會,能提高社會復原及防衛能力,人民自信心和自覺能力也較強。所以,唯有發展出多元且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才能培育出民主與正義的公民素質。而建立普及的社會福利制度及健全的社會安全網,則有助於形成堅固的全民團結。

上述分裂危機的預防,應納入非暴力公民防衛訓練教案,這是最有效的方法,當民眾都有了心理建設,就不易被妥協派和暴力派趁虛而入、分化得逞。要是已經造成分裂,就應該嚴格與暴力者劃清界線,不能暗地裡連手抗爭,也不能受暴力組織綁架、利用,並公開向國內外宣告與暴力團體無涉,將繼續堅持非暴力公民防衛抗爭,爭取認同,防止侵略者伺機牽連動武。武裝抵抗在愛國主義掩護下,容易製造出「暴力英雄」。民粹主義容易點燃年輕世代的激情,迷惑理智,使其無從判斷是非,因而孕育出恐怖分子。即使擊退侵略者,「暴力英雄」極可能化身為軍事強人,伺機奪權,進行專制統治,社會也將喪失原有的民主自由。非暴力抗爭強化道德力量,對社會的破壞最小,復原容易。反之,暴力行動不但會帶來重大傷亡,更會損及原有的民主體制,並且讓重建工作困難重重。



圖說:民眾一旦動手,抗爭常常就此失控,或造成運動的分裂。 1990年野百合學運期間,有激情民眾前往陽明山欲阻擋「老賊」修 憲,與警方發生衝突,但幸而沒有影響中正紀念堂靜坐學生的運動主 體性。(余岳叔攝)

「印度人民如果接受嘗試訴諸暴力的想法,或許可以得到暫時的勝利,但這樣的印度不再是我心目中引以為榮的國家。」甘地曾經語重心長地這麼說過。一九二一年,印度的問里柔拉發生暴民焚燒鎮公所、亂刀砍死警察的事件,甘地聞訊,憂心到病倒。身心俱創的甘地於是取消各地反政府運動,以免為暴力者所利用。

功虧一簣

不知成功將至,是因為正確資訊未普遍下達到抗爭民眾。

有時候,非暴力抗爭挺過了鎮壓與迫害,雖然有了重大成就,但 也因此造成人員損傷;儘管侵略者的迫害已經趨緩或停止,然而民眾 卻感受不到勝利即將到來的氣氛。由於長期處於高壓之下,身心俱 疲,充滿無力感,會使得抗爭者誤認為防衛抗爭已告失敗,而意志消 沉,抵抗力量萎縮,甚至因此潰散。

「意志力」是非暴力抗爭的致勝武器,領導人應時時觀察、了解 民眾的想法和情緒變化,透過分組會議匯集到決策中心,由決策中心 來研

判;隨時分析情勢,讓成員清楚侵略者的現況,評估其後續反應 及我方的抵抗成效。當士氣低沉時,分組會議可以採取「開放空間」 技巧,讓成員在沒有壓力下表達想法,提供意見,才能呈現真正的問 題所在,集思廣義,提出解決建議。提供正確的情勢資訊、找出問題 癥結、民眾參與、運用專業知識,這些都是避免誤判情勢的方法,領導人應在實踐過程累積經驗,製作成教材,並將它貢獻出來,成為非暴力公民防衛的共同資產。

全面性徹底抵抗

「全面性徹底抵抗」是經由全體社會成員拒絕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一切合作,對侵略者進行全面抵制。

非暴力公民防衛指揮中心在制定防衛計畫時,必須擬定全面性徹底抵抗,作為和侵略者決戰的準備。而制定防衛總方針,才能掌握大規模反抗的總策略,依總策略設計全面性徹底抵抗行動,當決戰時機來臨時,才能一舉擊退侵略者。

全面性徹底抵抗要有長期對抗的準備,所以應保持原有民主政權的合法性,維持合法政府的運作,若合法政府的總統、行政院長和立法院長均遭到逮捕,政府組織被迫解散,也應該由各政黨共同推舉,組成新政府,繼續運作,迅速恢復維持生存的系統,包括食物、醫療、治安系統的持續運作。小國國防需要新思維、新方法,防衛策略必須整合軍事、政治、經濟、社會與心理等各方面的戰力。

如果侵略者進行大規模逮捕,導致原有行政機關無法運作,也無法另組新政府時,就必須發展出一套無中央管理的社會自律型運作模式,藉由社區互助提供糧食和物資,自組警察、巡邏隊、司法,來維護治安、調解處理犯罪或爭議,以維持社會秩序。

同時,要掩護政治活躍人員、社運領導人、積極抗爭人士及青年;維護訊息傳遞管道暢通;檢舉背叛、賣國者,詳細記錄他們與侵略者的罪行;以藐視和拒絕來杯葛傀儡政權及其支持者。

在進行全面抵抗之前,最好先發起對侵略者壓力較小但能大規模動員的行動,用以鼓舞民眾,及預演大規模行動。一九八九年,波羅的海三國由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環保運動者串聯,假借波羅的海汙染議題,發起三國人民聯合行動—多達一百六十五萬人民參與,手牽手形成人鏈,連接三國首都,從維爾尼斯、里加到杜林,全程共六百多公里,即為著名的「波羅的海之路」;之後,再將訴求轉換成三國團結「爭取獨立」,達到最佳國際宣傳效果,也大大提升了三國的民心士氣,為總決戰做好準備。

當面對敵人時,團結一致會讓人產生自重、自尊和自信,因而減少恐懼和屈服的心理。參與抵抗的個人常會不自覺地觀察別人的態度,如果沒人可作榜樣,不免會覺得孤單無力、不知所措。讓抗爭者清楚自己所處的地位和任務,了解其所負擔的責任,並且能收到正確的指示,他才能建立信心、發揮潛能。這時,尤其必須增強民眾的信心,堅持非暴力紀律,以度過困難的時刻,為全面抵抗做好準備,社會內部的力量和堅韌性也將因此增強。

大規模抵抗之前,要先廣泛蒐集及分析資訊,以便能在最短時間內集結最大能量。最重要的是事先的訓練和傳播,並將「抵抗要點」印製成《防衛指南》,發到各個動員據點——例如罷工、罷市、罷免、罷課、抵制禁令、怠工、癱瘓交通、癱瘓金融、占領等行動要領、可能遭遇到的阻力,及個人如何因應等等,都應加以詳細說明,

並且確認防衛民眾都已了解。要是狀況緊急,來不及充分準備及訓練,可藉由媒體與網路等傳播工具,迅速傳授及指揮民眾進行非暴力抗爭。

政治杯葛的全面性徹底抵抗,是對敵人的命令、政令及法律,發起公開的全面抵制一妨礙其施行,或暗地破壞、干擾、阻止;策動公務員罷工、杯葛、公然違法、離開工作崗位等等。至於對中國(侵略者)的經濟抵制,可以採取消費者杯葛行動,拒買中國貨,拒看中資或傾中的報紙和電視節目;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提清存款、罷稅、罷課、拒繳規費或欠費、拒絕使用特區貨幣或人民幣、公布貿易公司黑名單,並串聯國際禁售、禁購、禁運。



圖說:媒體的角色及態度常常左右了運動的方向及成敗。圖為一〇〇行動聯盟的反閱兵抗爭中,記者被隔離在基礎醫學大樓之外不能進入採訪,因而以稿紙寫抗議狀,為新聞自由進行非暴力抗爭。(周嘉華攝)

為抗議種族歧視政策,美國阿拉巴馬州的黑人拒搭巴士,抗爭長達三百八十一天;甘地發起拒買英國貨,鼓勵印度人自行織布,並違法製鹽,以抵制鹽稅;另外,南非黑人拒買白人經營的百貨公司的商品等等,都是很好的消費者杯葛例子。至於生產者的杯葛,則是指生產者拒絕出售其產品,例如荷蘭農民在納粹占領期間,拒絕運送牛乳和農產品,用盡技巧藏匿,留作自用,或者乾脆銷毀。

總罷工目的在阻斷占領者的經濟利益,但民眾也必須忍受生活的困苦。若要發起總罷工,必須有充分準備,還要有提供緊急服務的應變能力。因為台灣社會缺乏罷工經驗,所以必須經由教育訓練來提升觀念。長期罷工、拒買,對民眾也會造成生活不便、資源缺乏等等困難,必須全面準備,才能存活下去,包括儲備食物、飲水、燃料、藥品、醫療器材等等,這也是長期罷工、徹底不合作最困難的地方。

長期罷工和拒買,對反抗者自身的傷害遠比侵略者嚴重,就像刀 劍的雙刃,傷害對手,也傷害自身,因此不宜發動太過於長期的罷工 或拒買。

另外,也不宜採取絕食抗議。絕食抗議是一種更為慘烈的激進抗 爭,面對尚未展露人性的侵略者,反會造成抗爭者無謂的犧牲。一如 甘地所言:「我絕食是為了感化愛我的人,但絕不可為了反抗暴君而 絕食。」雖然甘地與阿美達巴德紡織廠的老闆有深厚的交情,但為了 改善工人待遇偏低、工作量過大的現象,他仍然起而反抗。甘地認為工人抗爭合情合理,於是勸工人罷工,但老闆不願妥協,罷工時日拖久後,工人也失去了信心。眼見抗爭面臨崩潰危機,甘地於是宣布:如果大家不願繼續罷工,他就不再進食。這是甘地第一次絕食,帶給老闆極大的壓力。三天後,勞資雙方都同意進行調解,為期二十一天的罷工宣告結束,問題獲得圓滿解決。可見唯有在感化具人性的權力者或愛你的人,絕食才會產生改變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甘地告誡:絕不可為了反抗暴君而絕食。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抗爭行動不可留下長期的損害,要盡力避免或減少暴力創傷、入獄和流亡的痛苦;要讓罷工工人能重回工作崗位,抵制購買的人也可以回到商店購物;適時取消集會或遊行。非暴力抗爭結束後,要能迅速恢復經濟及社會運作,讓民眾過正常生活。將破壞和災禍減到最小,戰爭結束後才能迅速締造和平。

善用國際的人道壓力

平時就應與周邊國家維持和諧關係,讓其感受到台灣自主存在對其有利。參與維和、人道救援、人權及民主的提倡與協力,若無法以政府名義合作,就鼓勵慈善、和平、人權團體積極參與,例如三一一大地震時援助日本、亞齊海嘯時對印尼的救援,及對菲律賓水災的救濟。發揚人道精神,增進信任和友誼,台灣的利益自然與他國結合,才可能將台灣面臨的危機「國際化」,得到國際支援。此外,更應與良治民主國家及歐美各國建立信任關係,爭取他們認同兩岸問題必須經由台灣人民自決,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當中國以武力併吞台灣時,才能得到大國和聯合國的聲援及介入。

由於中國的圍堵,我們的邦交國少,而且沒有國際影響力,所以民間團體更應代位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在美、日、歐各國壯大台灣同鄉會、人道救援醫療團體,與各國學術界及智庫、人權組織、宗教團體、政黨和國會建立友善的關係,爭取支持。

此外,還要爭取國際大企業來台設廠,建立起多國產業鏈、技術零組件依賴關係。並且要善待在台移工,以影響其母國,為了保護他們的人民,反對中國對台發動軍事侵略,並協助在聯合國為台灣發聲,呼籲和平。

再者,平時就應維繫國際媒體聯繫管道,才能立即有效地傳播侵略者的惡劣行為。一旦中國入侵,要爭取時間,盡快獲得國際關注與支持,並戳破其偽裝與正當性,揭發及控訴中國暴力鎮壓的殘暴行為,使其軍隊失去道德形象。以非暴力對抗侵略者,更能獲得國際的同情與支持,得到技術提供和經濟援助,例如電信、新聞傳播、網路平台、地下電台、出版、生活物資等支援。

若不幸遭遇鎮壓、屠殺或人權重大迫害時,應以影像、文字做成 記錄,迅速傳送國際各媒體,並且藉由網路大量散播,以盡快得到國 際媒體與網路鄉民的聲援,進而影響各國政府和人權團體,出面有效 干預、制止暴力,甚至介入調停。

非暴力公民防衛中心平時就應做好與各國媒體聯繫及網路發布的 關係網絡,指揮中心新聞群要招募經驗豐富、思考靈敏的新聞專才和 網路高手,屆時以智慧和專業能力突破侵略者的新聞封鎖,和侵略者 大打媒體戰。

階段性妥協

不過,再完美的防衛計畫有時也會隨局勢變化而無法如意。沒有絕對不會失敗的策略,也不可能有保證成功的行動。例如碰到鎮壓、屠殺,抗爭者心理遭受重創,而退出抗爭或潛逃離境;無原則的「和平締造者」出現,大肆宣揚投降主義;暴力分子趁機煽動分裂組織等等,都會讓非暴力公民防衛遭受嚴重損害。

非暴力公民防衛有時也需要和侵略者妥協或讓步,目的是為了減少損失,尤其是罷工等經濟抵制,一旦時間拖太久,民眾生活陷入危機,或是其他的抗爭行動遭遇重大挫敗時,就必須採取暫時性的解決方案而妥協。這不是投降,而是休養生息,是為了下一波抗爭做準備。這時候,要評估新情勢,調整計畫和策略,修訂行動方案。在訓練時也必須把「階段性妥協的必要」納入課題,防止民眾誤以為已經失敗,而喪失抵抗意志,甚至一蹶不振。

「沒有投降」的抗爭

非暴力公民防衛行動失敗的原因,通常是自身條件的缺點,例如訓練不足、抗爭技術差,導致防衛失效;時間拖長,民眾漸漸失去信心,因而削弱非暴力技術的運作,進而投降,或轉而使用暴力;失去反省檢討能力,無法開發出有效的新戰略及戰術。諸如此類導致非暴力公民防衛失敗的原因,與軍事作戰失敗的因素十分類似。

反之, 非暴力公民防衛之所以能夠成功, 原因就在於: 有能力分析並利用敵人的弱點; 有智慧地選擇策略; 群眾團結合作, 使得抵抗

行動展現效果;有效發揮民主和人權力量,爭取國際支持;民眾對於 侵略者施加的肉體迫害,有強韌的忍耐能力。

如果參與者大多接受過訓練,具備充實的非暴力抗爭知識,了解 非暴力抗爭的技術、有效條件和戰術守則,就能減少遭遇困難和失 敗,取得較大的成功機會。而有過非暴力抗爭經驗的參與者,也會增 加自尊心、信心和能力,降低恐懼和投降心理。

一如軍事作戰,非暴力公民防衛同樣也可能遭遇失敗。不過,非暴力公民防衛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字典裡沒有「投降」兩個字。非暴力抗爭雖然有時候必須妥協、休息,但之後仍會繼續不斷地抗爭,因為不需要武器和裝備,只要信念與意志力不消退,隨時都可以再度凝聚民氣,持續向侵略者發起不合作抵抗;經由反省、修正策略而重生,累積抗爭經驗,持續地壯大,直到打敗侵略者為止。

軍事作戰,至少有一方會戰敗,也可能雙方都損失慘重,而形成「雙輸」的結局,失敗者想重新武裝、進行反擊的機會渺茫,尤其是小國都會因此亡國。非暴力公民防衛不在於消滅對方,也不會戰敗,有時還能快速瓦解不義的統治者或侵略者,例如波羅的海三小國、薩爾瓦多、東德、捷克斯洛伐克,都迅速達到成功,將損害降到最小。

中國不是敵人

以非暴力公民防衛嚇阻中國併吞,是台灣唯一有機會成功的戰略,時間緊迫,已不容許我們再猶豫,應盡快建立社會共識,並遊說各政黨,透過立法建構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

但是,我們也要了解「中國不是敵人」,理解其領導人背負著「完成統一」的歷史使命,以及中國人民民族情感的善意;歡迎中國領導人以和平、民主的方式來完成統一大業,但也要讓對方知道,強迫式的併吞將會遭到台灣人民以「不合作」長期抵抗,不僅統治困難重重,而且反而會刺激台獨分離運動高張。在此,借用當年甘地在英國下議院演講的一段話,提醒中國人民和北京當局:「遭受奴役但難駕馭的台灣?還是與中國合作互敬,在中國遭受災難時願共患難,並協助造福全球的台灣?」

和平民主的兩岸關係才能永續、相互扶持,分享「台灣夢」與「中國夢」的成就。在愛與平等的基礎上,不論是維持現狀的分治,或者是未來走向統一,都要尊重人民的抉擇。兩岸領導人可為華人民主創造光榮歷史,成為受國際尊敬的國家領導人。



圖說:「蔡許案」也是台獨運動史上重要的一頁,民眾為了聲援 因台獨言論遭判重刑的蔡有全、許曹德兩人,1988年首度公然在街頭 使用「台灣獨立」標語。(邱萬興攝)

第八章 結局

第一章以中國如何併吞台灣的故事作為開場白,本章就繼續第一章未講完的故事,來作為本書的結尾—台灣人用非暴力全面抵抗中國 入侵,究竟能否扭轉命運?

二〇二〇年,國台辦主任王兆基催生「統一公投」,遇刺身亡。 台灣在中國武力恐嚇及台商大老呼籲下,繼續進行公投。公投計票加 計台灣人在中國的「不在籍選票」,扭轉最終結果,「同意統一」者 以一%之差逆轉勝,結果引爆台灣內部動亂。反統一的民眾迅速占領 總統府和行政院,導致政府癱瘓,還未就職的新總統連正文倉皇逃亡 北京,呼籲中國派解放軍登台平亂。

解放軍登陸後,遭遇上街抗議的民眾,因而受命強勢武力鎮壓,並格殺「台獨首腦」,於是真槍實彈地掃蕩街頭,民眾紛紛走避,只剩少數激進分子頑抗,恐怖氣氛瀰漫全台,猶如二二八事件重演。

解放軍槍斃了民進黨主席、台獨領袖和激進青年等十二人,儘管遭到國際人權組織及多國領袖同聲譴責,但北京當局辯稱此一「戰爭狀態」是為了「平亂」,不容許外國干預中國內政,更何況「統一」是經由台灣人民公投的選擇,「平亂」則是為了保護台灣同胞,會盡快恢復民眾正常生活,並宣稱中國已盡力做到最大的克制,以最小的武力懲罰暴民,絕無濫殺無辜百姓。雖然國際媒體指控,除了十二名政治和社運領袖遭殺害,還造成了數百位民眾死傷,要求公布真相,並開放國際媒體進入台灣採訪,但中國政府完全不予理會。

中國宮廷式內鬥的效應

二〇一七年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在中央委員會一直推遲進 行二〇二二年「二十大」會議的接班人準備。依照接班慣例,應該由 胡錦濤指定的胡春華和孫政才接任總書記和總理,習近平遲遲未依慣 例做接班準備,引起接班人競爭,派系鬥爭的危機因而升高。

中共不能再採行毛澤東的領導人終身制,也不敢回到中國傳統皇帝世襲制,又不願意效法西方民主選舉,於是獨創了十年一任的「隔代指定」接班人續位制度。鄧小平指定胡錦濤為江澤民的接班人,江澤民則指定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習近平是首位非毛澤東和鄧小平等元老所指定的接班人,在二〇一二年習近平接班之前,這種「隔代指定」就遭到了權貴核心的挑戰,接班鬥爭在檯面下激烈展開。

當年,重慶市長薄熙來以「唱紅打黑」而成為中國的政治明日之 星,其心腹副市長王立軍在習近平接班前,闖入美國領事館尋求庇 護,揭發薄熙來、周永康等策劃政變的黑幕。

政變布局早已進行,江派反習人馬將薄熙來推為政治局常委,並接任法政委書記,一旦時機成熟,薄熙來就會利用控制在自己手上的公安,再聯合江派軍方勢力,一舉廢掉習近平政治局常委的職務,羅織罪名加以逮捕,或者乾脆暗殺掉習近平,同時發動政變。另外,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和羅幹,也牽涉參與薄熙來及周永康共謀的政變計畫。

王立軍怕遭暗殺而叛逃,導致政變流產,也讓習近平得以進行反 撲,鞏固地位。表面上,薄熙來被以涉嫌受賄、貪汙和濫用職權三罪 輕判,隱藏政變事實,以免太子黨和毛派政治勢力反撲。習近平在穩 定接班後,再以「中油國際」貪汙案整肅周永康,並且大力抓軍方貪 汙將領,削弱江澤民派系中不滿習近平的勢力,進一步穩定其領導地 位。

習近平上台後,全力扶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大舉晉用的年輕歸國學人遍及黨內外要津。為了避免重蹈因政變而成為被批鬥的對象,習近平對於胡錦濤指定的下一任接班人胡春華和孫政才極不信任,而胡錦濤派系內部對指定胡、孫接班的不滿勢力也在積極集結中,習近平於是利用各方矛盾,推遲接班準備。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主張走社會主義路線的「新左派」,及擁護資本主義的「新自由派」,無不希望取得執政權,來實現其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兩派勢力都試圖影響習近平,而習近平在執政初期,則利用左右矛盾,依循「經右政左」來平衡兩派。但隨著中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及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發展,左右兩派鬥爭越來越激烈。

習近平雖然高調批判「憲政民主」、「公民社會」和「普世價值」,強調這三個西方民主觀念無法適用於中國。不過,他所重用的「海歸派」學人,大多留學美國或歐洲,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響,就連「太子黨」、「紅二代」也都接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因而擺脫了中國文革式鬥爭思維,深知中國政治要穩定,不能不走西方民主路線。

習近平為求自保的民主改革

二〇一七年,中共十九大會議,習近平報告「新五年計畫」,強調「加速政治改革」,闡明憲政改革方針、回歸憲政體制,成為國內外矚目焦點,並且都解讀為習近平「反對隔代指定接班」,新聞評論

對此尤其感興趣,國際各大媒體都刊載了由政治評論大師撰文的分析稿,預測中國在政治動盪下的改革走向。

習近平前五年執政,大力整治貪腐,政績顯赫,對大貪小貪的「老虎」和「蒼蠅」一律不手軟。但根據國際媒體分析,習近平打貪其實是有選擇性的,因為中國官員普遍貪汙,以此打擊政敵及其背後的企業,既可鞏固權力,又能博取治貪美名。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調查中國離岸公司機密資料發現,許多中 共高官或其家屬,經由股市內線交易,及企業初始上市股票配購特 權,投資各大企業,迅速累積龐大財富。他們無不想盡辦法將巨額不 法所得藏匿在海外免稅天堂,例如維京群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瑞士、新加坡等地。

包括鄧小平、胡錦濤、溫家寶、李鵬、戴相龍的家屬,其所藏匿的不法資產一一被揭露,甚至就連習近平的姊姊和姊夫也在其列。習近平不敢查辦這些巨頭的家屬,但反習勢力從富商均建華與習家親屬資金往來資料中獲悉,習近平家族擁有高達約四十億美元的龐大資產,大多集中在從母姓的姊姊齊橋橋、姊夫鄧家貴與齊橋橋女兒名下。反習集團透過國際媒體指控習近平掩護、介入並取得巨額利益。此外,習近平也涉嫌收取美國軍火商賣武器給台灣的回扣。奪權壓力讓習近平倍感山雨欲來、危機重重,其手下海歸派智囊團因此獻策,所以才有了十九大政治革新的宣示,提出具體的政治民主化步驟。

接著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解除六四天安門禁忌;平反胡耀邦;海外民運人士獲准回中國;允許北京、上海、南京、重慶、廣州試辦市長直選·····中國民主改革的具體成效廣受國內外輿論的肯

定,習近平的聲望如日中天,甚得民心,鞏固了他的領導權威。密謀反習的勢力不得不走入地下,這幫胡錦濤舊勢力密謀串聯江澤民幫反習舊勢力只能伺機反撲,打算若習近平改採元首直選,破壞「隔代指定」繼位制,一旦出現政治大動亂,屆時再以叛國、內亂罪置習近平於死地。

二〇一九年,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在楊建利、王丹、滕彪和劉曉波等「中國制憲民主聯盟」支持下,當選北京市長;上海市長一職雖然沒有被民主聯盟的候選人拿下來,但當選人也不是共產黨提名的,而是開明派的章念馳;至於其他各選區的市長選舉結果,則由共產黨軍政舊勢力瓜分,不過,民主派也獲得了兩到三成的總票數,頗有三分天下之勢。

胡耀邦當年為文革期間遭迫害者的冤假錯案主持大平反,力陳人性與人道主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價值,也是對人權與民主的尊重,「責任政治」和「實踐憲政」則是共產黨改革的重心。胡德華曾問他父親,為什麼要參加革命?胡耀邦回答:「當前社會不公平,我只是為追求公平才參與革命。黨跟我說要建立一個符合我理想的公平社會。」

一九八六年底,胡耀邦支持「八六學潮」所提出的民主改革訴求,結果遭鄧小平逼退(一九八七年元旦);一九八九年因心臟病去世,又間接引爆「六四事件」。胡耀邦一直是推動中國憲政改革的代表人物,也是備受學生敬愛的精神領袖,因而推舉胡德華當選北京市長,深具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由於私有產權的合法化,民間企業和中產階級快速成長,社會矛盾和民間力量也與日俱增。每年多達十餘萬件的維權抗爭、各種NGO組織的出現、民間教會的發展、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反拆遷、反侵占的土地運動、同城公民圈運動、零八憲章運動等等,奠定了推動民主改革的社會環境。

加上網路普及,民眾便於取得及傳播訊息,儘管官方編列了數十萬名網路警察來監控,但因為網路技術不斷翻新,監控成本大大提高,而且效果欠佳。甚至連傳統出版品的管制,也無法禁止「禁書」流傳。

其中一本名為《劇變年代的青春夢》的小說,描寫七位年輕男女 在台灣戒嚴體制下的愛情、叛逆、熱心民主運動,卻因台獨主張而決 裂的故事。書中描述的兒女私情、政治鬥爭、派系奪權、突破威權統 治、栽贓謀殺等等,更顯示權力對人性的魔力誘惑,各類讀者都能各 取所需地來閱讀。這本愛情政治小說於是成了中國流傳最廣的一本 書,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啟發,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中國芒刺在背的台獨運動

二〇二〇年,中國迅速併吞台灣,激起了台灣人的被迫害情結, 台獨運動成為最具號召力的公民運動。台灣人已經對戒嚴麻木,戒嚴 並無法制止政治反抗活動,傀儡政府備受鄙視,只能仰賴解放軍和公 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簡稱「國保」)來鎮壓、逮捕民眾,以維繫其 統治地位。 各地不斷出現抗爭的塗鴉和標語、倒掛五星旗、公共廁所裡有印著五星旗的衛生紙和腳踏墊、快閃集會抗議、網路kuso中共和連正文的動畫與文章成為流行娛樂。就算被抓到,也只是關幾天而已,每次抓人反而促使出現更多的反抗行動,抓不勝抓。



圖說:1977年的「中壢事件」被認為是台灣民眾首次自發上街抗 議選舉舞弊,並從此揭開街頭運動的序幕。然而事件中,民眾搗毀警 察局、警察開槍打死兩位學生,則是台灣社會共同付出的昂貴代價。 (張富忠提供)

而最讓執政者頭痛的則是「台灣國」國旗的出現,雖然已宣告私 藏或懸掛視同叛亂,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在台北大稻埕和高雄鹽 埕區,卻出現一夕間滿街都是台灣國國旗的情況,甚至連正文的官邸 高牆都被噴上台灣國國旗圖案,中正紀念堂最高的國旗桿也被換上台 灣國國旗。這些畫面在網路上大為流傳,卻始終抓不到主謀,反而鼓舞了更多反抗者加入。段一康是非暴力抗爭的領袖之一,多次大型集會和靜坐抗議,都由他所帶領的「非暴力小組」細心規劃,成功地突破傀儡政府的阻攔。他是「國保」嚴密監視看管的「要犯」,但每次動手逮捕他,都會引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讓傀儡政府非常頭痛。

這時民進黨大老若非被捕,就是流亡海外,中生代的段一康扛下領導責任,串聯各地仍具企圖心的政治領袖,組成「非暴力建國組織」,散發《台灣建國行動綱領》及《非暴力抗爭手冊》,並在各地舉辦訓練課程,及經由網路散播理念。

「黑島動力工廠」是以魏庭凡為首的青年組織,較具左派思想,對於如何「獨立建國」有創新的想法;他們從年輕人的生活經驗中提出落實公平正義的主張,左而不教條,對年輕人很有吸引力;除了堅強的核心組織,還經常與各地的行動者聯繫,創新而靈活,網路動員系統廣闊且有效率,也跟中國網軍打過好幾次數位戰,中國網軍始終無法攻破他們特異的系統。他們發動最具震撼的一次抗爭是「不下課」占領校園,讓校長、老師、行政職員也無法下班,訴求是要求駐校的公安和「國保」退出校園,還給學術與言論自由,成功地將「國保」逐出校園,中共只能在校園附近租房,安置「國保」就近監視。

另一支以「插旗」為代號、主張武裝革命的團體,首腦人物鄭晨 光是和段一康一起搞學運的拜把兄弟,交情深厚,兩人都是民進黨中 理想派的中生代菁英,卻因為爭論應採暴力或非暴力對抗中國而分道 揚鑣。「插旗」屬於祕密組織,嚴格過濾成員,組織小而精銳,後來 證實王兆基遇刺就是「插旗」策劃的暗殺行動。 另外,「賣台奸商」桂凱宏也在桃園機場出境大廳遇刺,震驚北京及特區政府,至今仍未逮獲凶手,表態親中的台商大老人人自危,紛紛雇請貼身保鑣。中央也派出經驗豐富的幹員支援特區政府,希望能盡快殲滅「插旗」。

同時,海外台獨聯盟則死灰復燃,吸引更多留學生加入,並聯合全球台灣同鄉會進行海外遊說,爭取美、日、歐政黨和國會同情及支持台灣獨立;揭露與控訴中共違反人道事件;募款支援國內台獨運動;舉辦遊行和公聽會;到中國大使館抗議;赴聯合國請願等等。台獨聯盟密集的活動引起國際媒體重視,美國、日本和歐盟原本就有許多議員同情台灣,他們頗具聲勢地公開發言支持台灣重新公投,要求中國給予台灣真正自決的機會。

「法輪功」是一股非政治性的反共力量。創始人李洪志以易學且 高層次的氣功,傳授自療病痛保持健康之道,並提倡以「真、善、 忍」自我修練,要求學員除了鍛鍊身體,也要提升道德,要有慈悲 心,願意幫助他人。由於不像一些斂財的氣功師父,法輪功自一九九 二年創始,短短七年在中國就擁有七千多萬個學員,因而震驚中共當 局。

中共最擔心民間組織壯大,就連宗教活動都嚴厲禁止,江澤民先以媒體詆毀法輪功,再予以鎮壓,試圖瓦解。李洪志流亡海外,仍然繼續傳授法輪功,目前全球已有逾億個學員。中共不能如其所願,於是變本加厲迫害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除了施行虐待、下放勞改,並活摘器官販賣圖利。學員在歐美各國宣傳中共暴政,遊說政要抵制中共,救援受害學員。

台灣法輪功學員眾多,因為不是剛性組織,甚至沒有任何組織型態,全靠學員自動自發及信息相傳,但瞬間即能強力動員;雖然不與政治結盟,也非台獨組織,卻是最堅定的反共勢力。傀儡政府聽命中國當局,逮捕、鎮壓法輪功學員,卻受到更為強大的反撲,讓它頭痛不已。在台灣遭併吞後,法輪功學員反而更能發揮反抗的力道。各國政要譴責中國迫害法輪功、違反人權,壓力更勝以往。

台灣各環保團體則和北京環保組織合作,在中國展開全民維護生活環境抗爭,密集舉發汙染工廠,讓它們被迫關廠歇業,因而逐漸解決中國霾害問題。台灣反核、反國光石化、大埔反科學園區擴建徵地的抗爭經驗,舉凡如何動員民眾參與遊行、圍廠抗爭、請願、訴訟等各類具創意的行動,開啟了中國NGO的視野,也讓他們比較敢大膽對抗體制。中國民間團體認為台灣能,他們也能,跟台灣做經驗交流,對他們幫助很大,也一致認台灣的民主價值是寶貴的資產。中國社運人士同情台灣處境者漸漸增多,雖然受限於民族情感,他們對於台獨運動仍有所保留,但希望台灣還能保有民主體制。

中共高層這時也開始出現爭論,畢竟台灣不像西藏或香港,「中華民國」原本就是一個自主獨立的民主國家,歷經民主運動才建立起公民社會,人民的韌性和爆發力特別強,給中共帶來的麻煩,遠遠超過他們當初的想像。併吞台灣無法讓台灣人屈服,當民主制度、言論自由及生活都受到嚴重傷害時,更使得原本贊成統一的台灣民眾也開始改變態度,轉而同意台獨人士的訴求。併吞反而讓台灣距離中國越遠、越敵對,反習近平的勢力因此屢次在常委會中提出「台灣議題」來抨擊習近平。

為了平息台民之亂,習近平只好指示特區政府解除戒嚴;原先宣告十年內暫停各級政府首長與民代選舉,也同意提前解禁;並保證台灣享有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但禁止利用選舉提出台獨分裂國家的政見。

密謀行刺李克強

非暴力建國組織靠著反中民氣,迅速發展,並擴及公務體系。所出版的《非暴力抗爭手冊》中「公務人員不合作行動要領」一章,告訴警察、司法、公務員及教師為何要否定非民主產生的政權,如何抵制、延誤、出錯、降低行政效率,及保護我方反抗人士、掩護、放人或輕判等各種要領和藉口。

「拒絕向傀儡政府繳稅」是由段一康發起的全民非暴力抗爭。五 月是台灣報稅繳稅的月分,傀儡政府在三月下旬才剛掌權,還不穩 定,完全是依靠中國以強制力來維護其統治,因此拒絕繳稅有相當的 正當性和社會感染力。經由網路鄉民、社運團體、社區、學校等,透 過各項活動宣傳抗稅理念,呼籲民眾集體行動。

為了讓民眾有拒繳的勇氣,行動要領教導民眾提清存款,以免被強制執行,甚至造成經濟困境;對補稅通知提出異議、複查、訴訟;組成龐大的律師團,為抗稅民眾義務辯護,減輕民眾的心理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民眾願意參與抗稅。

稅政公務員也故意延誤或寄錯催繳書,把錯過繳稅期限歸責為行 政因素。最嚴重的是,駭客搞亂稅籍資料,薪資所得資料被消除了一 大半,財政部得重新建檔,因而造成延誤,一直到了九月都還無法確認補稅金額。

財政主管呂才朗為此被解職,賦稅署長及多位稽徵處長被降調或 記過處分,但反而引起更多公務員不滿,激起更多的不合作抵抗。駭 客一事,最後證實是內部資訊技術員所為,結果多人被起訴,求處有 期徒刑二十年,但資料管理仍一再出紕漏,並未因重懲公務員而有所 改善,特區政府因此進入半癱瘓狀態。到了年底,加上追補的總稅收 還不到以往的三分之一,財政發生困難,得仰賴中央借貸及補助才能 勉強度日。

此次抗稅的成果,鼓舞了更多民眾積極投入非暴力抵抗,各地自發性地怠工、休市、包圍公安局和汙染的工廠、勞資爭議、土地徵收 抗議、反調高學費、抗議健保商品化、中資壟斷工業和服務業、中國 黑心商品毒害民眾……讓傀儡政府疲於奔命,統治成本節節增高。

二〇二一年十月,縣市長及議員選舉,表態參選的都是傾中或利益型政客,因為不涉及改變體制,反政府組織不只沒有派成員參選, 而且暗地裡破壞選舉,結果投票率低到連三成都不到。對反政府組織 而言,此舉目的在於演練「大對抗」時的總動員。

中共中央為了安撫台灣民眾,決議在二〇二二年七月讓台灣人投票選出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總理李克強將親臨台灣視察,並宣告此項自治利多消息。

「插旗」頭子鄭晨光準備利用李克強訪台時刺殺他,迫使中國放 棄對台統治。中國情治單位也得到了相關情資,並布下天羅地網,務 必除掉鄭晨光及其黨羽。

鄭晨光推測李克強來台可能的時間、住處、活動路線、警戒護衛,擬出好幾個方案,並決定採取最靈活的方式來因應變化。他預估李克強此一政治動作的目的在於獲得國際媒體正面評價,必定有記者會之類的公開活動,特首連正文也會搞個民眾和學生夾道歡迎的場面。李克強的下榻處及進出路線,都是鄭晨光規劃下手的地點。

段一康和魏庭凡也準備發起包圍機場及記者會場的抗議活動。劉 媽媽是跟隨段一康很久的義工媽媽,忠誠又很有親和力,常常為志工 們準備餐飲,大家都以「劉媽媽」親暱稱呼她。某日晚上,在抗議籌 備會議後,劉媽媽請大家到家裡吃水餃、滷味,喝啤酒,大家盡興地 吃喝,直到半夜才散場回家。

劉媽媽以「有事相託」留下段一康,段也想幫忙清理杯盤善後, 爽快答應留下來幫忙,稍事清理後,劉媽媽叫女兒先去睡覺,段一康 正想問劉媽媽何事需他幫忙時,鄭晨光突然從房間裡走出來,段心裡 一震,知道是劉媽媽安排的局。

略過寒喧,鄭晨光直接低聲說道,已準備好刺殺李克強的計畫。 段、鄭兩人再次激辯。段一康的聲音越來越大,劉媽媽不斷提醒他放 低音量。兩人仍是各堅持己見,鄭認為對付獨裁的中共政權只有人民 揭竿而起,用革命的方式以暴制暴,才能推翻它扶植的傀儡政府,光 是用恩情理性是感動不了中共的,只會讓他們看衰台灣人,竊笑台灣 人數百年來都順從外來政權的奴才性格。 段一康則表示,以卵擊石的暴力抗爭,無法對抗裝備精良的解放 軍,反會讓中共找到殘暴鎮壓的藉口,帶來極為慘痛的後果。鄭冷靜 地微笑說道:勇者雖死,卻可鼓舞後繼,北愛爾蘭共和軍和巴勒斯坦 哈瑪斯,才是讓英國及以色列頭痛的對手,用暴力才能迫使強國坐下 來談判,爭取到他們應有的政治利益。阿富汗打贏蘇聯,北越更是讓 美國鎩羽而歸,比武器裝備,他們和強國天差地別,但勝敗不在武 器,而在如何造成敵方官員和軍人恐懼,摧毀其軍人的信心。在台灣 打游擊戰,我方占有天時、地利、人和,才是致勝之道。

來談判,爭取到他們應有的政治利益。阿富汗打贏蘇聯,北越更是讓美國鎩羽而歸,比武器裝備,他們和強國天差地別,但勝敗不在武器,而在如何造成敵方官員和軍人恐懼,摧毀其軍人的信心。在台灣打游擊戰,我方占有天時、地利、人和,才是致勝之道。來接應的機車後座,和掩護的武裝吉普車分頭疾駛,分散追捕警力。鄭晨光拔槍反身射殺在後面追捕的公安,機車疾駛進窄巷,穿梭在路障之間,警車一下子就被拋在後頭,吉普車也消失於夜霧中,鄭晨光再度順利姚過嚴密的圍捕。



圖說:聲援「蔡許案」的民眾於1988年1月全台「遍地開花」,大 小衝突不斷。(邱萬興攝)

公安搜查劉媽媽家,找到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劉媽媽家的地址 及「見段」的字樣,比對字跡,確定出自鄭晨光之手,劉媽媽、劉小 姐和段一康都被依密謀暴力顛覆政府及暗殺官員罪嫌逮捕入獄。

幸好非暴力建國組織早已安排好第二線領導人,段一康透過辯護律師傳話,取消機場和記者會抗議行動,讓同志不明就裡,親中媒體也醜化段一康是想藉此換取保釋或屈求減刑。「段和鄭見面密謀」的新聞被持續做大,強力向國際宣傳「非暴力建國組織」骨子裡是貨真價實的暴力團體。接著大肆逮捕、審問,企圖順勢瓦解該組織。

随著李克強訪台的日子接近,國內外媒體也拿到了較為確切的時程和活動流程—十二月七日上午十點二十分,專機將抵達桃園機場,

旋即轉往凱達格蘭大道原總統府的特區政府辦公室,用餐、聽取簡報,晚宴則在圓山大飯店,邀請特區政府要員、台商代表、媒體代表、農工代表,聽取台灣民間心聲;第二天上午十點,在圓山飯店十樓國際會議廳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台灣行政長官選舉時程,以示給予台灣高度自治的「德政」。

鄭晨光計畫在從機場進入中山高速公路匝道前的路邊安置遙控炸彈,在確認車隊中李克強的座車位置後,以密語通知引爆,炸彈威力足以炸碎車輛,讓李克強屍骨無存。第二計畫則是在李克強從特首辦公室抵達圓山飯店前,預先收買園藝公司老闆林本村,讓「插旗」成員假冒成整理花圃的工人,在車道旁邊的花圃裡裝設超威力遙控炸彈,李克強的座車一抵達,就立即引爆。

但鄭晨光的計畫全面失敗。李克強專機臨時轉降松山機場,再改 搭直升機到特區政府辦公室,前往桃園機場接機的官員、媒體和小規 模抗議民眾全都撲了個空,但也化解了危機。園藝公司老闆林本村害 怕成為刺殺李克強的共犯,於是祕密自首,並協助逮獲假冒的園藝工 人,再循線抓到執行引爆的陳桔。陳桔遭到嚴刑逼供,他的家人也被 抓來,一併以共犯審訊。在親人受苦的折磨下,陳桔終於供出鄭晨光 的三處藏身處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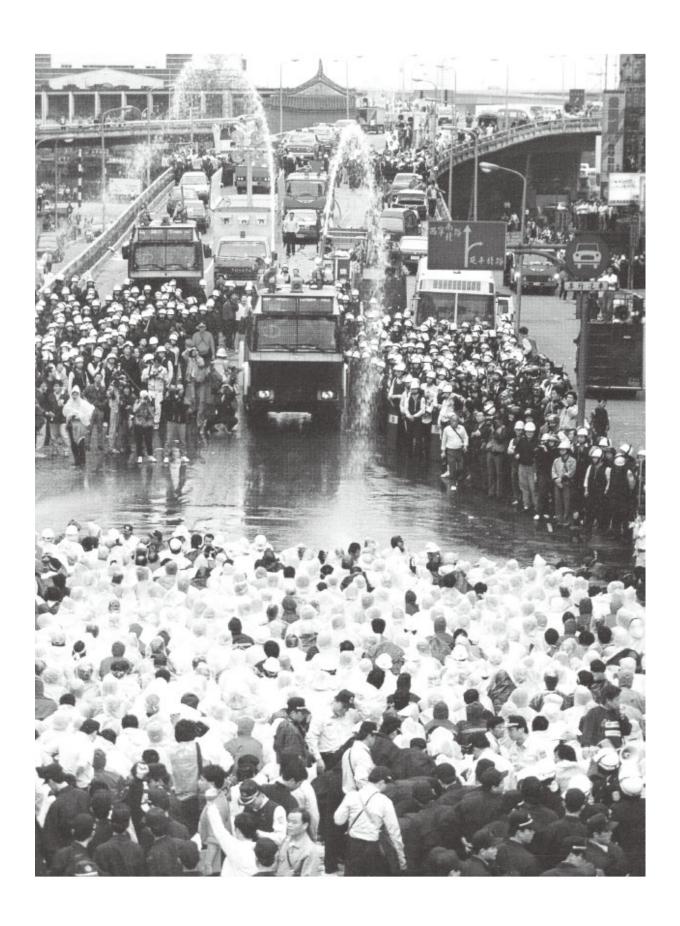
在安全幹員指揮下,特訓部隊迅速包圍這三處密穴。在龍潭某處 農莊,七位「插旗」成員還來不及抵抗,就全部被繳械,並遭到逮 捕;在新店以電子工廠作為掩護的基地,十一位「插旗」成員五死兩 重傷,四人被活逮;在天母郊區山坡上的濟公廟,鄭晨光和夥伴正在 裝配遙控炸彈,當五十多名特訓軍人逼近包圍時,幾隻狼狗齊聲狂 叫,守衛者發現大批人影晃動,大聲喊叫:「來襲!」頓時槍聲大作,鄭晨光叫大家撤到地下室,自己則躍上工作檯高處監視各方動靜。他手握機槍,背後掛著鄭南榕的遺照,好似藍波英姿再現。

突擊隊員從門窗三面侵入,鄭晨光左肩中彈,身體晃了一下,舉 槍連發,射中炸藥堆,引爆威力超強的炸彈,瞬間將廟宇夷為平地, 進入屋內的突擊隊員全數跟著陪葬。特訓隊員清理現場時,又跟躲在 地下室裡的「插旗」成員激烈駁火了將近一個小時,「插旗」成員孤 軍作戰,直到彈盡援絕,最後全部殉難。

事後逮捕到提供武器彈藥的「國軍遺孽」一幾位前台籍將領,武裝抗暴組織因此被殲滅殆盡。中共終於逮到機會,順勢打擊所有非暴力抗爭組織,羅織罪名逮捕運動領導人,反抗運動遭遇空前困境。

全面抗爭重挫中國統治

有「學運漂亮寶貝」之稱的「黑島動力工廠」女幹部紀佩薇,在 獄中遭到三名獄官聯手性侵。此一事件點燃了青年的怒火,年輕人群 起包圍看守所,鎮暴公安暴力驅離無效,人越聚集越多,並透過網路 全台動員,塞爆了看守所周邊的馬路及空地。最後演變成占領監獄, 典獄長、獄卒被當成人質,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圖說:1992年,林義雄發起訴求「總統直選」的四一九大遊行,原本預計到台北火車站靜坐六天五夜,沒想到群眾走到忠孝西路便自發性地坐下了。占領持續了三天兩夜,最後被警方以水柱、警棍強制驅離。這也是台灣第一次占領忠孝西路的街頭運動。(劉振祥攝)

特區政府面臨處理民眾暴動的考驗,「黑島動力工廠」要求嚴懲強姦犯、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反抗運動成員,並解除網路監控及干擾,還給民眾言論自由。特區政府在請示中央後,答應立即逮捕性侵者,給予嚴厲懲處,並釋放未涉及暴力的運動領袖,及除了宣傳台獨分裂國家的言論之外,凡有助於促進改革的言論和訊息均給予自由空間,這才平息了占領監獄風波。而民眾則對非暴力抗爭信心倍增,士氣大振。

段一康獲釋出獄,立即找魏庭凡和雙方重要幹部商討,認為七月 台灣特首和立法會議員選舉,距離中共二十大會議不到半年,評估中 國政爭危機將白熱化,是中國政權最脆弱的時候,可利用台灣大選, 串聯海外力量,發動非暴力全面性抵抗,重挫中國,並要求在國際監 督下,給予台灣人真正的自決權,以全民公投完成台灣獨立建國的使 命;同時策動中國民間友好組織和有力人士聲援台灣,制止解放軍鎮 壓。

經過幾次討論後,段一康等人決議發起「抵制選舉」,因為如果 提名特首候選人參選,無異於承認其統治的合法性,所以決定不提名 候選人,並發動「罷選」非暴力抗爭,讓傀儡候選人唱獨腳戲,打算 將投票率拉低到一成,顯示其統治的荒謬性。在投票前一個月,還接 連發起拒買中國農工產品、公務員罷工、學生罷課,呼籲全民團結抵 制選舉。

「反統一,要獨立」的口號響徹雲霄,街頭靜坐、遊行、示威活動不斷;公務員罷工由隱性轉為公開串聯,癱瘓行政體系;陸續傳出學生參與罷課;進口中國商品的商店紛紛關門;司機罷工,鐵路和公路幾乎停擺。法輪功學員在凱達格蘭大道持續一個多月靜坐抗議,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學員,來自各國加入抗議的學員與日俱增,聲勢浩大。

台灣的動盪,讓密謀政變的「倒習聯盟」得以強力究責習近平, 舊勢力順勢反撲,中國政爭熾熱,制憲民主派也趁機推動改革,民間 多元化的社運團體則加速公民社會成長。中國的政治危機能否成為民 主改革的轉機?台灣爭取自決獨立,並和中國建立起更親密且可信任 的關係,能否成功?二〇二二年將是台灣和中國命運的轉折年,全球 拭目以待它的結果。

附錄

附錄一

中華民國國史館「台灣社會運動口述歷史」

受訪者: 簡錫堦

時 間:二〇〇三年一月八日

地 點:木柵咖啡館

訪問者:張炎憲、陳鳳華

紀 錄:陳鳳華

◎參與一○○行動聯盟非暴力訓練

我在一〇〇行動聯盟所扮演的角色,是非暴力的訓練與行動的規劃。在這之前,我剛好去加拿大接受非暴力抗爭的訓練,訓練的主題是以甘地、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反越戰案例的研究,講師都是國際級的大師。之前,我對這些訓練還不理解,也很反對,不認為非暴力在台灣會有作用,後來證明這個方向是對的,對我的改變很大,讓我這個暴力的主張者變成非暴力的信仰者。

一九九〇,在社會運動領域,開始教導各社運學員「愛與非暴力」,包括理論、演練與操作。一〇〇行動聯盟發起運動在一九九一年九月到十月之間,因為主推者陳師孟老師等人是學者出身,對社會運動、群眾運動不了解,不知道該怎樣操作,陳正然推薦我加入決策

成員,我也相當有興趣。之後,鍾佳濱、羅文嘉跟林宗正三個人加入我這一組,一直跟我配合,參與討論。我提供決策者在運動中如何展現最有效的動員,因為群眾運動也是群眾教育,要讓群眾在運動中了解我們的訴求,進一步支持我們的訴求。這次群眾運動是新的,與傳統群眾運動不同,我能夠從過去的實務經驗中,幫助這一次運動。以前黨外的群眾運動都是登高一呼,訴求組黨、訴求老賊下台,並透過演講方式帶動群眾走向街頭,從無事先的訓練。但這次的訓練不是在營隊訓練社會運動幹部,而是直接對參與群眾在現場進行訓練。

◎非暴力訓練的演練

從九月二十四日開始訓練,第一次就選在立法院門口,動員來的人不多,大概三、四百人,但都是重要的成員,有萬佛會、學界、醫界、學生及社運團體。我們除了宣揚廢除《刑法》一〇〇條的理念之外,也講述非暴力抗爭的概念是什麼,並讓參與者操演。我沒有機會事先跟他們上課,只能在現場操作、實際操演。我告訴他們,警察是執行公務,不是我們對抗的主體,也不是我們今天行動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要改變制度,而不是針對人的仇恨。這個觀念很重要。若群眾當中有人丟石頭挑釁的時候,你怎麼辦?有人跳出來罵警察,那你怎麼辦?假設有這種行為發生,我們有糾察的編制,有責任立即制止他,請他離開。所以糾察的訓練很重要。非暴力抗爭不是一般群眾隨意就可以參加的,參與者全部都要簽署承諾書,也必須經過訓練,願意遵守主辦單位要求的紀律。

演練時進行角色扮演,有人扮演警察,用報紙捲成棍棒去驅趕群眾。若群眾抵抗、回擊,警察就越有正當性,而且越打越爽。如果你

都不抵抗、靜默對待,以身體承受木棍,警察打了五、六個之後,就 打不下去,群眾沒有用暴力對抗,而是用意志力來對抗警察,他就失 去正當性,心理上會有道德壓力而打不下去。所以非暴力方式能解構 暴力的正當性,使其難以行使。經過說明與幾次操演之後,參與者感 受到非暴力是對抗暴力最有效的抗爭方式,而不會像過去的群眾運動 任由演變成流血事件。

群眾運動常常被媒體誤導成群眾丟石頭、罵警察、警察追打群眾,然後雙方發生衝突,媒體嗜血只報導衝突,卻不見運動的訴求。但是非暴力抗爭產生的效用,會讓社會同情運動者、參與者,因為他們是非暴力者。非暴力是一種信仰,是一種堅持,而不是運動策略,誆稱非暴力抗爭,卻偷偷藏武器,暗地裡做出暴力的行為,實則違反了非暴力運動誠實透明化的原則。

第一次使用非暴力面對現場的鎮暴警察,讓他們真實地跟警察對抗。我將群眾編隊,讓他們第一隊的人開始不畏懼地往前前進,然後跟警察推擠的訓練很重要。跟警察推擠中,聽到喊停時就停下來,喊退後就退後。訓練過程讓群眾了解這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抗爭方式,我們是有所堅持,不要害怕與退卻。

我們也曾經在土城山上的萬佛會道場做訓練,除了非暴力抗爭的 理念課程,還做實際的演練。當時我們依計畫體驗領隊訓練,分組做 信任之旅體驗。帶隊者走在前頭帶領小隊,後面的隊員全部閉著眼 睛,手搭著前面人的局,配合腳步跟著走,要信任領隊者,他會安全 地帶你回到原地。討論時,有人為何會偷偷張眼?有人故意傳錯指 令?這是非暴力抗爭訓練體驗式教學的方式,讓參與者學習信任領導者與參與夥伴,經由團結展現力量。

◎十月八日,決策與情勢的翻轉

十月八日有了決策上的轉變,因為執政高層重要人士告知聯盟領導人,不要讓台灣人的總統李登輝難堪,反閱兵的行動會讓他沒面子、難做人。李鎮源院士當時被說服,他打算八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宣布取消反閱兵行動。那一天,我原本計畫帶隊到總統府前閱兵台操演非暴力抗爭。占據閱兵台,這是件非常挑釁、挑戰禁忌的實兵演練行動,軍警當然會來制止、驅散我們,目的則在演習民眾如何面對軍警的暴力。當時,陳正然跟鍾佳濱帶來了訊息,告知李鎮源決定不反閱兵了,下午他將召開記者會宣布。這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挫折,我們這陣子的準備,是以反閱兵行動壓迫執政者,逼使他同意廢除《刑法》一〇〇條,如今中途取消,著實令大家感到灰心。我跟林宗正、羅文嘉討論,決定持續演練計畫。

林宗正曾經和我一起到加拿大接受非暴力訓練,在台灣他負責 URM(Urban Rural Mission,城鄉宣道會)的工作。運動現場需要糾察 配置,我幾乎都請他去召集受訓過的成員。糾察訓練和執行任務是非 暴力抗爭首要,如何防止暴力、區隔衝突,如何保護群眾的安全,是 非暴力抗爭成敗關鍵。

我們在台大校友會館集合的時候,特務就開始跟蹤我們。由於早早對外宣布將到總統府前閱兵台演練,因為非暴力抗爭是不能秘密的、突襲的,而是要公開、要透明化,記者老早就接到消息在閱兵台前等候。如何突破警方的封鎖,要有策略。我跟各小隊的隊長討論細

節,參與成員要怎麼走進去,每一小隊每一個人要把運動訴求的布條,預藏在背包裡頭。同時,我們既不宣布不去,也不宣布要去,要求全體化整為零,分作好幾隊,每一隊隊長各自帶著隊員,不整隊、零散地走開。有些人從徐州路,有些人則從重慶南路、從公園路,大家算好會合的時間,就相約快速在閱兵台聚集。

這個策略是對的,公共交通的道路,警察不能阻擋,一定得讓我們通行。算好時間,每隊分散抵達閱兵台前幾十公尺,就跑步迅速聚集占據閱兵台,拿出背包裡的「反閱兵、廢惡法」訴求白布條,展開布條、喊口號。總統府前的憲兵隊也快速地動員,進行驅離任務,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噴水,只是以暴力來扯掉布條,要把人一個一個地抬走。後來更大的驅散行動開始了,使用高壓水柱猛力地沖向民眾。在抗爭訓練課程學過要怎麼背對著水柱,不可正面對著水柱,不然強力水柱啦啦地沖,整個人根本擋不住,很危險,易受傷害。被警察抬走的時候,一定要捏著他的手,拉住他的衣服或者是皮帶,免得放下時頭先著地而受傷,這是個人安全所必須注意的。要學會放輕鬆,不要緊張,一緊張對方反而很好抬,軟趴趴的肢體重心下垂,其實更難抬,反而要花很大的力氣,兩個人恐怕也抬不了,甚至要三、四個人來抬。

我預想警方不敢擅用暴力對付群眾,但是,那一天還是有兩個人 遭到毆打,其中一個學生頭部流血傷勢較嚴重,還有七十歲的郭相英 大姊當場驚嚇昏倒。因為發生這起軍人暴力,午間新聞大肆地報導總 統府前面閱兵台的衝突事件,成為午間頭條新聞。李鎮源院士趕緊去 探望受傷學生,及受了傷的社會人士。李鎮源很是憤怒,認為用暴力 施加在這些沒有暴力、主張非暴力者的身上,非常可惡,因此決定繼 續反閱兵行動。當天下午的記者會,就由陳師孟宣布,繼續雙十節反 閱兵的行動。十月八日的軍人暴力,是情勢轉變的重要事件。

◎靜坐抗爭中意志力的展現

非暴力的訓練課程,十月四日在金華國中的禮堂演練,十月六日 移到土城萬佛會廣場,九日就聚集在台大醫院基礎醫學大樓。因為時間短促,訓練要更密集,不能拖太長,我當初的計畫就是這樣安排。 這是台灣很完整的一次非暴力的抗爭,有別於過去黨外時代那種沒有 紀律的群眾運動。

十月九日晚上,我們開始在基礎醫學大樓集結的時候,來了一大批沒有經過訓練的龍山寺老人。那些熱血前輩不可能接受我們的訓練與紀律要求,但是他們堅持要參加,過去每有群眾運動他們就出現,而且他們常常會去跟警察幹架,那怎麼辦?又不能現場把他們請走。我跟邱義仁商量,把他們做個區隔,那些老先生由他負責,安排在基礎醫學大樓的內側,等於封閉在大樓一樓廣場。受過訓練的成員就在大樓外面。學界、媒體記者、學生、宗教界和社會運動者,加起來的人數差不多有八百多人,並不算太多。通常都認為群眾運動要人很多才有用,其實不然。只要有紀律,不一定求多,非暴力抗爭展現意志力,訴求便能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那就成功了。動員好幾萬人的群眾,當然是好,但也會構成很大的社會壓力與成本,以愛和意志力為武器的非暴力抗爭,會對統治者造成非常大的道德壓力。以前,閱兵活動從來沒有用過鐵絲網,這次卻要用鐵絲網,把任何路口都包圍起來,等於是用警察來保護鐵絲網內參與閱兵的軍人和高官,這是相當

奇特和諷刺的景象。執政者為什麼會那麼緊張,因為他們沒辦法驅散 我們,沒辦法讓我們的行動取消、終止。

我們的意志力堅持到底,群眾從傍晚集結,延續徹夜。在天亮, 閱兵之前,軍警才把我們大部分的人分批撤離,用打的,一個一個打 走。林宗正要我留守現場堅持到最後,所以我跟李鎮源院十坐在一 起,而其他的人幾乎都被警車帶走,分散帶到台北郊區放鴿子。非暴 力抗爭的策略也會提及如果被驅散了,第二個集結點在哪裡?那時候 我們早規劃好,再一次集結點就設在新生南路的台大校門口。不管民 眾是被丟在新店、中和或其他地方,都會各自想辦法到台大去會合。 一〇〇行動聯盟運動是台灣第一次很完美的非暴力抗爭,人數雖然不 多,卻成功逼拍國民黨讓步。當時媒體的報導大多肯定這次運動的精 神,而沒有負面報導,獲得社會非常大的肯定,甚至把一〇〇行動聯 盟的抗爭當成是台灣社會運動很重要的轉折。其實我比較欣慰的是, 非暴力抗爭終於可以在台灣實現,而且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讓國民 對群眾運動不再覺得是毒蛇猛獸、社會的亂源、亂象。更進一步,可 以讓社會大眾理解,人民是有能力改變社會上不公平的制度與不公平 的法律;而且暴力不是絕對的,暴力有它的極限,是無法鎮壓住人民 的。同時經由這次經驗,我們也更有信心,相信用此方式可完成台灣 的民主自由。

◎林義雄核四公投的絕食靜坐

非暴力抗爭從一〇〇行動聯盟後,也運用在勞工運動。一九九二 年六月到九月,板橋嘉隆成衣廠女工追討積欠工資及資遣費的抗爭, 這是勞工運動非暴力抗爭典範,顛覆了我們想像中的勞工抗爭。社會 常把勞工抗爭看成是暴力的行為,但是嘉隆女工卻得到社會普遍的支持。這些女工學歷雖只有國中、國小,但接受非暴力運動的理念與教育,知道如何借重社會輿論的力量來對抗她們的老闆,因此成功地達成她們的目標。

接下來,我又參與了林義雄的核四公投運動。核四公投原本設定十萬人簽名,向政府展現反核的民意與決心,後來簽署達到二十萬人,而且不是像一般只是簽名就算了,經過逐張篩選,刪除重複簽名者,並邀請律師與公證人士簽證,具相當公信力地宣布連署結果。在參與團體成員快速動員之下,一個禮拜就簽署了二十萬人,非常不容易。外界原以為這個簽名動作,大概又是不了了之,沒有辦法達到預期成效。因這之前,台灣的幾萬人簽名運動確實也沒有達成過。但核四公投是以非暴力抗爭的形式,林義雄一個人在絕食、斷食當中,我們不以盡快的速度進行連署,沒有達成目標的話,他將會一直絕食下去,整個氣氛是有社會壓力跟張力存在的。透過媒體進行理念宣揚與社會教育,讓整個社會了解這件事情,快速地動員起來。這次絕食非暴力抗爭,因為有一〇〇行動聯盟的經驗,做起來比較順手。核四公投是另類非暴力抗爭的展現。林義雄寫的書《心的錘鍊:淺談非武力抗爭》,就是非暴力的抗爭教材。

之後,他開始千里苦行計畫。「千里苦行」也是一種非暴力抗 爭,用雙腳行遍台灣環島一千公里,進行反核理念的宣揚。就像甘地 一樣,帶他的信徒到海邊製鹽,帶領他的信徒織自己的布。這種以肢 體的受苦、用腳走出去的意志力,非常有效果。

◎非暴力抗爭到非暴力國防

二〇〇二年,我到波士頓參加會議,分享台灣經驗與台灣的社會 運動,其中就講到愛與非暴力的抗爭案例。會上,又碰到金•夏普教 授,他是國際上很有名的學者,在哈佛大學推動愛與非暴力抗爭的觀 點,一九八九年,徐璐翻譯的《非暴力抗爭一〇〇策略》,就是金. 夏普的著作,是台灣第一次翻譯非暴力抗爭策略的書。江蓋世根據 金•夏普的書,編了一本《非暴力行動的理論與策略》(前衛,一九 九九)。林哲夫也根據金·夏普的理論,推動非暴力國防。提到國防 就會讓人聯想到軍人、軍事武力與國防裝備。非暴力國防的主張是使 用人民的意志力來作為國防的後盾。例如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不是 軍人革命的成功,而是人民以非暴力的力量,推翻俄國的統治。不僅 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獨立,東歐很多國家是用非暴力的 革命方式,達到獨立的目標。我覺得非暴力國防未來在台灣可以發 揚,當中國侵犯台灣時,台灣人民若不同意中國的統治者,就有正當 的抵抗權,以不合作的手段,比方公務人員、軍人、學生、勞工、市 井小民,可以罷工、罷市、罷課、不繳稅等等不合作的方式,讓中國 的統治失效,我相信「非暴力」最後會得到勝利。

我希望一〇〇行動聯盟所推動的非暴力,能用在追求台灣民主化和獨立之上,進而對抗中國。台灣再加強武裝軍備都沒有辦法對抗中國,只有台灣人民用非暴力的方式來保衛自己的安全,讓國際重視我們的存在,支持我們的抗爭,才能贏得勝利。一〇〇行動聯盟抗爭的實驗讓我更有信心,我現在從事和平運動,也是從那個觀點啟發的。

◎一○○行動聯盟的內部運作

一〇〇行動聯盟的運作,主要是三大巨頭一李鎮源、林山田和陳師孟,他們三位是主要的召集人。陳師孟負責執行面的,他帶我以及鍾佳濱、羅文嘉這批年輕人一起工作。通常開決策會議時,林山田、李鎮源才會出席。我是屬於策略小組,策略草案都是由我擬訂,同時負責行動指揮;陳正然負責文宣,另外還有總務組。我們有一個組織表,做一個簡單的任務分配。這次運動的文宣做得不錯,有製作T恤,Logo是一個方形的圖案,當中坦克車上面有一隻鴿子停在砲口上,象徵槍口下的和平,那是一〇〇行動聯盟的標幟,非常有特色。

林山田和陳師孟兩人的想法確實不太一樣。那時候,年輕學子很自然就分成兩邊,兩邊各有追隨與支持者。講到廢法的部分,林山田比較堅持專業,陳師孟則希望以社會運動來推動,較能產生社會教育的功能。我認為,陳師孟比較拒絕跟執政者接觸、談判,他希望用群眾的力量壓迫執政者。林山田對群眾運動較沒興趣,他認為應該可以透過高層對話來廢除惡法,做法律的修改。陳師孟是比較支持我對群眾運動的看法與提案。他們之間的爭議沒有公開化,不會在我們開會當中提出,這個過程陳正然較為清楚,有時他夾在中間也很難做事。《刑法》一〇〇條條文廢除或者修訂,在當時確實有一些爭議,《刑法》槽威蔡墩銘教授也提出意見參與討論。隔年,《刑法》一〇〇條用修訂的方式,把意圖叛亂罪取消了。

◎一○○:愛與非暴力行動的完美展現

一〇〇行動聯盟是愛與非暴力行動完美的展現,留給社會一個很 深的印象。一〇〇行動聯盟不因這次行動結束就結束,我們還繼續推 動民主化,上過草山,關注老國代的修憲。我們仍然採取非暴力抗爭的方式,鎮暴警察對我們無可奈何,警力無法施展。

一〇〇行動聯盟當初是為了廢除《刑法》一〇〇條而成立。這樣的功能,在目標達成後,很難維持常設性的組織,所以經由內部討論,認為它在歷史的功能性任務已經完成,應該解散。剩下大約一百多萬元的捐款,開會決議,悉數捐出。一九九二年,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一〇〇行動聯盟一週年紀念晚會,正式宣告結束。

我覺得一〇〇行動聯盟是個很重要的群眾運動,從台灣的運動歷史上,少有如此由下而上的推力,不是藉由政治菁英領導的方式。台灣民主化就是在政權和平移轉下,寧靜革命而逐漸完成,這是社會運動成熟的表現,也是民主文化的成熟展現。從黨外時代一直到現今,民間社會充滿活力,散發出的能量不可忽視,不管是環保、婦女、勞工、農民、原住民運動,都有顯著的成果,促進台灣民主的深化和落實。

附錄二

香港「非暴力講師研習營」課程設計(簡錫堦二〇 一三·一〇·二)

◎目標

- 1.解答香港社運對非暴力抗爭的質疑/探討香港特殊的社運文化
- 2.是否以明年占中為實踐目標的實務課程
- 3.凝聚社運力量的前期運動計畫

4.非暴力抗爭的信念與技巧的加強

◎體驗式訓練的要領

- 1.從學員的經驗出發——議題的產生/集中討論/分組討論/回饋分享
- 2.團體動力體驗遊戲的運用—引用有助理解非暴力議題,產生信任/合作/組織發展/集體決策/狀況體驗和處理/戲劇/角色扮演……
 - 3.故事/影片/現身說法者的運用/討論
- 4.理論與實務交叉運用—設計—個運動來實踐/學習。再回到課 堂分享/修正/再參與/螺旋前進式的運動實踐
 - 5.狀況模擬的演練/討論與創新

◎講師對非暴力抗爭的知識/信念的充實

- 1.自身經驗分享/研讀有關資料/書籍—籌備讀書會/討論/提升
 - 2.個案研究心得分享
 - 3.運動的現場參與/策略/指揮/訓練的實務經驗累積
 - 4.思考、創新/研發教材與教案
- ◎介紹加拿大URM非暴力抗爭講師訓練的課程

- 1.研討甘地傳/馬丁·路德·金恩/反越戰非暴力抗爭
- 2.非暴力抗爭理論
- 3.非暴力抗爭操作要領/成功與失敗的討論
- 4.螺旋前進式體驗教學介紹與體驗
- 5.團體動力遊戲的運用——信任之旅/建造報紙塔比賽
- 6.教學/現場訓練的要領
- 7.學習心得分享/回饋/課程檢討
- 8.設計一個實踐非暴力抗爭的運動

香港非暴力抗爭講師訓練綱要(簡錫堦二〇一三· 一〇·十二~十五)

一、分享對非暴力抗爭的想法: (一對一討論/分享報告/整理問題)

你如何評價非暴力抗爭?

法治觀念強的香港人如何看待「公民不服從」?

民眾、社運和政治團體認為非暴力抗爭有用嗎?問題癥結?

過去的經驗,失控的參與者造成的影響?檢討/因應?

只有粗口但不動手,是否可容許?

民眾對社會(群眾)運動的觀感,普遍的評價?支持比率?哪個 議題最受支持?

- 二、非暴力抗爭訓練最應著力的要點?怎樣循序平順把它融入課 程?
 - 三、課程設計的起、承、轉、結。

四、介紹「螺旋體驗前進式訓練方法」

〈傳統〉

教師──學員 聽課/上對下關

係

(權威) (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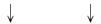
知識/理論→實踐(應用/實習)

〈螺旋體驗式前進教學〉 教師◆→學員 平等的權威/ 耳、眼及實作體驗

(權威)(權威) 從學員的經驗出

發/互動式圍坐

/再行動



知識/理論/檢討/修正←→理論/實踐/反省/修正

五、暖身的重要

引起學員學習興趣的開場/或學習溫度下降時的提升。可採簡單的遊戲—如司馬光打破水缸(挑戰傳統標準答案)、少女與老嫗圖(年齡特徵)、買賣的賺賠……亦可進入「希望/期待/目標」(對此次參與課程希望學到什麼)。分享你有何暖身設計/計畫?

六、從學員的經驗出發

帶討論—例如對非暴力的質疑、可否與暴力抗爭交叉地運用/策略靈活?群眾激動無法控制使非暴力抗爭失敗……亦可以一對一的對談,對於非暴力抗爭的質疑(訓練傾聽),再來回饋分享/整理歸納問題。

七、演練方式的體驗教學

- ◎六人一組,五人抬一人(雙手/雙腳及身體)然後一一離開(先一腳再一手……最後抬身體者離開)↓說明不服從/不合作,就危及統治者/使統治失靈。
- ◎警方驅散毆打:狀況一:群眾可以抵抗;狀況二,不抵抗/注 視警察眼睛↓討論不同狀況得到的效果,說明非暴力抗爭的原理。(可講解甘地海邊製鹽、占領鹽場、辭官及罷稅的故事印證)
 - ◎信任之旅。體驗信任領導的重要/一元化指揮系統。
- ◎指揮要領的演練:參與者宣誓非暴力並服從指揮;一起宣讀非 暴力抗爭守則的重要性。

- ◎狀況處理的演練:面對挑釁、激動的夥伴、警方驅散↓水砲、 催淚彈、辣椒水、抬走……突破鐵絲網/欄杆、有人被抓、領導人被 捕、民眾不服解散命令、未達目標時的宣告……
- ◎團體動力遊戲的體驗及講解操作/催化者的要領/失敗的關鍵處

權力之星

贏你所能贏的

牛馬橋的愛情故事

標籤遊戲

建造報紙塔比賽

八、非暴力抗爭影片觀賞/討論

甘地傳、捍衛自由、人權鬥士羅莎派克、馬丁·路德·金恩、非暴力抗爭紀錄片↓甘地、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波蘭團結工聯、南非種族隔離、丹麥反抗德國占領、智利人民VS皮諾契、塞爾維亞推翻暴政(米洛塞維奇)……

九、非暴力抗爭理論與實務講解/討論

相信真理的力量,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ppt檔)

十、如何帶引學員策劃一個非暴力抗爭的行動計畫/分組討論/回饋分享

問題歸納KJ法及名目團體法的運用技巧

社會控制體系的解析

引用URM議題分析、策略選擇及行動計畫

一個社會運動發起的步驟

群眾動員的理論介紹:心理動員論、資源動員論及共識動員論

十一、對本次課程的心得/建議/對未來課程的期待

附錄三

走過基本教義派(二〇〇五·四·二十八發表於中國時報)

國民黨主席連戰搭機前往中國訪問,在中正機場引發了歡送者與 抗議者之間的激情演出,甚至還造成流血事件。透視這兩種極端立場 的心理層次,一方的恐懼是擔憂連戰此行是否會有賣台行為;另一方 則是煩惱極端台獨的立場會引發兩岸大規模戰爭。這個事件對於曾是 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我而言,有些啟示和反省。

我也曾經是為堅持台灣獨立的理想,隨時準備好武裝革命的「基本教義派」,是在台灣最早教人製作汽油彈來對抗國民黨的人,相信

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一切手段,而犧牲自己和別人的性命是必要的。

接觸URM(城鄉宣道會)的「非暴力運動」之後才逐漸了解,達到同樣的目的可以有不採用暴力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追求目標的手段必須和目的一致,若是要以兩岸對立、撕裂族群等操作方式完成台灣獨立,那麼即使真的達到目標,完成的也只有台灣獨立的「形式」而沒有實質「內容」。

怎麼說呢?因為這個用仇恨手段所建立起來的新國家,在社會內部缺乏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信任,政黨、朝野爭執內耗不斷,相互不承認;在國際上,隔鄰的中國隨時都準備以武力把台灣併吞下來,再以高壓統治壓制反對力量。不論是行動上的暴力或是精神上的暴力,以對立建立起的國家,內外都將持續紛擾不安、難以成為一個理想的、有尊嚴的幸福國家。

回想今年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大海嘯,奪去了南亞二十幾萬人民的性命,災難頓時使得印尼政府軍與亞齊、斯里蘭卡當局與塔米爾之虎、世仇的印度與巴基斯坦等地區皆放下對立,全心投入救災。在這來得太遲的合作之前,南亞人民已經因為上述戰亂犧牲近百萬性命,災難或許正好給予飽受戰亂威脅的人民喘息的機會。戰亂的根源來自對立雙方各自堅持的「基本教義」,並且不惜以武力相互摧毀、確保己方的基本教義得到最終勝利。

在台灣,很多人都把台灣獨立視為人生必須要努力完成的歷史任 務,然而,唯有台灣真正獲得獨立的形式與實質,我們才能給下一代 一個真正理想的國家。這個國家內部可以有不同意見,但總是相互尊 重與傾聽了解;外部沒有敵對環伺的武力威脅,能夠真正和平有尊嚴地盡世界公民的義務與責任。

一九〇五年從瑞典和平獨立出來的挪威,也就是因此能與過去統治過她的鄰國瑞典、丹麥間享有永久和平,並且免於兩次大戰席捲歐洲的戰禍,和平的北歐三國成為全球社會民主、經濟民主的福利國家。北歐國家率先提出環境永續,同時也是審議式民主公民會議的發源地。

挪威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同樣也充滿了歷史的仇恨,當時也有不少武力行動,更有許多言論鼓吹著與瑞典對立,瑞典憑藉著歷史上軍事王國的力量,要打敗挪威可謂輕而易舉,更遑論挪威對瑞典而言具有軍事上重要的海權戰略意義,當時看來,雙方都認為戰爭勢不可免。假如當時瑞典真的以武力阻止挪威分離成功,那麼瑞典對挪威的統治同樣也只是形式而沒有實質意義,瑞典實際上擁有的只是布滿地雷的挪威領土,挪威人民追求獨立的反抗將以各種形式繼續,如同北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所做的恐怖攻擊一樣,使瑞典人民無法感到安全,挪威與瑞典也許就是現今南亞幾個世仇的翻版,雙方充滿基本教義派。

現在當然很難想像戰爭若在歷史上真的發生,今日的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可能是另一個朝鮮半島,象徵進步、安定、民主、和平的北歐國家恐怕將不可能出現。好在挪威與瑞典內部都有和平運動,當時主張和平最力的貝莎·馮·蘇特納(Bertha Von Suttner,1843~1914)也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而設置這個獎項的諾貝爾也特別將和平獎指定由挪威頒發,而非如其他獎項一般在他的祖國瑞典頒發。當然,當時還

有許許多多的人民而非當權者都先選擇了「和平」,才能阻止在兩國 間繼續流血的戰爭與仇恨。

挪威的例子,對當前的基本教義派,是深具啟示的。

以紅衫軍失敗為殷鑑(二〇一四·三·三十發表於 自由時報)

當年施明德發起紅衫軍「反貪倒扁運動」,惟個人觀察「倒扁」是其運動目標,「反貪」只是陪襯。運動過程中,激化對扁的仇恨,甚至領導人常有羞辱阿扁及其家人的言論,違背了非暴力抗爭「旨在制度或政策的改革,不應激起對人的仇恨」原則。

群眾運動必須一鼓作氣,拖長則再而衰三而歇,使師老兵疲民氣 渙散,導致運動失敗。當時我提出建議:宣告兩週內決戰,拆除警方 部署的鐵絲網,四面進逼總統府;密集訓練民眾「積極非暴力抗爭」 行動要領,如何挺住水柱、催淚彈和警棍攻擊,聚合數十萬民眾,讓 警力無法以抬人方式驅離群眾,紓解府方壓力;同時積極號召並組織 民眾罷工罷市,公務員及教師以集體請假來罷工,遊說工會及企業界 支持。如此可造成巨大壓力,逼使阿扁道歉,放棄特權接受司法調查 及國會通過「反貪六法」,運動成功機率可期。

然而施先生堅持拖到雙十節,認為可讓扁在國際上出醜,似意在展現「扁施對決」態勢。由於拖長延宕一個多月,每天在現場搞嘉年華會,眼見民氣逐日消退,施先生才發動「遍地開花」行動,反而激怒南部民進黨支持者反擊,發生了多起流血事件。妨礙「促成民進黨

反省,與扁劃清界線,爭取綠營有力人士」策略。之後又大搞「罷免 部分民進黨立委」,但連署者寥寥無幾,反傷士氣。

雙十節決戰日,雖有數十萬群眾相挺,但範圍廣闊無法有效包圍,無法如預期的要求民眾堅持靜坐原地不走。沒有積極行動,何能滿足群眾期望而宣布解散?我建議癱瘓忠孝西路火車站前交通樞紐,進行長期抗爭,製造更強大壓力,逼使國會通過「反貪六法」,作為紅衫軍運動漂亮的結束。但施先生接過馬英九電話後,隨即宣告讓出一邊馬路。堅持死守陣地不服從、不退讓的少數民眾因此被警力驅離。

占領首都交通樞紐、癱瘓交通行動失敗後,民眾怒氣反撲至首腦施先生,運動不成,施先生反背負罵名。狗尾續貂般的後續無力,紅衫軍光彩瞬間黯然消退。

以上老人說故事,僅供三一八學運領導人參考。

期待新世代宏觀運動再起(二〇一一·七·二十八 發表於中國時報)

青年是台灣新一波改革的重要角色,但若只是專注議題倡議,而 以去政治化的純淨自持,難免欠缺宏觀運動思維。掌權者慣常化解或 轉移策略來削弱矛盾,倡議團體因此被邊緣化。何況各領域團體的細 分或重疊,相互競爭議題代表性,常因時效而失去社會關注,組織隨 之弱化或瓦解。這是當前社運單一領域或議題,無法撼動結構的原 因,即便大埔事件、反國光抗爭階段性成功,但結構問題依舊存在。 而政商結構乃是青年貧困、租稅不公、國債高疊、世代剝削、環 境破壞的根源。

當年黨外新生代,辦雜誌挑戰戒嚴體制的威權政府,歷經四、五年,新潮流始奠定宏觀價值。快速地凝聚民力,解嚴建黨,新國家運動橫掃全國,提名立委幾乎全員當選。更以台灣獨立的尖銳訴求突破政治禁忌,社會民主體制為建國目標,用「建立東方瑞士的台灣國」口號,吸引人民;以群眾運動路線重挫當權者,各類社運因勢利導蓬勃發展。

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新潮流進入執政核心,已不復台灣進步 思潮引領者,開始講究務實,民進黨遂背離社會民主理想,只能操弄 族群危機,博取選票。當前看不到國家願景,也缺乏宏觀視野的團體 挑戰結構性不義,看不到未來出路,社會由焦慮變成冷感。

這個空缺需要有進步青年團體來填補,依比爾·摩耶(Bill Moyer)在《社會運動輪迴的八個階段》所述,台灣已進入新一輪迴的運動起步階段了,期待新世代做好準備並掌握改變的契機。

宏觀運動者應思考下面幾個問題:

- 一、當前最應被挑戰的結構性問題:兩岸問題仍是最主要矛盾,如何跳脫藍綠思維?認知全球化價值觀的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危害, 世代不正義的事實與衍生的問題,及當前權力運作最大的弱點。
- 二、建立新價值:思考我們要成為怎麼樣的國家?人民到底想過 怎麼樣的生活?作為探索的起點。想像台灣成為中立和平國家的可

能,如何突破困難?借鏡他國落實社會民主的經驗,提出論述、修正。輔以國際視野和在地發展的策略,分析推動的障礙和提出克服的方法。

三、困境的突圍:舊價值觀對人民影響深遠,人民是舊價值維護者。採激進策略「少數認同,逐漸擴張」的新潮流經驗值得仿效。不要掉入僵化左派或純度論戰的消耗,應善用人民故事和經驗的力量。 從論述、運動中學習成長,擬定組織內部訓練計畫;發揮新運動工具 一網路的功能,熟悉新世代語言與運用,都有助於打開宣傳通路。

宏觀運動並非搞社運聯盟,而是要以更高層次挑戰結構問題,應 歸類為政治性的NGO團體。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可採議題合 作,讓社運學會政治思維,撐開視野,壯大改革力量。

弱者的力量一台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

作者:簡錫堦

出版者:我們出版

電子書製作日期:2016年8月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